目錄

第一章　陰陽五行說及其理想中的政治制度

漢代人的思想的骨幹，是陰陽五行。無論在宗教上，在政治上，在學術上，沒有不用這套方式的。推究這種思想的原始，由於古人對宇宙間的事物發生了分類的要求。他們看見林林總總的東西，很想把繁複的現象化作簡單，而得到它們的主要原理與其主要成分，於是要分類。但他們的分類法與今日不同，今日是用歸納法，把逐件個別的事物即異求同；他們用的演繹法，先定了一種公式而支配一切個別的事物。其結果，有陰陽之說以統轄天地、晝夜、男女等自然現象，以及尊卑、動靜、剛柔等抽象觀念；有五行之說，以木、火、土、金、水五種物質與其作用統轄時令、方向、神靈、音律、服色、食物、臭味、道德等等，以至於帝王的系統和國家的制度。

這種思想不知道什麼時候發生的。依據現存的材料，陰陽說可說是起源於周易，五行說可說是起源於洪範。周易是筮占的繇辭，比了甲骨卜爲後起，當然是商以後的東西；而且在周易的本文中不見有陰陽思想，不過它的卦爻爲「一和--」的排列，容易激起這思想而已。洪範上的五行，說是上帝賜給夏禹的；但從種種方面研究，這篇書很可疑，大約出於戰國人的手筆。所以這種思想雖不詳其發生時代，但其成爲系統的學說始自戰國，似已可作定論。漢代承戰國之後，遂爲這種學說的全盛時代。

今先把在這種學說之下所發生的政治學說講三種，作爲引子。

以前作天子的要「受命」（受上帝的撫有四方的命），要「革命」（革去前代的天子所受的命。）到戰國時，周天子漸漸在無形中消滅，用不着「革命」了；而羣雄角逐，究竟那一個國王可做天子還沒定所以「受

命」說正有其需要。但那時已有五行說了，五行說已爲最高的原理了，所以這「命」應是五行的命而不是上帝的命。那時有一個齊人鄒衍，他作了好些書，其中一篇是主運，說做天子的一定得到五行中的一德，於是上天顯示其符應，他就安穩地坐了龍位。他的德衰了，有在五行中得到另一德的——這一德是足以勝過那一德的——就起而代之。這樣地照着五行的次序運轉下去，成功了歷史上的移朝換代。他創了這種學說，喚做五德終始說，很得當時的信仰，自然有推波助瀾的徒衆。他們以爲黃帝得土德，天就顯現了黃龍地螾之祥，所以他做了王，他的顏色是尙黃的，他的制度是尙土的。其後土德衰了，在五行中木是尅土的，所以禹據木德而興，他就得了草木秋冬不殺的禎祥，建設了木德的制度，換用了青色的衣物。此後湯以金德而尅夏木，文王以火德而尅商金，亦各有其表德的符應和制度服色。鄒衍們排好了這個

次序，定了五德的法典，吩咐上代帝王各各依從了他們的想象，成了一部最有規律的歷史。到秦始皇既幷天下，他是應居於尅周火的水德的，只是不見有上天的符應下來；因此就有人對他說，從前秦文公出獵時獲得一條黑龍，可見水德的符應已在五百年前見了。他聽了很高興，就用了鄒氏們的法典定出一套水德的制度：（1）以十月朔爲歲首；（2）衣服和旌旗都用黑色；（3）數以六爲紀，如符是六寸，輿是六尺，乘是六馬；（4）行政剛毅戾深，事皆決於法；（5）更名黃河爲德水。這是實行五德說的第一次。到漢得天下之後，當然也要來這麼一套。

不知何時，起了一種與五德說大同小異的論調，喚做三統說。他們說，歷代的帝王是分配在三個統裏的，這三個統各有其制度。他們說，夏是黑統，商是白統，周是赤統；周以後又輪到黑統了。他們說，孔子看周道既衰，要想成立

一個新統，不幸他有其德而無其位，僅成一個「素王，」所以他只得託王於魯，作春秋以垂其空文；這春秋所表現的就是黑統的制度。春秋雖是一部書，抵得一個統，故周以後的王者能用春秋之法的就是黑統之君了。記載這個學說的，以董仲舒的書爲最詳。

照我想來，三統說是影戲了五德說的牌子而創立的。當漢高帝成功之後，他自以爲始立黑帝祠而居於水德。這不知道他是否因秦的國祚太短而不承認爲一德，要使自己直接了周，還是有別的用意？到文帝時，有人出來反對，說漢革秦命，應以土德代水德，丞相張蒼就駁道，「河決金隄，就是漢爲水德的符應。」此後雖因種種原因，改爲土德，又改爲火德，但在漢初的四十餘年是坐定了水德的。大約這個時期中講春秋之學的有人對着五德說的流行頗眼紅，就截取了它的五分之三，將漢的水德改成黑統，周的火德改成赤

統，商的金德改成白統使得五德說的法典都適用於這一說，見得他立說的有據，只是夏在五德說中爲木德，在三統說中爲黑統，有一些兒的衝突。但他說，不妨孔子志在「行夏之時」，所以春秋用夏時（？），即此可證明夏和春秋有同統的必要。

再有一種明堂說，說天子應當住在一所特別的屋子裏；這屋子的總名叫做明堂，東南西北各有一個正廳，又各有兩個廂房。天子每一個月應當換住一地方，穿這一個月應穿的衣，吃這一個月應吃的飯，聽這一個月應聽的音樂，祭這一個月應祭的神祇，辦理這一個月應行的時政；滿十二個月轉完這一道圈子。這大院子的中間又有一個廳，是天子在季夏之月裏去住的，另有一說是每一季裏抽出十八天（所謂「土王用事」）去住的。這把方向的「東南中西北」和時令的「春夏口秋冬」相配，使天子按着「木火土

金水」的運行去做「天人相應」的工作眞是五行思想的最具體的表現。記載這個制度的，叫做十二紀（呂氏春秋）又叫做時則（淮南子）又叫做月令（禮記。）

以上所說，今日的讀者們切莫以自己的智識作爲批評的立場，因爲其本質惟有迷信，已不足供我們的一擊。但這是漢人的信條，是他們的思想行事的核心，我們要了解漢代的歷史時是非先明白這個方式不可的。

第二章　封禪說

古代的王者固然最信神權，但因王畿的狹小，四圍又都是些小國家，已開化的和未開化的，不盡能交通無阻，所以他們並無遠行的可能，也就不能到遠處去拜神。左傳中記楚昭王生病，卜者告他是河神作祟，應該去祭他，說，「江、漢、睢、漳是楚國的望，纔是應當祭的。河距我們遠了，我就是有了錯處，河神也管不着！」就不祭了。古代命國中名山川為「望」，也命山川之祭為「望」。各國有各國的望，誰也不想越界去祭神。

春秋戰國之世，齊和魯是文化的中心，泰山是這兩國的界牆。他們游歷不遠，眼界不廣，把泰山看做了全世界最高的山，（連聰明的孔子也會說「登泰山而小天下！」）設想人間最高的帝王應當到最高的山去祭天上

最高的上帝，於是把這侯國之望擴大爲帝國之望，定其祭名爲「封禪」—封是泰山上的祭，禪是泰山下小山的祭。他們又說，自古以來七十二代之君，當他得了天下之後，沒有一個不到泰山去封禪的。

最早記載這件事的要算管子，其中有封禪篇。但管仲爲齊桓公成霸業，是齊國人崇拜的偶像，他的書全非自著而出於齊人的雜集；封禪篇又已亡，惟史記封禪書載有管仲論封禪一段話或是從那篇鈔出來的。今把它大意敘述一下，以見封禪在戰國時的意義。

這上面說：桓公既霸，會諸侯於葵丘，想行封禪之禮。管仲提出抗議，道：「從前封泰山，禪梁父的有七十二代的帝王，我只記得十二個。從無懷氏、伏羲、神農，……到周成王，都是受命之後纔行這個禮的。他們那時候，嘉穀生，鳳皇來，東海得到比目魚，西海得到比翼鳥，有十五種不召而自至的祥瑞，然後

封禪。現在有這種東西嗎?」桓公自己知道沒有這大福氣，只得止了。——這一說和五德終始說同出於齊人，亦同出於一個目的，就是希望受命的天子得到他的符應；不過得到了符應之後，五德說望他定制度，封禪說望他到泰山去祭天，有些不同罷了。

第一個去實行這個學說的，也是秦始皇。他做了皇帝三年，巡狩郡縣，帶了齊、魯的儒生博士七十人，走到泰山下。他已從「秦文公獲黑龍」上證明了他的受命，當然要實行這個所謂自古相傳的典禮。不幸封禪之禮雖說爲舊章，究竟沒有實際的根據，臨到辦事的時候，儒生博士便議論紛紛，得不到一個結論；有的還唱高調，以爲只須極簡單的禮節，掃地而祭就夠了。始皇怒他們的不濟事，把他們完全斥退，自己到泰山頂上去行封禪，又到梁父去行禪禮；他的禮節大都採自秦國祭上帝時所用的。諸儒既不得參加這大典，怨

恨得很，恰好始皇走到半山碰着大風雨，躲在樹下，就暗暗地譏笑他，以爲犯了天怒。不久秦亡，這班儒者又造他謠言，說他給大風雨擊壞了，或者說他沒有到山頂就退下來了。

「泰山是世界上最高的山，」這是齊、魯間人的信念。但始皇成了統一之業，到底眼界廣了，他把全國的名山大川整理了一過。他以崤山——舊時秦國的門戶——爲界，定其東邊名山五：太室、恆山、泰山、會稽、湘山；其西邊名山七：華山、薄山、岳山、岐山、吳山、鴻冢、瀆山。泰山的地位固然高，但也不過是十二個名山中的一個罷了。

漢高帝得天下，四面亂嚷嚷的，沒有功夫做這種事。文、景玄默，也不想做這種誇大的事。直等了六七十年，到武帝即位，這種學說纔因投合了天子的脾胃而蓬勃地興盛起來，司馬遷至特作一封禪書以記之。

第三章　神仙說與方士

仙人，是古代所沒有的。古人以爲人死爲鬼，都到上帝那邊去；活的時候的君臣父子，到了上帝那邊之後還是君臣父子。天子祭享上帝，常選其有大功德的祖先去配享他。所以鬼在人間的權力僅亞於上帝一等，不過在許多鬼中還保存着人間的階級而已。古代的人沒有很多的自由，他們也想不到爭取自由，因此他們沒有在意識中構成了一種自由的鬼，浪漫地游戲於人世之外，像戰國以來所說的仙人。

最早的仙人史料，現在也得不到什麼。只從封禪書裏知道燕國人宋毋忌、正伯僑、羨門子高等都是修仙道的；他們會不要這身體，把魂靈從身體中解脫出去，得到了一切的自由。齊威王、齊宣王、燕昭王們都是他們的信徒，聽

得他們說：「渤海裏有三個神山，名為蓬萊、方丈、瀛洲，山上的宮闕是用黃金和銀建造的，其中住着許多仙人，又藏着一種吃了會不死的靈藥，」一高興極了，屢次派人到海裏尋去。不幸這班人回來報告，總是說，「三神山是望到的，好像雲一般地燦爛；但是船到了那邊，這些神山就沈到水底去了，海風也把我們吹回來了！」在這些話裏，可以知道仙人是燕國的特產，其風尙及於齊國；仙人的道是修鍊來的；仙人的居地在燕國東邊和齊國北邊的渤海；仙人的生活是逍遙出世，只求自己的不死，不願（或不能）分惠與世間人，使他們都得不死。

此外，莊子裏說的「眞人」也頗有仙人的意味。這書講普通人的呼吸都在喉嚨裏，眞人的呼吸卻在脚跟上。眞人的本領，會入了水不溼，入了火不熱。有一位列禦寇能騰空走路，常常很舒服地御風而行，一去去了半個月。貌

姑射山上住着一個神人，他的皮膚好像冰雪一樣白，他的神情好像處女一樣柔和；他吸的是風，飲的是露；他出去時，乘了雲氣，駕了飛龍，直到四海之外。

這種思想是怎樣來的？我猜想，有兩種原因。其一是時代的壓迫。戰國是一個社會組織根本變動的時代；大家感到苦悶，但大家想不出解決的辦法。苦悶到極度，只想「那得躲開了這惡濁的世界呢？」可是一個人吃飯穿衣都是免不了的，這惡濁的世界緊緊跟在你的後頭，有何躲開的可能。這問題實際上既不能解決，那麼還是用玄想去解決罷，於是「吸風飲露，游乎四海之外」的超人就出來了。楚辭遠遊云，「悲時俗之迫阨兮，願輕舉而遠遊。質菲薄而無因兮，焉託乘而上浮。免衆患而不懼兮，世莫知其所如，」真寫出了這種心理。其二是思想的解放。本來天上的階級即是人間的階級，而還比人間多了一個特尊的上帝，他有最神聖的地位，小小的人們除了信仰和順從

之外再有什麼敢想。但到戰國時，舊制度和舊信仰都解體了，「天地不仁，」「其鬼不神」的口號喊出來了，在上帝之先的「道」也尋出來了，於是天上的階級跟了人間的階級而一齊倒壞。個人既在政治上取得權力，脫離了貴族的羈絆，自然會想在生命上取得自由，脫離了上帝的羈絆。做了仙人，服了不死之藥，從此無拘無束，與天地相終始，上帝再管得着嗎！不但上帝管不着我，我還可以做上帝的朋友，所以莊子上常說「與造物者（上帝）遊，」「與造物者爲人。」這眞是一個極端平等的思想！有了這兩種原因做基礎，再加以方士們的點染，舊有的巫祝們的拉攏，精深的和淺薄的，哲學的和宗教的，種種不同的思想雜糅在一起，神仙說就具有了一種出世的宗教的規模了。

鼓吹神仙說的叫做方士，想是因爲他們懂得神奇的方術，或藏着許多

藥方，所以有此稱號。封禪書說「燕、齊海上之方士，」可知這班人大都出在這兩國。當秦始皇巡狩到海上時，慫慂他求仙的方士便不計其數。他也很相信，即派韓終等去求不死之藥，但去了沒有下文。又派徐市造了大船，帶了五百童男女去，花費了好幾萬金，但是還沒有得到什麼。反而同行嫉妬，互相拆破了所說的謊話。其中有侯生、盧生二人，不滿意於始皇的行爲，以爲不值得替他求仙藥，他們就逃走了。始皇對於這班方士久已不懷好感，聽得了這件事，就大發雷霆，罵道：「我用了許多文學方術之士，爲想興太平，求奇藥。現在得不到一點效驗，反而說我壞話，搖惑人心、這樣的可惡，還不應當重重治罪！」他把養着的儒生方士都發去審問，結果，把犯禁的四百六十餘人活葬在咸陽：這就是「阬儒」的故事。當時儒生和方士本同等待遇，這件事又是方士闖下的禍，連累了儒生；後人往往把這件事與「焚書」一作一例看，實在

錯誤。焚書是一種有計劃的政治手段，也是他們的時代使命；阬儒則不過始皇個人的發脾氣而已。

在漢初，這班方士似乎沒有什麼活動。只有趙人新垣平弄了許多花樣，他因望到了五采的神氣而勸文帝立渭陽五帝廟，候着太陽的再中而勸文帝更以十七年爲元年，又以望見了金寶氣而勸文帝祠出周九鼎；但沒有韓終、徐市這樣勸文帝到海中去求不死之藥，這或者因他是趙人而非燕、齊人的緣故。文帝的性情不是喜歡張揚的，後來識破他的欺詐時立刻把他殺了。

第四章　漢代受命改制的鼓吹與其實現

自從秦始皇聽了齊人的話用鄒衍的法典去改制度，易服色，又聽了齊、魯儒生的話到泰山去封禪，表明了這是一代受命有天下的大典，漢代的皇帝就不該不這樣辦。不料高帝因秦有青、黃、赤、白四帝之祠而沒有黑帝祠，給他補上，算作符瑞，仍自居於水德，制度服色一仍舊貫；而且全國的東部封建了許多王國，天子不便到泰山去，連這一件輕而易舉的封禪之禮也沒有舉行。這眞把一班懷着開國規模的儒生方士急死了。加以這種學說既已風行，卽成了社會上的公同的信仰與要求，所以連一班準備看熱鬧的民衆也等得不耐煩了。

於是有人屢屢提出這個問題來，督促天子去實行。第一個是賈誼，他以

為漢承秦後，當為土德；他就打起一個土德制度的草案來，色尙黃，數用五，改正朔，定官名，把秦的水德之制一切改過。然而他年輕，許多老臣瞧不起他，又怕他擅權，他們設法把他擠走了。第二個是魯人公孫臣，他也以為漢是土德，豫言將有黃龍作它的符應，當時雖遭張蒼的反對，但隔了一年（文帝十五年，）黃龍居然出現於成紀縣，於是文帝信他的先見之明，拜他為博士，叫他和諸儒同草這新制度。新垣平大約也是其中的一個；所以他一被誅，這件事又擱下了。

到武帝卽位，那時漢興已六十餘年，天下太平，家給人足，許多耆老都殷殷地期望他封禪和改制。恰好他是一位好大喜功之主，又憑着漢家全盛之業，那一件事不好做。所以他就招了趙綰、王臧一班儒者作公卿，要在城南立明堂以朝諸侯，又草巡狩、封禪、正朔、服色諸制。他們因為這事重大，舉薦他們

的老師申公作指導;武帝很敬重他,派人用安車駟馬迎了來。這事眼看成功,想不到武帝的祖母竇太后喜歡老子之言而不愛儒術,借一點小事把趙綰、王臧下了獄,他們都自殺,一切舉辦的事也就全付了東流!

到武帝建元六年(西元前一三五)竇太后去世。只過了半年,武帝就舉孝廉,試賢良,董仲舒一班人受了他的特達之知,以前的計畫又有施行的可能了。只因此後十餘年中,忙於征伐匈奴及南越等國,講不到文治,所以濟北王雖早把泰山獻了出來,也沒有實行封禪。到元封元年(前一一〇)他纔決定到泰山去,可是他身邊的一班儒者依然像一百年前地不解事:他把祭器給他們看,他們說和古代不一樣;問他們古禮究竟怎樣,他們也說不出一個所以然來,並且各個人說得都不同。武帝到這時候,禁不住發秦始皇的脾氣了,就把他們完全黜去,用了祭泰一(上帝)的禮去封泰山,又禪於泰

山下的肅然山。祭的時候，叫人把遠方的奇獸珍禽放了滿山，好象眞來了管仲所說的麒麟鳳皇一大套。那幾天天氣很好，沒有風雨，顯見得他的福命比始皇强。禮畢之後，他坐在明堂受羣臣的更番上壽。於是下詔改元爲元封。此後，他又曾修封過四次。

這一次，從漢代人看來，它的含議眞重大。那時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任職太史令，不知爲了何事留在洛陽，不得觀禮，心中一氣，病重了。他臨終時，握着兒子的手，一邊哭，一邊說，「今天子上接千歲之統，封泰山，這是怎樣的盛事，而我不得跟了去，這是命罷！這是命罷！」一生在二千年之下的我們，讀到這句話，彷彿看見了他的信心與傷心。卽此可知武帝的大事就是當時民衆們所共同要求的大事啊！

又過了五年（前一〇四），他正式宣布改制：定歷法，以正月爲歲首，服

色尚黃；數用五；官名的印章改爲五字。這年改元太初；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一百年來的懸案到此方因運動的成熟而實現；而其以建寅之月爲正月，直到中華民國改用了陽歷纔廢除，尤不僅是漢家一代的制度。這件事是司馬遷等鼓吹起來的新的歷法也是他和幾個天文學家合定的。他做了這件事，高興得跳起來，以爲周公卒後五百載而有孔子，定了許多制度；孔子卒後五百載而有他，又定了許多制度：他眞可直接孔子的道統了；所以就在那一年，開始作史記以繼春秋。改制對於學術的刺戟力有這樣的强烈！

不過我們要問：秦爲水德而尚黑，漢爲土德而尚黃，這是照着五德說的；但秦以建亥爲正月，漢以建寅爲正月，並沒有相承的次序，這爲什麼呢？推究起來，這一囘的改制實在不出於一個系統，他們是用五德說易服色而用三統說改正朔的，因爲在三統說裏，漢是黑統，黑統建寅。可是我們與其說他們

用了三統說而改正朔，似乎不如說在實際上早有把建寅之月定爲正月的必要，所以三統說中纔把漢豫先排成了黑統。當漢初百年中，所用的顓頊歷太不適於實用了，弄得每逢晦朔見了月亮，上弦下弦見了團圓的月亮，民衆們早已厭惡，經師們亦有「孔子傳夏小正」及「孔子用夏時作春秋」等傳說，希望改得與夏歷一致；而這次的改正朔也並不輕易，乃是唐都、落下閎等一班天文學家精密推算的結果，是有客觀的根據的。不過在那時的思潮流中，不塗上陰陽五行的色彩總行不通，所以三統說的改變五德說而主張漢當建寅，說不定卽是爲了這個使命。從此之後，漢是確定爲土德了。

第五章　漢武帝的郊祀與求仙

當始皇統一天下之後，令羣臣議稱號。他們答說，「古時有天皇、地皇、泰皇，其中最貴的是泰皇。我們敬請以『泰皇』爲尊號。」始皇聽了他們的話的一半，把這三皇合於五帝，定尊號爲「皇帝。」這三皇是個什怎樣的人物，從那裏來的，古書裏找不到記載，我們無法知道。

漢武帝卽位，受了方士李少君們的誘引，很喜歡祀神求仙。其中有一個亳人謬忌，他請求祭祀泰一，大意是，「天神最貴的爲泰一，他以五帝爲輔佐。古來的天子都在東南郊建壇祭他，日子是春秋兩季，祭品是每天一具太牢，一連祭上七天。」武帝聽了他，就令太祝在長安城的東南郊立了一座泰一壇，照這說法去祭。此後又有人上書說，「古來的天子每三年祭一回三一；這

是三個最高的神：「天一、地一、泰一。」武帝又照辦了，在泰一壇上一塊兒設祭。——看了這兩件事就可以知道秦的三皇即是漢的三一，他們是大神，地位在五帝之上的。這種天神無疑地發生於陰陽說：天一是陽神，地一是陰神；泰一更在陰陽之前，爲陰陽所從出，所以謂之最貴。易傳裏說，「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泰一便是太極，天一和地一便是兩儀。至高無上之謂泰，絕對不二之謂一，本來是一個哲學裏的名詞，卻給宗教家取去作爲神靈的稱號了。從此以後，泰一就是上帝之名，上帝就是泰一之位，終漢一代再也分不開來。

元狩三年（西元前一二〇），齊人少翁得了武帝的信用，在長安西北的甘泉山築造離宮，畫了天、地、泰一諸神，時時拜祭，要使武帝和神靈通話，不幸沒有成功。後二年，帝武大病。那時有一個上郡的巫在甘泉宮內祠着神君，他的通話的試驗成功了，於是他傳達神君的話與天子，說道，「病是就會好

的，不必怕；等您身體健旺些時，就來會見我們罷！」一人竟能親接神，這是何等的幸福！武帝心中一高興，病已好了一半；及至甘泉，居然恢復了健康。神君數目甚多，其中最貴的是泰一；一時去時來，來時風聲颯然。神君在帷幄中說話，聲音和活人一樣；說話的時候多半在晚上。天子齋戒而入，聽得很有味，雖則他們所說的都是些平常的話語。這時候，甘泉就成了一個宗教的中心了。到元鼎五年（前一一二），武帝即在甘泉立起泰畤壇，樣式同謬忌的泰一壇差不多，凡三層。五帝是泰一的輔佐，所以他們的壇環繞在下面，青、赤、白、黑四帝各按照了五行說中的東南西北的方向；只有居中的黃帝沒法辦，便把他的壇安置在西南角上。祭的時候，殺一白鹿，把猪和酒裝在它的肚裏；又殺一白犛牛，把白鹿裝在它的肚裏。掌祭泰一的祝宰穿的是紫色衣，掌祭五帝的分穿了青赤諸色衣。又祭日和月；祭日的穿赤衣，祭月的穿白衣。這年十一月初

一是冬至，趁這好日子，天子就於黎明時行郊禮，對泰一下拜。早晨祭日，黃昏祭月，因爲它們的地位都不高於天子，天子都長揖。明日，有黃氣上冲；羣臣鼓舞，以爲這是上天的祥應。後來武帝在汶上造了明堂，也把泰一和五帝祀在堂上。五帝分司五個天，泰一做他們的總管。戰國時破壞的天上秩序，到這時又建設起來了。

周代的祭禮有郊有社，郊以祭上帝，社以祭后土。所以春秋時人設誓，常稱「皇天后土實聞此言」，見得天帝和地神是最大的兩個神。漢得天下之後，沒有想起后土，確是一個缺典。因此，司馬談等請求在澤中立后土壇。元鼎四年（前一一三），武帝巡幸到汾陰，聽說汾水旁有光騰起，像一疋紅紗似的，他想起了司馬談的請求，就在那邊立了一座后土祠，祭禮和郊祀上帝時一樣。於是天地之祀有了固定的地方，祭天在國都西北的甘泉，祭地在國都

東北的汾陰，都要走二三百里地。好在武帝喜歡旅行，爲了祭祀跑許多路，在他是不覺得累的。

武帝一世裏，方士們的奇蹟與醜相都顯露得不少。他們的工作大概可以分成下數類。其一是召鬼神，如武帝所愛的李夫人死了，他思念甚苦，少翁能把她的魂靈攝來，讓他在幃中望見。其二是鍊丹沙，如李少君說的祠竈之後，丹沙會得變爲黃金，把這黃金作爲飲食器可以益壽求仙。其三是候神，如公孫卿到名山尋訪仙人，有一天夜裏在東萊見有長數丈的大人，迎上去已不見，留下了很大的脚印。至於入海求蓬萊，指山說封禪的也是很多。但方士口中的封禪的意義和儒者是不同的，儒者爲的明受命，他們爲的求不死，所以有一個申公（不是議明堂的那一個）說：「封禪之後就會白日飛昇。以前的七十二王，只有黃帝是得上泰山的。因爲他封得成，所以他鑄好了鼎，就

有垂髯的龍下來迎接他上天。當時黃帝跨了上去，許多臣子和宮女也想升天，各各爬在龍身上，擠到七十餘人再也擠不下了；臍下的人只得攀住了龍髯，可是龍髯不是鐵鍊，支持不起，髯脫了，人也跌下來了。」武帝聽得這故事，歎息道：「唉，我要能和黃帝一樣，還有什麼人世的留戀呢！」過了些時，他巡狩朔方，經過橋山，瞧見黃帝的冢，不禁疑惑起來。旁邊的方士趕快解釋道，「黃帝上天了，羣臣在這裏葬了他的衣冠！」

武帝求仙求了五十年，用了許多方士，又殺了許多方士，甚至把自己的女兒嫁給方士，然而不死之藥究竟不能得到。無可奈何地自慰，只有在建章宮北面的泰液池內築了幾個島，喚做蓬萊、方丈、瀛洲，雕刻了許多石魚石鼈排列在上面，算是眞到了海上神山了。

因爲他的求仙和封禪都和山有關係，所以天下名山又經過了一回整

理。那位講黃帝故事的申公曾說：「天下有八個名山，三個在蠻夷，五個在中國。這中國的五個名山是華山、首山、太室山、泰山、東萊山；都是黃帝常游的地方，他就在這些山上和神靈相會。」用現在的地域說來，華山在陝西，首山在山西，太室在河南，泰山和東萊在山東，都在黃河流域，並不曾按照漢代疆土平均分配。所以武帝另行規定，以河南的太室爲中嶽，山東的泰山爲東嶽，安徽的天柱山爲南嶽，陝西的華山爲西嶽，河北的恆山（在保定西）爲北嶽。這又是五行思想的具體表現。從此「五嶽」成爲一個典則而且習用的名詞。經學家爲要提高它的地位，就說爲堯、舜時已有的制度。但安徽並不很南，所以後來又改以湖南的衡山爲南嶽。山西渾源縣本有一個玄嶽，明代定嶽制，以玄嶽爲北嶽，於是恆山也從河北移到山西去了。到現在，我們所稱道的就是這個武帝的五嶽的修正本。

還有一個重要的制度也是從武帝的封禪和求仙來的。大家知道，中國的皇帝有年號；這種風氣傳到鄰邦，使得朝鮮和日本等國也有了年號。這事的創始，由於武帝的獲麟。當他卽位了十九年（西元前一二二）到雍縣祀五帝，乘便打獵，獲得一匹獸，它的毛是純白的，頭上卻只有一個角，大家不識得，猜想應是麒麟，於是作白麟之歌以記其盛，後來羣臣請定這一年爲「元狩」元年。倒推上去，把過去的十八年劃爲三段，定第一個六年的年號爲「建元」，第二個爲「元光」，第三個爲「元朔」。又過了六年（前一一六），汾陰縣掘得一個大鼎，武帝又認作祥瑞，迎至甘泉，改元爲「元鼎」。再過了六年（前一一〇），他到泰山封禪了，改元爲「元封」。再過了六年，他改正朔，易服色了，又改元爲「太初」，這新定的曆法也就稱爲太初曆。從此以後，每個皇帝必有年號，逢到什麼祥瑞也就改元。例如漢宣帝的「黃龍」

「神爵，」「吳大帝的「嘉禾，」「赤烏，」都是一時張揚的奇蹟。可是這個制度雖由迷信來，究竟年代有了標題，於實用上甚是便利。別的不用說，即如周代器物常刻「唯王……年，」後人既不知道這王是那一王，就不知道這年爲那一年，有了年號，一看便知道了。

第六章　天象的信仰與天變的負責者

古人相信天上有上帝管着人間的事，表現他的最高的權力。然而上帝是無聲無臭的，有什麼東西可以作他的具體表現呢？他們想天上有日月星，是我們瞧得見的，日月星的變動應該就是上帝的意思吧，所以他們就把天文的現象當作上帝對於人間的表示。一部春秋，每年記載人事總是寥寥的幾條，而「日有食之」卻記了三十六次。所以然者，正爲這是天變，是天降禍患與人們的豫示，比了一切的人事都重要。因此，當每次日食，天子和諸侯都要減掉好吃的飯菜，又要從正寢裏搬出來；百官改穿素服，樂官在朝中打鼓，祝官在社神前獻幣，史官代他的主子作了冊文責備自己。此外星辰之變，春秋中記載亦多，如「恆星不見，」「星隕如雨，」「有星孛入于北斗，」「有

星孛于大辰」等都是。他們把天上的星分做幾區，又把天上的區域拍合到地上的國家，所以那幾個星變了就是那幾個國該遭殃了。這種學說後來叫做「分野說」也有各種不同的說法。

司馬遷曾經發過一句牢騷，說「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卽此可知當時的史官必須懂得星歷，大約現在「歷史」這個名詞就從這上面來的。他說和卜祝相近，這話很對，因爲星歷和卜祝本是拆不開的。我們看他的天官書，簡直把天上的星寫成了一個國家：人的方面有天王、太子、庶子、正妃、後宮、藩臣、諸侯、騎官、羽林天軍；屋的方面有端門、掖門、閣道、明堂、淸廟、天市、車舍、天倉、天庫樓；物的方面又有帝車、天駟、槍棓、矛盾、旌旗之屬。至於星辰示象，如南極老人星見則治安，不見則兵起；歲星色赤則國昌，赤黃則大穰，青白而赤灰則有憂；狼星變色則多盜賊；附耳星搖動則讒臣在側；木星犯了土星要內

亂；火星犯了土星要戰敗，……這種法則也講得很多。總之，他們把天上的星辰組成了一個系統，又把天與人的關係組織爲一個系統，使得天人之間發生了密切的感應。他們很用心觀天（劉向常夜觀星宿，不寐達旦。經學家如此，天文家可知，）看見天上有一些變動時，就以爲人間將有某事發生，並推其將應驗於某人。如其是凶的，就要行他們的禳解的法術。

古代的國王和諸侯都兼了教主的職務，負有以一己代替全國人民的災患的大責任。古書裏常提起湯禱的故事，說：湯的時候大旱了七年，於是他以自身爲犧牲，到桑山的樹林中祈禱。他剪了髮和爪，投身在柴上，要把自己燒死。天哀憐他，就下雨了。遇到國君不肯犧牲自己的時候，也可設法使臣下代負這責任。就如上面講起的拒絕祭河神的楚昭王，他臨死的一年，忽然天空中的雲像許多赤色的鳥，夾住了太陽飛舞，一連顯現了三天。太史對他說，

「這個禍患固然應由國王去擔當，但請您不要害怕，只要禳祭一下，還容易移於幾個大官像令尹啊，司馬啊，都是代替得您的。」可是這位硬性的昭王竟毅然地答道「我倘使沒有大過天爲什麼要使我死！我如眞的有罪，應當自己受罰，又爲什麼要害我的股肱之臣！」他挺身承受了這個禍患。

到了漢代，由於戰國時自由批評的反動，對於神的信仰增高，這種思想又復盛極一時。文帝二年（西元前一七八）十一月晦日有食之，他下詔道：「我聽說天生了百姓，就爲他們立君；如果這個君的德行不修，或政治不明，違背了立君的本意，天就要用災象來警戒他。現在天下的治和亂，都在我一個人的身上。不幸我不能盡我的教養人民的責任，以致掩蔽了日月的光明，我的過失眞大極了！你們應當把我的錯處都說給我聽，並舉出賢良方正和能直言極諫的人來匡正我纔是！」十三年（前一六七）他廢掉祕祝之官，

爲的是他們在祓解時常把災害移給臣下。明年，他又因祠官的祝福專爲皇帝而不爲百姓，令其停止祈禱。在這種地方，都可見他的責任心不亞於楚昭王，所以不願享福而但願受過。

後來的皇帝沒有他這樣的好心了，天變的責任只得請丞相擔負了去。當元帝永光元年（前四三），春霜夏寒，日青無光，丞相于定國就繳上侯印，自劾而去。薛宣做了丞相，恰逢到永始二年（前一五）的隕星和日食，成帝就給他一個册書，說道：「災異數見，秋收又不好，這都是你做了丞相的緣故。快些把印綬解下了罷！」他走了之後，繼任的是翟方進，爲相九年，沒有出什麼岔子。不料綏和二年（前七）熒惑星守住了心星，其凶應在皇帝。有人上書，攛掇成帝讓大臣去擔當。他聽信了，也就發下册書，把翟方進重重地罵了頓，並賜給他酒十石，牛一匹，作他最後的餐食。他只得即日自殺了。成帝看

他做了自己的替死鬼，未免有些不忍，所以對于他的飾終典禮非常優異。很不幸的丞相二月自殺，皇帝就於三月壽終了，並沒有達到替災免晦的目的，翟方進只算得白死！

因爲有了這件故事，所以漢儀注裏就規定了一條慘酷的法典，是：天地有大變時，皇帝派侍中持了使節，乘四白馬，帶着尊酒十斛，牛一頭，到丞相家，把這殃咎告知他。侍中走到半路，丞相即上書告病。侍中回朝，還沒有覆命時，尚書就把他的死訊報與皇帝。——這個制度雖沒有使用過幾回，但此後逢着天變把丞相免官還是常事，就是不當權的也往往免不了這個責任。商湯和漢文帝之風眞是「邈乎尚矣！」

第七章　災異說和西漢的國運

上一章所講的是商、周到漢代對於災異現象的觀念及其反應。在這一點上，漢人是完全承受商、周的思想的。但他們畢竟有比商、周進步的地方，就是用了陰陽五行的學說來整理災異的現象，使它成爲一種極有系統的學問。

司馬談曾批評陰陽家道，「他們依據了陰陽，四時，八位（八卦的方位，）十二度（星的十二次，）二十四節氣，定出許多教令，說順着這教令的會昌盛，逆着的會死亡；這未免使人太多拘牽和忌諱。但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本是自然的法式，人事的綱紀，他們要人家遵循這個次序是不錯的。」一看漢書藝文志，列在陰陽家的有鄒衍、鄒奭、南公、張蒼等人，可惜他們的著作全已

失傳。所幸的散見各書的五德終始說可以輯出，又有一部完全的月令可以借鑒，我們還能知道它一個約略。我們可以說，自從有了陰陽家之後，天象和人事經過一番系統的整理，比了商、周時的災異觀念精密多了。

一部月令，雖是說得呆板可笑，但它的中心觀念只是「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八個字。他們以為春天是萬物生長的時候，一切的政治和人事都應向了生長方面進展，俾得增加自然界的動作的力量。所以在那時候，向來關閉的地方要打開，刑罰要停用，犯人的桎梏要解除，伐木和打獵要禁止，讓人和物各得欣欣地生長。一到秋天，造物者降下一股肅殺之氣，草木隨着黃落，國家也就可以出兵打仗，行法殺人了。他們立說的宗旨只是希望「天人合一」——他們要使春天像個春天，也要使春人像個春人；因此，他們對於反常的時令非常害怕。他們說，倘使孟春行了秋令將有大瘟疫，仲春行了冬令將大

旱，季秋行了冬令將多盜賊，孟冬行了春令將多流民，仲冬行了秋令將有大兵災。這類的話很多，一時也說不盡。總之這個災異說的系統是建立於時令反常上的。

尙書裏的洪範，它把人事的「貌、言、視、聽、思」和天氣的「雨、暘、燠、寒、風」合在一起。它說國君的貌正了，雨就照着時候，不多不少地降下來了；倘若不正，這雨也就降個不歇，成了淫雨。其他言和暘，視和燠，……也都有這樣的關係。作者的宗旨和月令一樣，要使應該下雨的時候下雨，應該刮風的時候刮風，得其時，亦得其正。本來是一個平常的意思。但他以爲天氣都和君主的一舉一動有關，這卻是神祕的排列式了。到漢代，更把這篇文字放大爲洪範五行傳（編入尙書大傳中），說貌如不正，不但有淫雨之災，還要有服妖，有龜孽，有雞禍，有靑眚靑祥，有下體生在上身的病；其他四種也有這類的怪

現象。後來劉向和他的兒子劉歆各把古來禍福之事分派到各類，著了一部十數卷的災異史；班固錄入漢書爲五行志。這種災異說的系統又是建立於君主的態度不正上的。

因爲他們的學說有這樣的精密，所以發生的影響亦是異乎尋常，造成了商、周時所不會有的事實。

卻說武帝之世正值漢家全盛時代，先朝積蓄了六七十年的財產，給他在五十年中郊祀、求仙、巡狩、封禪，加以四方的征伐，花費個乾淨。到用盡之後，只得立下許多苛捐雜稅，維持他的奢侈慣了的生活。因此弄得人民筋疲力竭，盜賊紛紛起來，再碰着荒年，竟至赤地數千里。人民怨望之餘，不禁發生了五德說下的希望，這就是說漢的氣運盡了，該有新受命的天子起來了！昭帝元鳳三年（前七八），泰山下一塊一丈五尺長的大石忽然自己站起，上林

苑中一株臥地的枯柳也自己站起。有一位春秋學家眭孟推說其意，以爲石和柳都是陰類，下民之象，而泰山乃是帝王受命封禪的地方，可知將有新天子從匹夫中突起；漢帝應卽尋求賢人，把帝位讓給了他。但堯、舜禪讓的事本是一種想像，既做了皇帝還那裏會讓呢，所以眭孟就以妖言惑衆之罪伏誅了。

京房是專治周易的，他曾想出一種卜法，把六十卦的三百六十爻，以一爻值一日，又把賸下的震、離、坎、兌四卦分主二分二至；這樣恰恰是一年。更以當時的風、雨、寒、溫的氣候定所卜的吉凶。有一天，元帝召見他，他乘機進言道，「春秋一書，記二百四十二年中的災異，給萬世之君看個榜樣。現在自從您卽位以來，日月失了明，星辰逆了行，山崩了，泉湧了，地震了，石隕了，夏天有霜，冬天有雷，春凋葉，秋開花，春秋所記的災異一齊見了。請您自己想想，倒底是

治是亂？」說到這樣，元帝也只得歎一口氣道，「實在是亂極了，再有什麼說的！」粗看這種話，似乎不錯。但試想漢的疆域多少大；這樣大的地方，地文上不當有些變態嗎？這種事，武帝時何嘗沒有；只是那時的社會正沉醉在禎祥的空氣裏，大家不提罷了。

谷永是繼承京房之學的。永始二年（前一五，）有黑龍見於東萊，成帝派人去問他。他答道，「漢家行夏正，色尙黑。黑龍是同姓之象，恐怕本族中人有舉兵謀反的。」唉，這條黑龍若出在文帝前，豈不成了漢的水德的符瑞？就是出在武帝後，也何嘗不是漢的黑統的符瑞？爲什麼成帝時出來了，就不成祥瑞而反爲災異呢？這種話固然不眞實，但的確映現了一個詭譎不安的社會在後頭。在這個社會裏，大家覺得漢的國運是快完了。可是那時既沒有內亂，也沒有外患，怎樣可以把漢家滅亡，倒是一個不易解決的問題。

在這沉悶的空氣中，有一個齊人甘忠可造了一部包元太平經，說「漢家的氣運固然完了，但上帝的意思還許他第二次受命；因此，他派了赤精子下來，傳與我這部書。」這天開的異想，可算是一個轉圜的辦法。不幸因劉向的不贊成，把他下了獄，就病死在獄裏。後來哀帝卽位，他的弟子夏賀良繼續鼓吹，居然成功：哀帝就宣佈再受命，大赦天下，改元爲太初元將（前五），改號爲陳聖劉太平皇帝，這衰頹的舊國似乎得到一種新生命了。不料夏賀良等志得意盈，就想奪取政權，斥去舊時的三公，爲人所嫉忌，不到兩月，哀帝把他殺了，這再受命的滑稽劇便一霎時閉了幕。

換一個人受命罷，沒有這個人。漢家再受命罷，也做不成功。維持下去罷，災異說已把漢家的地位在精神上打倒了。進既不可，退又不能，大家悉在這彊局之下徘徊觀望。

第八章　黃老之言

中國的上古史，說它長也眞長。看傳統的史書，從夏禹到現在有四千年，從黃帝到現在有五千年，從三皇到現在約有十萬年，再前一點就是開闢天地的盤古氏了。照這樣說，自從有了天地就有我們民族的歷史，從此不曾斷過，眞是極大的光榮。可是我們翻開東周以上的書，其中只有稱說夏、殷，夏以上就一字不提，這爲什麼呢？記孔子之言的論語，墨子之言的墨子，孟子之言的孟子，提到夏以前了，但也只有堯、舜。因此，儒家編集的尙書就託始於堯典。堯以前有無帝王，這問題是沒人提起的。看孟子說的「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氾濫于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偪人，」彷彿堯的時候還是洪荒初啓，他以前不能再有別的帝王，就使還有也是無從知道

的了，但稍後於孟子的鄒衍，他的歷史說就從當時直序到黃帝，再推至窈窈冥冥的天地未生之際，可見他以爲黃帝是堯、舜以前的帝王，歷史記載的開頭。這一變便使上古史換了一個新面目。司馬遷作史記，列五帝本紀於夏本紀之前，而以黃帝爲其魁首；他的歷史地位就益加鞏固，直到如今不曾動搖。

但是爲了儒家的孔、孟都不提黃帝，他們的經典尙書也沒有敍述到堯以前，所以黃帝在儒家中是不占勢力的。至於陰陽家、道家、神仙家、醫家、歷家……都常說起黃帝，而且把他看作教主，因此他竟成了一個極偉大的偶像，由他開創了中國的全部文化。依我想，這完全是時代因緣的湊合。假使他的傳說發生得早些，自會成了儒、墨二家崇拜的對象。假使堯、舜的傳說發生得遲些，他們也就變爲「百家言不雅馴」的箭垜。這立言的諸子何嘗像我們這樣用功研究古史，他們只是拉了一個當時認爲最古且最有力的人作

自己的學說的保護者而已。黃帝是怎樣一個人物，或只是天上的五色帝之一，或再有別的背景均不可知；但他的傳說普及於學術界是戰國末年的事，其發展直到西漢，則是一個極明顯的事實。所以我們如果研究黃帝切勿以爲所研究的是夏以前史，應當看做戰國、秦、漢史，因爲他的學說只是戰國、秦、漢間的思想學術的反映，只是表現了戰國、秦、漢間的文化。

老子，名聃，說是周朝的史官，作有老子一書，又名道德經，他在學統中的地位正像黃帝在帝統中的地位一樣高。大家說，他是孔子的老師，他是先秦諸子中的第一個，他是道家的開創者。因爲作師的老子開創了道家，他的弟子孔子開創了儒家，所以一向公認道家在儒家之前。可是到了現在，我們從種種方面研究，都得到相反的結論：老子這個人必在孔子之後，老子這部書又在老子之後，老子不是道家的開創者，道家的成立又遠後於儒家。這些結

論的理由複雜得很；現在我們且不談考據，先講一講孔子以來的學術界的情形。

學者們的思想不是順着時代就是反着時代，孔子是反時代的一個人。當他的時候，舊式的封建組織已漸崩潰，他目睹「君不君、臣不臣」的樣子非常生氣，所以提倡「正名」和「禮治」要維持舊制度，又改良舊制度。他造成了一個新學派（這學派後來喚做「儒家」）常把舊制度加上自己的理想來鼓吹和演習。他又因宗法組織將聯帶崩潰，所以提倡孝道說生時應怎樣的奉事，死了要怎樣的喪葬，借着親子的感情作維持它的工具。後來諸國內外吞併愈烈，成年的打仗，殘餘的貴族又奢侈得利害，人民陷於水火之中；如何可以作迫切的救援，這一點就不是儒家所能負的使命。所以墨子起來，打破孔子的維持舊制度的政策，直捷痛快，主張「兼愛」以毀滅宗法

組織，主張「尙賢」以毀滅封建組織。他不要什麼帶有貴族性的禮樂，只要一班平民都有飯吃，可以過他們的正當生活。他四面奔跑，勸止戰爭，簡直只看見人民忘記了自己。但不久出來一個楊朱，他對於救世問題又換了一種看法。他覺得世界之所以亂都由於心的外騖，一個人的慾望是永遠塡不滿的，不幸大家要求盡量的滿足，就激起了許多爭鬪。他以爲人人肯不奪別人所有以利己，也不讓別人奪去自己的所有，那時世界就太平了。他以爲墨子固然一團好心，但只見別人而不見自己，這也算是騖外，和縱慾的人有同等的弊病，所以他主張保全自己的精神和形體，不受外物的引誘，拔一根毛去利天下人是不做的，把天下的東西來供一己的使用也是不取的。他的主義就稱爲「爲我。」在那時，孔、墨、楊三派鼎足而峙：一派主張復古，一派主張捨身救世，一派主張捨世救身。

既已三派分立，叫後來的人何所適從呢？於是起來了一個孟子。他的生地極近孔子，早受了儒家古禮的薰陶；他遭逢的時勢比墨子更壞，也感染了墨家救世的風氣。他想出一種主義，稱之爲「王政」，到新近稱王的幾個國家去，對國王說「你們稱王不是想統一天下嗎？須知要達到這個目的，非先行我所說的王政不可。」他的主義沒有什麼特別的，只是想限制貴族的權利，使平民都有溫飽的生活可過；又要使德行最好的人成爲政治地位最高的人；這些意見都和墨子之說很相近。但一提到家族制度，則他完全承受孔子之說，維持父權，提倡厚葬和三年之喪，因此，他罵主張兼愛的墨子爲「無父。」同時他因反對個人主義，也聯帶罵那主張獨善的楊朱爲「無君。」（這個君不是說掌握大權的君王，只是泛指國家與社會，說楊朱不肯爲人所用，不盡國民的責任而已。）我們可以說孟子不是純粹的孔子之徒，他乃

是孔、墨兩家的調和者。在孟子時，還有一個人是調和墨與楊的，叫做宋銒。他的學說有兩方面：在外的是「禁攻寢兵，」在內的是「情欲寡淺。」這就是說，他用墨子之學做事業，用楊朱之學修身心。他要兼顧別人和自己，使之得到同樣的滿足。他說「一個人所以和人爭鬪，只爲受了別人的侮辱。但你自已的人格並不因了別人的侮辱而有損傷，所以你受的侮辱並不是你的眞羞辱。而且一個人的慾望是本來不多的，只要你心有所主，不使外面的東西擾亂了你的心，增加了你的慾望，那麼，你既不侵犯別人，別人也就不來侵犯你了。」這不能相容的三大派，有了他們二人的調和，居然漸漸地接近起來。

楊朱和宋銒都討論到人性的本質，人和外物的關係，及如何可以保全自己的眞性等問題。以戰國時思想的解放，學術界進步的急速，這個趨勢就使一班學者超出於實際的政治論而向哲學方面走去。他們要討論宇宙的

本體了，要討論智識的眞實性了，要討論人生的究竟意義了。於是有的以清虛爲目標，不願立自己的主張，只想像鏡子這樣，照着萬物。有的說智識是靠不住的，而且也求不盡的，何必這樣自尋苦惱呢，只消委心任運好了。他們看出一切的觀念都是相對的，所以有大小、高下、是非、壽夭等等差別；但實體是絕對的，沒有差別的。他們喚這個絕對的實體爲「道」；以爲得道的人的心中就不存着這些差別，所以由他看來，萬物都是一齊的。「道家」這個稱謂就從這裏來了。他們的話都說得非常玄妙，使人不全懂也沒法駁。然而因爲他們要得到這個最高的「道，」把人世間事看得很輕，社會的規律無形中都給打破，使得統治國家的人感到棘手。又因一般人民學會了他們的辯論法，死裏說出活來，弄得任何事情都沒有固定的是非可據，尤使統治者痛苦。所以到戰國之末，激起了一個新學派，稱爲「法家，」專爲統治者說話；他們

主張遏滅私家之學，禁止游談之士，平民都須專力農作，不得隨便發議論。把這個意思講得最淸楚的是韓非的五蠹和顯學，其後秦始皇的焚書滅學，卽是這個政策的實行。

說了一篇戰國學術界的大勢，再囘到老子身上。老子是主張柔弱和謙下的。他所以這樣，並不是愛這樣幹，乃是因爲用了這種手段可以達到勝過剛强者的目的。他以爲要不受人家的欺侮，先要使對方不想欺侮。我柔弱了，好勝的人就不來和我生事了。如果對方決心要欺侮我，那麼我就讓他，他得其所欲也就完事了。但是他嘗到了這個甜頭，一定以爲欺侮人是容易的，他將愈敢放開這手腕，終至碰到了一個比他更强橫的敵人把他打倒而後已。所以，我的讓他並非我的吃虧，只是騙他走上倒霉的第一步，依然是我的勝利。而且愈肯吃虧的愈能獲得別人的同情，地位也就高起來。所以他說，事情

往往是相反的：吃虧就是便宜，便宜就是吃虧。這種見解，我猜想是宋鈃的「見侮不辱」的演進，是楊朱的「全生」學說的變相。如果猜得對，則老子應是宋鈃的後輩，怪不得孔、墨、孟的書裏全不會把他提起，他如何做得孔子的老師！至於老子這書爲什麼說不是他做的，則因書中說「絕聖棄知，絕學無憂」「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多知」等話完全是戰國末年的思想；這時以前的聖知正是社會上所期望的，它不會在民間生出流弊，沒有棄絕的需要。而且戰國時人每提到老子，只有說他主柔弱，沒有說他想毀滅文化，可見這些話不是他固有的。那麼，我們爲什麼不說他生於戰國之末，可以把它寫進了自己的書裏呢？這因到了那時，他爲孔子的師的傳說已起來了，叫人錯認了時代的人一定是早過去的，所以他不會生得太晚。因此，我們以爲老子這人是戰國中期的，老子這書是戰國後

期的。戰國後期的人作的書爲什麼要託老子的名？大概因爲這部書裏採用他的話最多，所以就用他作代表了；或者作者並非有心託他而被後人誤認了。

於是我們再要提出一個問題：老子爲什麼會成爲孔子的老師？我以爲這不是訛傳的謠言，乃是有計畫的宣傳。老子這個學派大約當時有些勢力，但起得後了，總敵不過儒家。他們想，如果自己的祖師能和儒家的祖師發生了師弟的關係，至少能聳動外人的視聽，爭得一點學術的領導權。於是他們造出一件故事，說孔子當年到周朝時曾向老子請教過，但他的道力不高，而且有些驕矜之氣，使給老子痛罵了一頓。他知道自己的根柢差得多，羞慚得說不出話。回得家來，只有對老子仰慕贊歎。借了孔子的嘴判定了老、孔的高下，顯見他們的門徒之間也是這等比例，道家的身價就可提高。想不到他們

這種宣傳不但如了願，竟至超過了豫期，而使儒家承認爲事實；又不但如此，而使儒家也增加了一段故事，說孔子曾向老子問過許多禮制，把老子也儒家化了。可憐的是老子裏既有「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的話，禮記中又有老聃答孔子問廟主、問葬禮的話，逼得他竟成了二重人格，自己打自己的嘴巴！他們這個工作成功了，索性再進一步，使出手段來拉攏黃帝。他們把本學派裏的貨色儘量向黃帝身上裝，結果裝得黃帝也像了老子，而後道家裏以老子爲「太祖高皇帝」，黃帝爲「肇祖原皇帝」，其學派的開創時代乃直頂到有史之始了。至於發縱指示的楊朱，早被一腳踢開，學術系統從此弄亂。漢書藝文志所列道家著作，有黃帝四經、黃帝銘等篇，注云「起六國時，與老子相似也」這就是黃帝與老子合作的成績，而「黃、老」一名也從此打不破了！

老子這書中主張君主應當淸靜無爲，對於人民要使他們吃得飽飽的，不存什麼野心，這和漢初承大亂之後與民休息的條件極相合，而且這書的文字簡短有韻，容易記憶，所以就風行於世。曹參爲齊王的丞相，那時天下初定，百姓流亡，聽得膠西有一位蓋公善治黃、老之言，就用厚幣請了他來，把自己住的正房讓給他，常去請敎。一連做了九年，果然齊國安集，大稱賢相。後來漢相蕭何死了，惠帝命他繼任。他一切遵照蕭何的原樣；把好出風頭的屬員都免了職，換用了樸訥的人。他自己天天飲醇酒，不管事。有人想勸他做事，他等那人來時就請他喝酒，那人正想說話時又敬上一杯酒，直灌到醉了，那人終沒有說話的機會。丞相府的後園靠近府吏的宿舍，他們常常飲酒，呼叫和歌唱的聲浪鬧得人不安靜。有人討厭了，請丞相去游園，以爲他聽得了是一定喝止的；那知他就在園中斟起杯子來，一樣地呼叫和歌唱，竟同隔牆的吏

人們相應答。惠帝看他不辦什麼，覺得可怪，問他，「是不是為了我年輕，瞧不起呢？」他道，「請您想想，您比高帝怎樣？我比蕭何怎樣？我們既都不及他們，只該遵守他們的規模。請您垂了裳，拱了手坐着罷！」

文帝即位之後，非常的儉樸。有一次他想造一個露臺，喚匠人估計，說須百金。不料這一個微小的數目竟使這位皇帝吃了一驚，嚷道，「百金，這是十個中等人家的家產呵！」就不造了。這樣的風度，固由於個人的生性，但漢初道家的勢力正瀰漫一世，說不定也是接受了黃、老的「寡欲」的遺訓。他的皇后竇氏極好黃、老之言，叫她的兒子景帝和自己母家的人都須讀老子。那時有一個詩經博士齊人轅固生瞧不起這書，批評了一句，她聽了大怒，逼他到獸圈裏去打野猪。景帝知道他危險，但又沒法改變太后的命令，只得揀一把快刀給他。他進了圈子，用勁一刺，居然刺中了它的心，應手倒了；太后纔沒

奈何他。後來武帝卽位，他喜事鋪張和他的祖父不同，好任儒生和他的祖母不同，於是這位竇太后又同自己的孫兒衝突起來了。當建元元年（西元前一四〇），趙綰等議立明堂以朝見諸侯，她心裏已嫌其多事，想來她總有牽掣他們之處吧，所以到了第二年，趙綰奏請武帝不必向長樂宮（太后所居）奏事，希望免掉許多麻煩。給她知道了，立刻下個辣手，把丞相和太尉都免了職，趙綰也就死在獄裏。在這種地方，都可見漢初的儒家遠不及道家之得勢。

道家的興起，老子的盛行，固有許多原因，而漢初的時勢實爲其重要條件。自從春秋末年以後，爲了推翻貴族階級人民捱受了二百五十年的刺戟和痛苦，到這時天下初平，着實應該休息了。以黃、老之言作爲休息的原理，本不算錯。所不幸的，這種柔弱和退讓的思想竟透進了我們的民族的骨子，使

得我們沒有熱心，只會隨順，沒有競爭，只有停頓，逢到了大事要把它化爲小事無事，逢到了難事要以沒辦法爲辦法，聽它自然的變化：一直傳到現在。

第九章 尊儒學而黜百家

墨子的政治主張，以爲作天子的應是天下最好的人，這個人是從人民中選舉出來的。有了天子，再由他去尋好人做三公和諸侯。除了選舉之外，還有禪讓的一法。天子年紀老了，就找一個最好的人作他的繼承人。墨子是根本否認貴族的存在的，他以爲下層的民衆，只要有本領，也可做得地位最高的天子。他舉的古人的例是堯、舜。他說，舜本來是一個歷山下的農夫，又曾做過黃河邊的陶工，還曾在雷澤摸過魚，常陽販過貨，是一個純粹的平民；但他的德行和才幹給堯知道了之後，他就受了堯的禪讓。這種說話經墨家一宣傳，居然成爲史實，便是承認貴族地位的儒家也引用起來了。

儒家的宗旨主於舊有階級的維持。他們以爲不是君主十分壞，壞得像

桀、紂一樣，總是不該推翻的。推翻之後，換了新主，階級制度還是照常。這一點是儒、墨兩家絕對不同的地方；所以墨家要提出天子和諸侯的來源問題，而儒家則不問。儒家所問的，只是朝廷的儀式怎樣；貴族的繼承條例怎樣；王國和侯國的典章如何不同；這一代和那一代的禮樂如何有別；祭祀鬼神、宴會賓客、聘問列國，以及冠笄、婚姻、喪葬等事應當怎樣辦。向好處說，他們要使在上的撫養子民，在下的恭敬長上，一切都有軌道，沒有爭、沒有亂，風俗益臻淳厚。若向不好處說，這簡直是麻醉民衆，叫他們安心做奴隸。

秦始皇統一了天下之後，還想做統一思想的工作，他把學問聚在皇室，立下嚴酷的法令，民間有偶語詩書的就犯殺頭的罪名。這一下當然使儒家失色。過了四年（前二〇九），陳涉起兵，魯國的儒生爲要出這口氣，就抱了孔家的禮器跑到他那邊去，孔子的八世孫孔鮒做了他的博士。不滿半年

（前二〇八），陳涉被殺，孔鮒也隨着死了；可是魯國的儒生又從此獲得了講習禮樂的自由。後來漢高帝滅了西楚霸王項羽，西楚的地已全奪了過來，只有魯國不降，於是他帶了很多的兵把魯城重重圍住。但這班儒生還在那裏行禮奏樂，絃歌的聲音飄散到城外。高帝也感動了，不忍打進去把他們屠盡，就拿項羽的頭給他們看，他們纔降了。

卻說高帝是平民出身，他的胸中沒有什麼貴族的架子，所以他很討厭這班專講架子的儒者。他剛起兵的時候，凡戴了儒冠去見他的，他總要使蠻把他的冠解了下來撒一泡尿在裏邊，表示他的侮辱。有一個秦博士叔孫通從關中逃了出來，輾轉到他那邊，知道他有這種怪脾氣，便扔去了儒冠，改穿了楚國式的短衣。他果然很喜歡他，拜爲博士。漢五年（前二〇二）天下統一，諸侯尊漢王爲皇帝；這卽位的儀式就是叔孫通所定。那時雖說是定了君

臣的名分，然而羣臣多從草野中發迹，不懂得什麼叫禮節；他們在殿上飲酒，往往爭論功勞；喝醉了也就大叫起來，拔劍向柱子砍去。這位平民化的高帝，因爲自己有了身分，對於這些粗魯的舉動漸漸覺得討厭了。叔孫通趁着這個機會，就進言道，「儒者固然不能圖進取，但守成是會的。請您下個命令，召集魯國的儒生和我的弟子一同商訂朝儀罷！我想現在應當採取古禮和秦儀，造成一種新制度。」高帝道，「你可以試一下，但不必太瑣碎，只就容易實行的做去好了。」叔孫通奉了旨，立刻自己趕到魯國去，招訪儒生。別的都欣然，只有兩人不肯走，他們說，「現在天下初定，死的沒有葬，傷的沒有復原，那裏可以興禮樂！要興禮樂，且待積德百年！」叔孫通聽了笑道，「你們眞正是不識時務的鄉下老兒！」他就帶了招到的三十三人到京城，和他自己的弟子百餘人，用綿索在野裏圍了一個圈子，插了許多茅草當作君臣的位次，演

習禮法。一月之後，他請高帝去閱禮；高帝以爲很好，命令羣臣照樣學習。七年（前二〇〇）十月（就是正月），長樂宮初造成，羣臣都到那邊去賀年。天剛亮，謁者就按照文武官員的等級，一次次引進了殿門。那時殿廷之中早已排列了車騎，陳設了兵器，升張了旗幟。上面傳一聲「趨！」殿下的郎中們數百人就夾侍在階陛的兩旁；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都向東站立；文官丞相以下都向西站立。於是皇帝坐了輦出房，百官傳呼警衛；從諸侯王以下直到六百石的吏員依了次序奉賀，他們沒有一個不肅敬振恐的。到行禮完畢，又在殿上置酒，他們都低着頭飲酒，沒有一個敢諠譁失禮的。斟酒斟到第九次，謁者高唱「罷酒，」他們都靜靜地退出。於是高帝說，「吾到今天纔知道皇帝的尊貴呵！」他就拜叔孫通爲太常，賜金五百斤。

起先，叔孫通初歸漢時，有一百多個弟子跟着他，他們都想做個小官；但

這位老師只向漢王面前推薦慣做強徒的漢子，永不提起他們。他們氣極了，常常罵他。他知道了，向他們說，「漢王正在冒了矢石和人爭天下，他所要的是能斬將搴旗的人，這種事你們會幹嗎？你們還是安心等着，我總不忘記你們的。」自從長樂宮朝賀之後，叔孫通就向高帝說，「這一班弟子們跟了我好久了，這次的朝儀是他們共同的功勞，您給他們一個官罷！」高帝立刻答應，都任他們爲郎。叔孫通出來，把賞賜的五百斤金完全分與他們。他們大喜道，「叔孫先生眞是最識時務的聖人！」

高帝去世，惠帝即位，他又拜叔孫通爲太常，對他說，「先帝的園陵和寢廟的儀式，羣臣中沒有能定的，還是請你老先生草擬了罷！」凡漢初的種種制度，都是他做太常時所討論規定的。他似乎沒有受到五德說的影響，所以他所定的禮，我們見不着五行的色彩。

秦代統一之後，沒有訂立許多新法制，國已亡了。漢興，各種制度都待創立，所以好言禮樂的儒家急欲發展他們的抱負。不幸文帝、景帝、竇太后都好黃、老和刑名，而歷來當國的丞相，蕭何、曹參、陳平、周勃、張蒼之類，有的是刀筆吏，有的是戰將，有的是策士，有的是道家，有的是陰陽家，他們對於儒家都沒有信仰；對於制度，也只要夠用就算，因此只望因襲舊的，不想創造新的。所以自從叔孫通死了之後，這制禮之業竟停頓了。雖有賈誼、公孫臣等鼓吹改制，也沒有什麼效果。

在這時，一班儒者等得不耐煩了。董仲舒是專精春秋的，他在文章裏說，一依照春秋的道理，新王必改制。爲什麼呢？就因新王是受命於天的，不是繼承前王的。倘使一切照了前王的制度，那和繼承前王的還有什麼分別？受命的王原是上天所特別提拔的人，一個人奉事他的父親倘且要先意承旨，何

況是天。現在上天特別提拔了你，然而你竟沒有把舊制度變更一點，顯不出這提拔的好意，這是天的意思嗎！所以遷都城、換稱號、改正朔、易服色，都不為別的，只為順着上天的意思，表示自己是新受天命的人罷了。」這樣說來，這種改制度的事並不為適合民衆的需要，只是要使上帝喜歡。更老實講，不過替皇帝裝點，使得他的地位以神祕的煊染而更高超而已。

自漢興到武帝之世已六十餘年（前二〇六——一四〇），魯兩生所說的「積德百年」的話已差不多了。武帝是一個好大喜功的人，他過不慣道家的淡泊生活，覺得儒家講得「天花亂墜」的各種制度很有趣，所以他一即位就用趙綰、王臧等儒者為公卿。他們做了公卿，第一件事就是準備在城南造一個明堂，為皇帝朝見諸侯之用。這制度還保存於禮記。書上說明堂是明諸侯的尊卑之堂，在這堂裏，天子背着屏風，南向而立，三公站在中階之

前，北向；諸侯站在阼階之東，西向；諸伯站在西階之西，東向；諸子站在正門的東隅，諸男站在正門的西隅，都北向。九夷在東門外，西向；八蠻在南門外，北向；六戎在西門外，東向；五狄在北門外，南向；九州之牧在二重門外，北向。這樣的「萬國衣冠拜冕旒」，天子的尊嚴那裏想像得盡；再看叔孫通的朝會之禮，僅列文武百官的次序的，就覺其規模的狹小了。

建元元年（前一四〇）冬十月，武帝詔丞相、御史、列侯等大官各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這是科舉制的開頭。舉來了一百多人，天子把他們問了再問。策問的結果，以董仲舒為最優；這就是很有名的「天人三策」。他的第三策的末尾說，「孔子作春秋，最看重一統。現在百家異說，各人有各人的主義，使得國家沒法立出一定的法制，百姓也不知道走那一條路好。據我的意見，以為凡不在六經裏的，以及和孔子的道理不合的，都可以截住它前進

的道路。等到邪說息了，然後政治可以劃一，法制可以明定，人民也得到了正確的路了。」武帝正心醉着儒家，他的話很中聽，就詔令丞相衛綰奏說所舉的賢良們，有的治商鞅、韓非的刑名之言，有的習蘇秦、張儀的縱橫之言，足以惑亂國政，請都黜退；於是這一次的選舉就只賸下了儒家。五年（前一三六，）他又置五經博士，提倡儒學的色彩愈加鮮明。人民爲謀自己的出身計，大家湧進了這條路。儒家所提倡的大典，如巡狩、封禪、郊祀、改制等事，武帝莫不一一舉行。自從他定了郊祀天地之禮，又集合了一個歌曲的班子，喚做「樂府，」用李延年爲協律都尉，命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作詩賦。每年正月第一個辛日，他在甘泉祭上帝時，童男女七十人一齊歌唱，從黃昏直唱到天亮。儒家鼓吹了幾百年的禮樂，到他的手裏而一齊實現。

但勸武帝罷黜百家的董仲舒，他眞是孔子的信徒嗎？聽了董仲舒的話

尊崇儒家的武帝，他眞行孔子之道嗎？這不勞我細說，只消把董仲舒所作的春秋繁露，和記武帝事實最詳細的史記封禪書去比較論語，就會知道。

秦始皇的統一思想是不要人民讀書，他的手段是刑罰的裁制；漢武帝的統一思想是要人民只讀一種書，他的手段是利祿的誘引。結果，始皇失敗了，武帝成功了。勸始皇統一思想的李斯，他是儒家大師荀卿的弟子；勸武帝統一思想的董仲舒，他是春秋專家。他們對於孔子尊敬的分量雖不同，但政策卻是一貫的。儒家主張復古，承認階級的存在；自從武帝定爲國教，這偶像直維持到現在。所以戰國之末雖已把封建制度打破，而封建思想還由儒家傳了下來，造成了無數宗法組織極嚴密的家族，使得人民上面忘記了國家，下面忘記了自己。

第十章 經書的編定與增加

儒家是主張復古的，凡屬記載古代的東西，他們都要搜羅保存。然而可憐，傳下來的古代記載少得很。這個緣故，他們不知道，以後的人也不知道，直待現代的我們方知道。原來商以前還是沒有文字的時代，那時人無法把事情記出。商代初有象形文字，字體常常變化，所記載的只是極簡單的某月某日作什麼事，用小刀刻在龜的腹甲和牛的胛骨上。因爲他們的記載大都是占卜的事情，所以今日稱它爲「甲骨卜辭。」自從清末在安陽出土以後，到現在中央研究院的正式發掘，已發見了三萬片以上，可以整理出一部商代史來了。但這三千年前的東西，我們能看見，秦、漢間的人卻不能看見。此後，記載的技術稍進，某月某日作什麼事之外還能記及人的說話；那時正以冶金

術的進步，大批製造銅器，就把這些記載刻在銅器上。因爲銅器不易損壞，所以秦、漢間人還有得看見。陳涉起兵之後，魯國的儒生抱了孔家的禮器去投他，這禮器就是前代的銅製用具。大概說來，樂器有鐘；食器有鼎、鬲、敦、簠；飲器有尊、彝、壺、罍、爵、觚；盥洗器有盤、匜。因爲一切生活的儀式都屬於禮的範圍，而儒家是主張復古的，所以凡是古人日用的東西都可以叫做「禮器。」因爲這些禮器中算鐘和鼎爲最大，所以後來就稱研究這類東西的學問爲「鐘鼎之學，」其文字爲「鐘鼎銘辭，」現在稱爲「金文。」這類東西固然秦、漢間人也有得看見，但他們看見的反不及我們多。當漢武帝時，汾陰掘出了一個特大的鼎，沒有字，大家驚爲祥瑞，武帝就改元爲元鼎。後來宣帝時，美陽又掘得了一鼎，官員們又說是祥瑞，勸皇帝重行元鼎的故事。有一位聰明的張敞，他是識得古文字的，起來駁道，「他們說得不對！這鼎的銘文是（王命尸

臣，「官此栒邑；賜爾旂、鸞、黼黻、琱戈。」尸臣拜手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丕顯休命！」（一）美陽是西周的王畿，可見這是周王把許多東西賜給這位大臣，大臣的子孫爲要表揚先人所受的恩寵，刻在鼎上，藏在祖廟裏的。這是舊藏的發見，不是祥瑞的天降！」他旣說得這樣清楚，宣帝也只得罷了。到宋代，這種古器積聚漸多，加以徽宗的提倡，鐘鼎之學興盛起來，把六百餘件的器銘編成了好幾部專書。到清代，以古文字學和古史學的發達，鐘鼎學的研究更深刻，一件古物發見時就有許多人作考證。至於今日，我們所知道的有銘辭的古器約有三千件了。這種眼福，決不是秦、漢間人所能有的。我們用了這些材料，也可希望整理出一部西周史來。商代之後，記載的技術又較進步，這人和那人間可以用書信往來，長段的事情和說話也能聯綴成篇。那時記載的器具是用漆寫在竹木製的簡上，一枝簡大約寫十餘字至二十餘字不等；用繩

子或皮帶把許多簡穿起來，就成了「册」和「篇」。自從秦將蒙恬發明了兎毫筆，寫字就輕易得多。西漢之世，簡和帛是並用的。帛可以卷起來，就成了「卷」。

自甲骨而鐘鼎，而竹木簡，而帛，物質的便利程度愈增加，記載的東西也就愈多。生在後世的人們用得慣了，看得慣了，正如紈袴子弟不知稼穡之艱難，以爲古人也是這樣的，應當有很多的東西傳下來，對於古書和古史的責望心就很重。要是像現在這樣，肯去挖地，從許多地下遺物整理出幾部古代史來，當然再好不過。無奈他們想不出這種方法，他們只會把耳朶裏聽來的算做古史，甚至於把自己心裏想出來的算做古史；再把這些聽來的想來的東西寫在書本上，就承認爲眞的古書。因此，古人雖沒法把當時的事情留與後人，但後人卻都會給他們補上，而且補得很齊整。我們翻開漢書藝文志來，

古帝王和古名臣的著作不知有多少，只恐這些著作離開他們的眞面目還不止十萬八千里呢。

古代的學問都聚集在貴族那邊，那時的知識分子都是貴族的寄生者。貴族信仰天，信仰鬼，常要祭祀，他們的手下就有了「巫、祝。」貴族要作祝文、策命、人事和天意的記載，他們的手下就有了「史。」貴族要在祭神和讌會的時候奏音樂，他們的手下就有了「師。」這些巫、祝、史、師之官，爲了職業的需要和長期的工作，對於天文、地理、音律、政制、歷史，當然知道得很多，漸漸地構成了有系統的學問。但一般民衆呢，他們受着階級的限制，沒有享受這些文化的福分，所以他們也想不到有學問這一回事。也是「天開文運，」孔子爲了不得志於時，用私人名義講學，收了一班弟子。他講的學雖甚平常，但因他是第一個把貴族那邊的學問公開給民衆，使得民衆也能享受些高級的

文化的，所以他巍然居於中國學統之首，二千四百年來大家認爲極偉大的人物。

在論語裏，我們看孔子常引詩和書，又常稱道禮和樂。詩和書是當時的兩類書（爲什麽不說『兩部』？因爲當時的書用竹簡編寫，繁重得很，我們看作一篇，在那時已是一册。我們看作一部，在那時是一大堆。所以對於書籍的觀念，我們可用部計而他們不能。他們只能說，這類的東西叫做詩，那類的東西叫做書而已）；禮和樂則不是書而是事。一件事情應當怎樣辦，是禮；一首詩應當怎樣唱，是樂。所以詩是樂的的本子，樂是詩的動作。這些詩本來都是樂師所管：有的是在宗廟裏祭神時用的，叫做頌；有的是讌會賓客時用的，叫做風和雅。風、雅、頌的來源，有的是士大夫所作，有的是樂師所作，有的是民間的歌謠而爲樂師所採取。這些詩應當有好多，但常用的只有三百篇左右。

書呢，是史官所掌的記載。國君對臣子說的一段話，或臣子對國君說的一段話，或戰爭時的一篇誓師詞，或王室的一件大典禮，史官感覺其重要，記了出來，一事就成了一册書；再摘取數字，給它一個題目。用現在的話說來，這就是「公文」或「檔案。」這類的東西分量比詩還多，但因竹木簡容易朽蠹，不及詩的因歌唱而保存於人們的口邊，所以傳下來的也寥寥無幾。孔子當時不知實在見過多少。他有一個很直爽的弟子，叫做仲由，曾質問他道，「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可見他教導學生時要他們多讀書的。然而可憐，那時實無多書可讀，僅僅這三百篇的詩和若干殘篇斷簡的書，能彀讀出什麼大道理來！所以他給予後世的影響，雖說傳播古文化，其實還靠在他自己主張的實踐倫理的「禮」上。

有一部周朝的占卜書，叫做易。它所以有這個名稱，大約因爲這種用著

草的占卜法比較用甲骨爲簡易的緣故。這也算得一部古書，孔子或許在卜官處見到，但他不曾提起，說不定他重人而不重神，看破了占卜法的無聊，不願表章也是有的。又有一部魯國的編年史書，叫做春秋；大約因爲簡册斷爛，只存魯隱公以下。這書，他一定見到，但論語中也不曾提起。後來的儒家把這兩部書都收進去了。他們說，春秋是孔子作的；他所以作這部書，爲的是要整頓綱常名教。他看天下太亂了，所以奮身而起，代行天子的職權，把一代的諸侯大夫加以進退黜陟；固然文字上沒有寫明，但字裏行間都藏着他的襃貶的意思。春秋本是一部魯國的史書，給他這樣一修改，就成了他的政治哲學，而且是他爲後來的天子制定的一部法典了。因爲他恐怕觸動了當時有權有勢的人們的怒氣，妨礙了他的安全，所以只把這些意思口傳給弟子們。因爲弟子們口傳得不同，所以後來寫出時就成了幾部不同的春秋傳。他們又

說易是孔子到晚年纔研究的；因爲天道精微，不易認識，所以他下了苦功去讀，讀得勤了，竟使穿着簡的皮帶了三次。他爲闡明易理，所以作了十篇易傳；這些傳是易的羽翼，所以又稱爲易十翼。孔子既對易和春秋自己動過手，對於詩和書當然也要動手。所以他們說，詩本來有三千餘篇，給他删掉了十分之九。書删削更多了，本來有三千二百餘篇只存得一百篇。還有一部儀禮，講的是冠、婚、喪、祭諸禮，一共十七篇，他們也說是孔子所作。照這班儒家的話講來，孔子一生的學術事業，計删了詩和書，作了春秋和儀禮，還替易做了一部傳。因爲他有了這五種著作，所以就有了五經。樂，他雖沒有著作，但也下過一番整理工夫，所以聯帶說起來，就成了六經。自從戰國末年至於今日，這種觀念在學術界中不曾變過。

稱孔子的書爲「經」，以表示對於他的尊崇，這個意思向來沒有疑問。

但現在知道，經的原義是絲線。許多竹木簡用絲線聯貫起來，這叫做經；經乃是書籍的通名，並不含有後來所謂「天經地義」的觀念。竹簡有長短，官府用的長二尺四寸；五經等雖說是孔子的著作，究竟原本是官書，所以也是二尺四寸。私人所用則有長一尺二寸的，也有八寸的。還有一種六寸的木版，備隨時的寫記，正像我們的筆記簿，稱之爲「簿」，亦名爲「專」，用假借字寫來就成爲「傳」。它不像經的嚴整，所以後人就用來做經的補助讀本或參考材料。他們說，孔子做了一部春秋，他有三個弟子記着他的意思，一代一代地傳下，傳到漢代，就成了三部春秋傳。他刪定了尙書，留下許多解釋，傳到漢代，就成了一部尙書大傳。他刪定了詩三百篇，傳到漢代，有齊國的本子，有魯國的本子，有燕人韓嬰的本子，他們的講法又各各不同，所以便有齊、魯、韓三家的傳。禮，有他的弟子卜商作的喪服傳，又有七十二弟子的後學們作的一

百餘篇的記。易是文王和周公作的經，他自己做的傳。所以五經是莫不有傳的。

儒家最重孝道，而孔子弟子中以曾參的孝爲最有名，所以不知何人作了一部孝經，說是孔子教給曾參的。詩本來只叫作詩，書本來只叫作書，稱爲詩經，書經是後來的事。惟獨這孝經的「經」字是離不開「孝」字的，分明出在經的名詞已得了崇高的地位之後。因爲這是一個小本子，容易念，而且受了君主的提倡，風行天下，所以漢人對於這部書非常信仰。東漢末，張角造反，有一個侍中向栩上奏書說「國家不必興兵討伐，只消在黃河邊上北向讀孝經，賊徒自會消滅的！」

還有一部書，記孔子和當時人及弟子們的說話，又有些他們的零碎事情，叫論語。這一部書大概是孔子的再傳弟子編輯的，齊國和魯國的本子也

各不同，到漢代纔併合爲一。我們要看孔子的眞相，這是第一等的原料，雖則裏面已有了些竄改。論語這個名詞也由竹簡來。「論」字古但作「侖」，就是把竹簡排比爲一册的意思。

以上說的是五部經，這些經各有一部到幾部的傳，又有一部特造的孝經，一部記孔子言行的論語，雖說同是儒家的東西，性質是各別的；至於主要的東西仍是這五部經而已。到後來，尊孔子太過，把這些傳都升做了經，於是有「十三經」的名詞出現。（十三經的構成不是一次的事。戰國以前只說詩、書、禮、樂，是四種。戰國以下加上了易、春秋，是六種。漢人因爲樂有譜而無經，把它去掉，爲五經；加上論語、孝經，是七種。唐代分儀禮、周禮、禮記爲三種，又分春秋的三種傳爲三種，合上易、書、詩，是九種。宋代就唐的九種再加上論語、孝經、孟子、爾雅，是十三種。所以十三經這個集團是經歷了五次的變遷而成

的。）

漢學的中心是經學，我們要瞭解漢學的地位，應當先明白所謂經也者是什麼東西。可惜情長紙短，寫不盡了！

第十一章　博士官

博士，現在是學位的名稱，但在古代是個官名。這個官，戰國時就有，其詳細情形不得而知。秦始皇時，博士有七十人，他們的職務是「通古今。」當始皇三十三年（前二一四），北邊奪了匈奴的河套，南邊奪了南越的陸梁地，明年，他置酒咸陽宮慶賀，博士七十人上前獻壽。僕射（博士之長）周青臣進頌詞，說「現在日月所照的地方沒有不服皇帝的威靈的，又把諸侯之國改成了郡縣，從此可免戰爭的禍患，這是上古以來所不曾有過的盛事。」始皇聽了大高興。這時候，忽然一個不識趣而又膽大的博士齊人淳于越起來說，「殷王和周王因為封建了子弟和功臣，所以纔能有千餘年的天下。現在皇帝的子弟就是匹夫，一旦碰到了權臣篡國，試問有什麼人可以幫助皇室

的？做事不以古人爲師法，決不能長久。「靑臣當面諂諛，不是忠臣！」始皇把這個主張交臣子們去議，丞相李斯說，「今古的制度不同，原不是立意相反，乃是時勢變了。我們所定的是萬世的大業，那只懂得三代之事的淳于越那能體會到這些新制度的意義！從前天下未統一時，君主所定的制度常常受私家之學的攻擊；他們說的名爲古事，其實是裝飾出來的虛言。現在天下已統一了，而這種風氣還沒有改變，倘不嚴令禁止，那麼下面的黨派一結成，上面的威權就墮落了。我提議：史官所典藏的，凡不是秦的史書，完全燒了。不是博士官所執掌的，私家所藏的詩、書、百家之言完全送地方官燒了。有敢聚會了人們講詩、書的，處死刑。有敢引用了古事來反對今制的，全家處死刑。官吏知道了不舉發，處同樣的刑罰。令下了三十天還不燒的，髡鉗了去築長城。所存留的，以醫藥、卜筮、種樹的書爲限。想學法令的，就到官吏那邊去學習。」始皇

立刻批准了。這固是在主張統一思想的李斯執政之下所應有的事情，但其爆發點實由於「通古而不通今」的博士的「是古非今」可算是淳于越闖下的大禍。但有奇怪的一點，史官所藏的史籍，除了秦的統統燒了，而詩、書百家之言凡是博士官所執掌的都不燒：為什麼還要留上這一點「是古非今」的根苗？大約這和官制有關係，除非把博士官取消，就得讓他們去讀點古書；只要他們不敢亂發不合時宜的議論，安心做個皇帝的裝飾品，也就能了。

那時的博士是掌詩、書和百家之言的，詩、書是古代傳下來的經書，百家之言是戰國時的各家學說。既經稱為百家，當然很雜，所以裏邊有神仙家，也有術數家。當始皇三十六年（前二一一），有隕星落在東郡，不知什麼人在上邊刻了「始皇帝死而地分」一句話，始皇聽得，把石旁的居民都殺了，把

星石也燒壞了，但心中還是悶悶不樂，於是叫博士們做仙眞人詩，他游到那裏，就令樂人們在那裏歌唱。爲什麼叫作仙眞人呢？因爲始皇愛慕眞人，自稱「眞人，」他聽人唱這首詩，彷彿自己眞做了仙眞人而不死了。明年，他游罷會稽，沿海到瑯邪，途中作了一夢，夢和海神交戰。他把這夢詢問占夢博士，博士說，「水神是不可見的，但他手下的大魚鮫龍常常出來；若想除去這惡神，應該先去捕捉大魚。」始皇就豫備下捕魚的器具，自己挾了連珠箭候着；到之罘時，果然射殺一條大魚。不幸這位博士的話不靈，仙眞人詩又沒有用，他上岸就病，不久死在路上。

漢元年（前二〇六，）高帝破了秦軍，進至咸陽，許多將士爭先恐後地到金帛財物的府庫中去搶東西，蕭何獨到丞相和御史府裏收取律令圖書，帶到軍中。後來高帝所以能知道天下的險要戶口的多少，民間的疾苦，就靠

了這些圖書。至於博士衙門裏的古籍，這位從刀筆吏出身的當然注意不到了。過了月餘，項羽來到，他殺了降王子嬰，屠了咸陽人民，燒了秦的宮室，火焰經歷三個月還沒有消滅。在這種情勢之下，博士官所藏的詩、書和百家之言必已沒有存留。秦始皇燒民間書，項羽又燒博士書，這是八年間的兩度書籍的浩劫。

書籍雖遭了兩度浩劫，但讀書的人原沒有死完。所以秦博士叔孫通帶了一百多個弟子歸了漢，被他招到關中的又有魯儒生三十三人，他們議定了漢家的各種制度。秦御史主柱下方書的張蒼，明習天下圖書計籍，歸漢後做到丞相。最重要的，是魯孔子廟堂裏藏的孔子衣、冠、琴、車、書，世世相傳，到漢二百餘年不絕；諸儒又講鄉飲和大射的禮節在孔子冢上，這冢地大至一百畝。所以這兩次的大燒焚，書籍固然受到極大的損失，但只要用心蒐集，還不

難復原。只是楚、漢之間四方起兵，打了八年，其後抵抗匈奴，削平叛臣，費了好多力氣，已沒有餘力顧到文化的建設。又秦始皇禁止私家藏書的法律，漢初還繼續行用，到惠帝四年（前一九一）方始廢掉。當國的大臣周勃、灌嬰之類都是武人出身，也不高興提倡學問。自從戰國末年的大震盪直到漢室的安定，約有六七十年，在這時期中文化的空氣消沈了，研究的工作停頓了。無論那種事情，只消數十年沒有人提倡經營，就會煙銷雲散。不看八股文和試帖詩，自從停止科舉以來，到今不過三十年，已經老年人不講了，中年人不懂了，少年人簡直不知道有這回事了。再過三十年，連賣破貨的攤子上也絕迹了。然而在科舉未廢之時，何等如火如荼，有那一個讀書人不盡力鑽研的！六經，固然不至像八股文一樣的僅作敲門磚，但經過這長期的停頓，懂得的人日少，存留的本子也大減，實在是一件必然的事實。這就是漢代的經學所以

紛歧的主因。

文帝時，黃龍出現，應了公孫臣的豫言，文帝就任他爲博士，和諸儒同草土德的制度。公孫臣是傳陰陽家鄒衍之說的，而作博士，可知當時猶承秦的遺風，百家之言也各立博士的。據說，文帝的博士有七十餘人，數目和始皇差不多；以他的崇尙黃、老，想來道家的博士必然不少。但古學以儒家爲大宗，天下既漸承平，六經當然要提倡。詩和書是古人最多引用的，所以文帝也要立這二經的博士。那時講詩的，魯有申公，燕有韓嬰，文帝就任他們爲詩博士。書呢，全國幾乎沒有人讀的，尋了好久，知道濟南有個伏生，本來是秦的博士，專治尙書，現在年已九十多了，不能到京城裏來。於是派了太常掌故鼂錯到他家裏去受業；但是他那邊的書也不多了，只傳得二十餘篇，所以春秋、戰國時人稱引的書語，到現在有好多不能在書經裏找出。倘使伏生早幾年死了，這

尙書一經也就絕種了。不久，朝廷任命伏生的弟子歐陽生爲書博士。到景帝時，又以轅固生爲詩博士，董仲舒、胡毋生爲春秋博士。轅固生爲齊人，他講的詩經和申公、韓嬰都不同，所以魯詩、韓詩和齊詩就成了鼎足而立的三派。春秋，董和胡毋兩家沒有什麼分別。

武帝建元元年，借着選舉賢良方正的機會，崇儒學而黜百家。五年，他又置五經博士。從此以後博士始專向儒家和經學方面走去，把始皇時的博士之業「詩、書」和「百家之言」分開了。這是一個劇急的轉變，使得此後博士的執掌不爲「通古今」而爲「作經師」。換句話說，學術的道路從此限定只有經學一條了。這比了始皇的以政治力量統一思想還要厲害。二千年來沒有生氣的學術思想，就在這時行了奠基禮。武帝立的爲什麼叫做「五經博士」？只因文、景之世僅立了詩、書、春秋三種，還缺禮和易，所以他給補足

了。博士之數本來是很多的，到這時，既把百家之言的博士取消，騰下來的就沒有幾個人。後來到了宣帝、元帝的時候，又加立了幾家博士。當時只要我講的經和你講的兩樣，而你我所講的都給人看作有理由，便可各立博士，都置弟子員。因爲博士的官不算小（漢初俸四百石，其後增至比六百石；內遷可爲奉常、侍中，外遷可爲郡國守相，諸侯王太傅等等，）所以引得人眼紅，常想標新立異，取得一個地位，以致經書愈講愈亂。這又是漢代經學所以紛歧的一個主因。

博士本來可收弟子，例如叔孫通的手下就有一百多人。武帝時，博士減少，弟子員亦減少，只定五十個名額，叫太常就人民年十八以上，相貌端正的選擇。讀了一年，考一次，如能通一經，就可補文學掌故的缺，考得最高等的可以做郎中。其後昭帝時加至一百人，宣帝時又加至二百人。元帝好儒，特增至

一千人。成帝時，有人說孔子是布衣，尚且養了三千個徒弟；現在國立的太學的弟子反而比孔子少，實在說不過去；於是聽了他的話，又增至三千人。到東漢時，太學諸生竟至三萬餘人了。班固在漢書儒林傳贊裏說得好，「自從漢武帝立了五經博士，選弟子員，經過了一百多年，傳業的愈盛，枝葉叢生，一部經書解說至百餘萬言，大師們的數目多至千餘人。爲什麼會這樣？只因這是一條祿利的門路！」呵，經學的興盛靠了祿利的引誘，當時經學的性質原不異於明、清的八股；奉勸研究古學的人們，千萬不要再做「漢人近古，其言必有所據」的好夢了！

第十二章　經學的今古文問題

武帝時，正值太平盛世，他很講究藏書，宮庭裏的藏書處有天祿閣、延閣、廣內、秘室，宮庭外的有太史和博士的官署；又設寫書的官，抄寫得很多。到成帝時，還嫌其不足，河平三年（前二六）命謁者陳農四出搜訪遺書，又命光祿大夫劉向校六經、傳記、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天文及占卜等）書，侍醫李柱國校方技（醫學）書。因爲劉向是學問最博的人，所以每一部書校完，就由他列舉其篇目，並撮其要點，寫成一篇評論奏上去。這是對於古代學術的一種結帳的工作，非常有價值的。不幸這位總編輯工作了二十年，沒有做完，於綏和二年（前七）死了。他的兒子劉歆也是一個學問很淵博，什麼都懂得的人，且已久作襄校的事，所以哀帝很

寵他命他繼續父業。他任了職，就總合羣書，編成七略：（一）略輯（全書的通論）（二）六藝略（六經和傳記）、（三）諸子略，（四）詩賦略，（五）兵書略，（六）術數略，（七）方技略。這是中國第一部目錄書。後來班固作漢書藝文志，就以它爲藍本。現在我們所以能約略知道些古學與古籍的情形，這部書實在有很大的啓示之功。

劉歆先前讎校的時候，曾發見一部古文字的春秋左氏傳，讀得非常喜歡；他引了傳文來解經，於是左氏傳有了章句。他說：作這書的左丘明是親見孔子的，他所愛的和所恨的完全和孔子一樣，所以講到春秋，這是最靠得住的一部傳；不比公羊和穀梁，作者生在孔子的七十二弟子之後，所記的春秋宗旨是由傳聞得來的。講到這件事，我們第一要知道，所謂「春秋公羊傳」一名和「春秋穀梁傳」——一書實在都很後起。孔子作春秋，他自己沒有說過，

第一個說的是孟子。在孟子時，不知春秋已有了傳沒有。但戰國諸子以及漢人所引的春秋常是公羊傳裏的文字，可見這本傳出來很早。景帝時所任的董仲舒和胡毋生兩個春秋博士，也都是所謂公羊學的。在公羊傳中，引了許多春秋先師之說，有魯子、有沈子、有司馬子等等，也曾兩度引公羊子，可見公羊子只是春秋的先師之一，並不是這部傳的作者。不知何年始稱它為公羊傳。有了公羊傳這個名稱，於是聯帶有所謂穀梁傳。「穀」和「公」是雙聲，「梁」和「羊」是疊韻：為什麼這兩個作春秋傳的人都是複姓，而且差不多是同音的複姓，事情竟這樣地巧呢？現在我們既經明白了漢博士的地位和其勢力，就可以知道這是當時學春秋的人看見別經分家而春秋不分，因此想自立門戶，把原來的春秋傳改稱為公羊傳，表示它只是一家之言而不是惟一的春秋傳；再把自己的意思另寫一部春秋傳，別稱穀[illegible]

的牌子而爲穀梁傳。這正和北平的剪刀店有了王麻子再有汪麻子，杭州的剪刀店有了張小全再有張小泉，是同樣的道理。我們只要看穀梁傳中極多災異之說，其立博士在宣帝之末（甘露三，前五一）就可知道它必是西漢中葉以後的作品。再說左氏傳，卻是一部眞古書。司馬遷作史記時很多根據它，他曾兩次說「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可見這部書實在叫做國語。劉歆在皇室的圖書館中見到了國語，喜歡它的講春秋時史事詳細而有趣味，比較公羊和穀梁專從咬文嚼字推求孔子著作的意思的大不相同，立志替它表章一下，這原是學術界中應有的事。但那時是經學的全盛時代，如說這是戰國時的左丘明編的一部春秋時的分國史，大家不會來睬你；現在改說這是春秋時的左丘明爲春秋經作的傳，他作傳時曾和孔子商量過，所以這部傳是最得孔子的原意的，那麼它的地位豈止超過穀梁和公羊，簡直和春秋經

「分庭抗禮」了。然而國語的原本僅是敘事，如何可以改作春秋的傳呢？因此，劉歆只得引了傳文來解經，並爲它加進許多經說了。所以左傳是一部眞材料的僞書，它的眞名是國語，它的僞物是經說。它不解經，它的價值在公羊傳上；它一解經，反成了穀梁傳的後輩。至於現在的國語，那是劉歆的刪削之餘。左傳能不能再和國語併家這須看我們將來的努力如何了。（關於這個問題，可讀清劉逢祿的左氏春秋考證，康有爲的新學僞經考，崔適的春秋復始和史記探源，今人張西堂的穀梁眞僞考。）

劉歆既編成了一部春秋左氏傳，後來又說尋出了一部毛詩，一部逸禮，一部古文尙書。到他代了父職，當了學術的重任，就請國家把這些都列入博士之官。哀帝叫他先和五經博士討論一下，但許多博士全不贊成；有的不肯表示意見；有的說，尙書二十九篇已經完備了，用不着更立古文尙書；有的說，

左丘明是不傳春秋的，那裏會有春秋左氏傳。他於是寫了一封很長的信責備博士們，大意是：「孔子爲了他的道不行，所以修訂六經；但經過了戰國的打仗，暴秦的燒書，他的原本已經看不見了。漢興之後，一切制度沒有可根據的，幸而得到一個叔孫通規定了些禮儀。那時天下的書只有卜筮用的周易，沒有別的。惠帝時雖說廢了藏書的禁令，但大臣們也不曾把經書放在心上。文帝叫鼂錯到伏生那邊去受尚書，因爲這部書剛從牆壁裏拆出來，有的朽折了，有的散亂了。到武帝時，然後鄒、魯、梁、趙之間很有些詩、禮、春秋的先師。在這時候，一個人的力量不能獨管一部經；舉詩來說罷，有專管雅的，有專管頌的，要幾個人合起來方成爲一部完全的詩經。後來得了一篇泰誓，集會了許多博士纔把它讀出。那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開全本的經遠得很了。後來魯共王要造自己的宮殿，把孔子的舊宅也圍了進去，正在拆卸牆壁，忽然發見

了許多古文字的書簡整理一過，知道其中有禮三十九篇書十六篇。（因爲這禮是在博士的十七篇之外，所以稱爲逸禮；因爲這書是用古文字寫的，所以稱爲古文尙書。如倒過來稱爲古文禮和逸書，也是一樣。）天漢（前一〇〇——九七）之後，孔子的十二世孫孔安國獻了上去，適値戾太子的巫蠱之難，沒有施行。又春秋左氏傳是左丘明所作，也是古文字的舊書，藏在祕府裏。成帝命我們校書，得到這三種，來比較博士的本子（例如博士的二十九篇，古文尙書裏也有，）有的經是脫了幾片簡了，有的傳是編排錯亂了。到民間去調查，也有和這幾種相同的。既經找出了這種好東西，爲什麽不讓立博士呢？以前所立的經和傳，大都是相傳的口說，現在已獲得古人的眞本了。難道你們寧可信口說而不信原本書嗎？難道你們只信近代的經師而不信眞的古人嗎？你們只想守住一些殘缺不完的東西，而沒有從善服義的公心，這

是我所深以爲不合的」——這封信發出之後，許多儒者都怨恨他，幾個大官對他攻擊得尤其厲害。幸而哀帝幫助他，他沒有吃眼前虧。他怕遭着意外的禍殃，請求外放，到河內等郡做了幾年太守。

劉歆在祕府裏找得幾部古書，正和我們今日在敦煌千佛洞中找出許多唐人寫本，在北平圖書館的亂書堆中找出幾部內閣大庫舊藏的宋版書一樣，照現在想來，只該欣幸，那有受怨恨攻擊的道理。所以會得如此者，在漢儒大抵是出於嫉妬，怕古代的詳細的東西一立了博士，就把近代的殘缺的東西打倒了，把他們的飯碗摔碎了。至於我們對他下攻擊，則因他不是客觀的整理古書，而是主觀的改編古書，使得許多材料眞僞混雜，新舊錯亂，他隨意一動筆，害我們費了不知多少工夫纔得糾正；而且沒有原本對照，還不知道所糾正的恰當與否。他的作僞的痕跡是很顯然的，例如他的信裏所說的

魯共王壞孔子壁得古文經事，史記裏就沒有；共王死在武帝初年，巫蠱之難作於武帝末年，經過了三十餘年的長時期，以古文經的價值之大，加以武帝的喜歡表章六經，那會在數十年中寂寂無聲之理。又那位獻書的孔安國已早死了，也捱不到巫蠱之難。他寫的信倘會當面說謊，何況私下竄入書內的東西。他逢着的便宜，是漢人太沒有歷史知識，幾位博士只會捧住了自己的破書硬反對，不會在歷史裏找了證據來質問，所以給他騙過了好多年中的好多人。

劉歆以爲經書中什麼都殘缺，有待於古文眞本的校補；博士們反對他就以爲什麼經都已完全了。這是兩方面的觀念截然相反的一點。劉歆表章的幾部書，都說是古人用了古文字書寫的，所以稱爲古文經；對比了用漢代文字寫的，自然那邊應當稱爲「今文」了。所以今文一名是後起的，在沒有

古文經與它對立的時候是不會有的。從此以後，經學分爲兩派；今文家與古文家不但本子不同，卽經文的解釋和所說的古代制度也都不同。東漢時，許愼爲了分別他們的異同，特作了五經異義一書。在這書裏，我們可以看出經書中的意義是給漢人有意播弄得這樣紛歧了。

第十三章　通經致用

現在如有人拿了許多經書堆在我們的面前，問有什麼用處，那麼，我們可以乾脆答道：沒有用。因爲詩經裏的詩已不能唱了；易經裏的占卜是我們不信的；禮經和禮記中許多瑣碎的禮節，看着也頭痛；春秋中的褒貶予奪，完全表現階級思想，決不是現代的倫理；尚書裏記的說話，動不動叫着上帝和祖先，我們的理智也提不起這種信仰了。這種東西實在只有一種無用的用處，就是它的史料價值。漢以前的材料，存留到現在的太少了，除了甲骨文和鐘鼎文之外，可見的只有這幾部經書了。甲骨鐘鼎的材料固然可靠，但都是零碎的，而幾部經書則是較有系統的；把這較有系統的書本材料來聯串無系統的地下實物，互相印證，於是我們可以希望寫出一部比較眞實的上古

史(完全眞實是不可能的,)使得人們知道我國古代的民族和社會究竟怎樣,我們的先民辛苦締造傳給我們的是些什麼,這是它的惟一的用處。這用處的表章,也是我們所需要的時代使命。

上面說的,只是現代的我們的話。如果把這番意思說給漢代人聽,他們決不會瞭解。他們以爲無論什麼大道理都出在經書裏,而且這種道理有永久性,所謂「天不變、道亦不變」,經是道的記載,所以也不變了。易學家說:易理是瀰漫於天地之中的,萬物的現象莫不從易理裏變化出來,一切人生日用的東西也莫不是,聖人們看了易的卦象而造出來的。春秋家說:春秋的第一句就是「元年」,「元」是根源的意思,表示它存在於天地之前,作萬物的根本,所以春秋之道是用了元的精深來正天的端兆,還用了天的端兆來正王的政事的。(這話很不好懂,但經學的神妙就靠在這不好懂上。)照這樣說,

經書不成「天經地義」再成什麼！既經成了天經地義，當然一切的用處都要從這裏邊尋出來了。

他們的應用方術，簡單地舉出幾個例，就是所謂「以春秋決獄，以禹貢治河，以三百五篇（卽詩經）當諫書。」

爲什麼「以春秋決獄」呢？因爲春秋傳裏說孔子作春秋，褒這個、貶那個，都有他的理由；這些理由就是這人那人的功罪，也就是孔子定的法律。審官司時引用孔子手定的法律，這法律是何等的尊嚴而又漂亮。所以張湯做了廷尉（武帝元朔四年，前一二五），他就聘請讀尚書和春秋的博士弟子任廷尉的史，用古義來判決大獄。淮南王謀反的案子（元狩元年，前一二二）武帝派董仲舒的弟子呂步舒去查辦，他不等奏書的批准，就用春秋之義一一判定了罪名；武帝也不斥他專斷。征和二年（前九一）武帝聽了江充的讒

言，疑太子據用了巫術咒咀他早死；太子氣不過，把江充殺了。一時長安擾亂，丞相發兵打他，他逃到湖縣（漢京兆尹東部，今河南閿鄉縣）自殺。這就是所謂「巫蠱之難。」但因太子逃在外邊，很有謠傳說他沒有死的（正和明的建文帝一樣。）昭帝始元五年（前八二），有一個男子頭戴黃帽，身穿黃衣，乘了黃犢車車上插了黃旗子，投到宮門，自己說是武帝的太子。那時長安吏民聽得太子隔了十二年回來了，驚奇得很，奔去看的有幾萬人。昭帝命令一班大臣驗看，沒有一個人敢說是或不是的。京兆尹雋不疑最後到，立刻吩咐隨從的人把他捆起來。旁邊大官們上前勸止，說，「這是不是前太子還沒有定，你爲什麼這樣鹵莽呢？」雋不疑答道，「就是眞的太子，諸君也何必怕！從前衛靈公的太子蒯聵得罪了他的父親，出奔晉國。後來靈公死時命他的孫兒輒（蒯聵的兒子）繼位。晉國得悉了他的死訊，把蒯聵送回來；輒竟拒

而不納。春秋上說他做得很對，因爲從了祖父的命令就該這樣。前太子得罪武帝，逃在外邊不死，到現在歸來，依然是個罪人，應當法辦，沒有疑問！」廷尉審訊的結果，這位太子果然是冒充的，腰斬了。昭帝和大將軍霍光聽得，佩服他的能幹，贊歎道，「一定要用了讀經書的人做公卿大臣，纔會這樣明白大道理呢？」這件事固然做得不錯，但春秋之學喜歡「誅心，」實在也免不了流弊。例如經上寫「許世子（卽太子）止弑其君買」（昭十九年）傳中說：許太子並不曾弑君；孔子所以這樣寫，只因依照禮法，父親生病服藥，該得由兒子先嘗，以免中毒，現在許悼公服藥時，這位太子沒親嘗，他吃錯了藥死了，這就是太子的不盡子道，該負弑君的責任的。在這種苛刻的誅心論之下，不知冤枉死了多少可以無罪的人。倘使現在還保留得漢廷尉的檔案，我們一定可以找出好多例子。想來當時經學化的法律，和現在軍政時期的法律

有些相同吧？漢書藝文志上載着公羊董仲舒治獄十六篇；這是一「以春秋治獄」的一部原理書，可惜現在也看不到了。

禹治洪水是古代一件極大的故事；禹貢一篇就是記他治水的經過的，列在尚書的虞夏書中。固然這篇未必眞是禹所作，卻也不失爲中國地理學史裏第一篇大文字。在經書中，講地理最有系統和最有眞實性的，也推着它了。漢人治水，用了它作根據，在沒有科學的地理學和河海工程的時候，也不失爲一個辦法。只是禹貢本書太簡略了，只能使人知道些水道的大概，不能給人以治水的整個計畫。黃河是最多決口的；武帝元光三年（前一三二）在瓠子決了。過了二十餘年（元封二，前一〇九，）武帝封禪泰山回來，到決口的地方，決心把它塞住，就令隨從的官吏們各人背了柴薪填塞下去，工作的徒役有數萬人，柴薪用完了用竹子；果然把決口填平，造一個宮在上面，稱

爲宣防。他們又導河水北行，分爲二渠，減殺它的怒勢，算是恢復了禹的舊迹。但是過了些時候，黃河又在館陶決口，分爲屯氏河，也入海。元帝永光五年（前三九），黃河又決鳴犢口，屯氏河也絕了。這些下流的變遷使得人們想起了禹貢裏的「九河」。這九河不知道是整整的九條河呢，還是表示其數目之多呢；是長長的河流呢，還是黃河入海處的三角洲呢；要之，總是黃河下流分汊甚多，禹爲了宣洩水勢而分布着的。所以那時的人常想開浚九河，繼續禹的功績。可恨禹貢裏只提了九河這個總名，沒有說是那些河；費了他們好多的力量，只尋出徒駭，胡蘇，鬲津三條河來。那時有一個博士許商，專治尚書，又懂得數學，被任爲將作大匠，轉爲河隄都尉，研究了好多年的治河方法。到哀帝初年，因平當（先前也是博士）對於禹貢很有研究，使他接管河隄的事。他奏說，「禹的九河現在差不多都湮沒了。按照經義治水，只有分泄和

浚深的辦法，沒有用隄防來壅塞的。現在黃河下流的水道太不分明，應當尋覓開河的人才。」但是那時的學術久已定於一尊，讀禹貢的人雖多，會開河的卻沒有，所以到了王莽的時候，黃河又大遷徙了一次。

昭帝去世（前七四）無子，霍光迎立昌邑王賀（武帝的孫兒）為皇帝。他在自己的王國裏是荒淫慣了的。那時他的郎中龔遂曾諫他道，「大王曾讀了詩三百五篇，人事應該通曉了，王道也該備知了。試問您所作所為，合於詩中的那一篇？大王雖說做了王，恐怕您的品行連平民都不如呢！」及至他做了天子，霍光見他越弄越不像樣，下個決心，把他廢了；把他帶來的一班臣子都送到監獄裏去，好多人是殺了。只有龔遂經一二人曾經諫勸過他幾次，得減死一等，罰作苦工。還有一個他的太傅王式，查無諫書，審判官責問道，「你為什麼不諫？」答道，「先前我把詩三百五篇早晚教王，每當讀到忠臣

孝子的詩，沒有一次不對于反覆幾遍的。讀到了危亡失道的詩時，又沒有不流了淚來講的。我已有了三百五篇作諫書了，所以沒有寫諫書。」審判官把這套話奏上去，他也得免於死罪。後來成帝時有一位匡衡，他是學齊詩的，上疏戒后妃道，「夫婦之際，是生民之始，萬福之原，所以一定要婚姻之禮正了，然後天命可以保全。孔子編詩，爲什麼把關雎列在第一篇？只因后夫人的品行如果不合於天地，就沒法接續神靈的統緒。詩上說：『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這是說女子的貞淑之德可以不改她的操守，情愛的刺激又可以不表現於她的容貌，這樣的又堅貞（淑）又幽深（窈窕），然後可以和至尊的皇帝相匹配。這眞是人倫綱紀的第一項，教化的開端呵！……」詩是主於發抒情感的，情感與理智常常不容易得到平衡，所以這三百零五篇裏有的憤怒，有的頹廢，有的浪漫，本來不盡可作道德的規律看。就是第一篇關雎，原是

一首單相思的情詩，何曾和后夫人配至尊發生關係。但那時的經學家要求「通經致用」着了迷，一定要用了道德的觀點把全部書拉到一種訓誡的目標之下，以便做他們的諫書的材料。所以他們對于理智的作品（像雅、頌裏的贊美文王、武王，）就以爲這是太平盛世的榜樣，孔子選進去作鼓吹之用的；碰着了情感的作品（像國風裏的數十篇情詩，）就曲解爲「思賢才，」或逕說爲孔子特地留着做炯戒的。他們爲要勸導君主，又把任何私人的喜怒哀樂之情都說成了君主的善惡的感應，以至人民只成了木偶。大家如去一讀東漢初年衞宏作的毛詩序，就可知道一部活潑潑的詩經已如何被他生吞活剝地諫書化了。

講到致用，最重大的莫過於政治；現在試舉一個應用經學的例。宣帝神爵四年（前五八，）匈奴人爭奪單于的位子，國內大亂。許多人以爲他們侵

害中國已久現在內亂了，正好趁這機會把他們滅了。大鴻臚蕭望之獨持異議，他說：「春秋時晉國派士匄去打齊國，走到半路，聽說齊靈公死了，士匄就帶了兵回去。孔子很稱讚他，因為敵國不幸遭了喪事，就表示同情，停止征伐，這是一種偉大的精神。前年握衍單于派人來請和親，中國人知道不打仗了，很喜歡；現在他死於內亂，我們反而進兵征伐，這完全是一種幸災樂禍的心理。不義之兵是不會有成功的。我們只該遣使弔問，救他們的災難。」這種態度確實大方，所以宣帝依從了他，後來呼韓邪單于就自來歸順了。還舉一個例。武帝平了南越，在現在的廣東瓊州島上立了儋耳和珠崖兩郡。那邊民風強悍，受不慣漢官的干涉，隔了幾年卽起一次反抗，把官長殺了。因為反抗的次數特別多，朝廷感覺派了很多的官員去管理也無謂，便把儋耳併入珠崖。元帝初元元年（前四八），珠崖又反，當時很想多開些軍隊去攻打。待詔賈

捐之建議，以爲不必。元帝派人問他，「你的意見在經義上有什麼根據？」他道：「堯、舜、禹是最大的聖人，然而他們的地方不過數千里，尚書、禹貢中載明其疆界。至於四方夷狄，來歸化的他們固然受了，不歸化的也不去勉强。秦始皇不學聖人的好樣，專想開闢四境，弄得天下潰叛，他的基業也就一敗塗地。珠崖是海中的一個島，多毒草和蛇蟲，那邊的人又蠢笨得像禽獸一樣，本來不值得立郡縣的。我的意見，以爲凡不是戴冠束帶和中國人相類的地方，凡不是禹貢所說到的和春秋所記着的，都可以把我們的政治機關廢掉。」元帝聽了他，瓊州島就不算中國的地方了。這件事的功罪卻很難說。秦皇、漢武的闢地固然由於窮兵黷武的野心，然而倘使他們死守了黃河下流的文化區域，到今日或者已沒有漢族存在，因爲延長漢族的壽命的就靠在這向外發展和同化異族呀。現在經書所記的道理，漢人看作與天地相終始的，經書

裏既不主張向外發展，讀者們受了這個暗示，自然要以禹貢的疆域爲滿足了。到了今日東三省做了人家的生命線而不做我們的生命線，恐怕禹貢的沒有說到也是一個潛在的原因吧？

上面敍述的改制、封禪、巡狩、郊祀、以及災異、禎祥諸說，無一不和通經致用有關係。固然有許多是經書裏所沒有的，但狡猾的經學家總會設法講得它有，或者竟把假材料插入眞書，算做確實的證據。

經書中的事實在古代都有所以發生的背景，要一一在後世複現，固然不會全無價值，但也決不會完全對，因爲時代背景已變換了。自從漢人把五經看作天經地義，又把自己的意見和當代所需要的東西塗在上面，弄得今不今，古不古，要致用罷，卻時常以今古不同，眞假不明，逢到窒礙。說研究學問罷，學問的基礎不建築在求眞上，先聖先師的權威又特別大，既不能跳出他

們的圈子，如何可以有進步的希望。弄到底，經既不通，用又不達，大家所有的只是繳繞文句的技術和似是而實非的智識而已。

第十四章　王莽的受禪

自從墨家倡導了尙賢之說，主張君位應爲禪讓制，託之於堯、舜，這學說一時很風行，連主張貴族政治的儒家也接受了。一種學說既經鼓吹了起來，當然有實行的。燕王噲時，以子之爲相，他們君臣之間情投意合。燕王噲就把國事交給子之，叫他南面爲王。子之做了三年的王，燕國大亂；齊王趁這機會進兵，打了一次大勝仗，幾乎把燕國滅掉。這禪讓制的第一次試驗就很糟。

漢武帝窮兵黷武，用財無度，弄得天下騷亂。信五德說和三統說的人以爲漢的氣運已盡，該得換朝代。昭帝元鳳三年（前七八），春秋學家眭弘借着泰山上大石自立的奇蹟，根據了董仲舒的受命說，勸昭帝禪位賢人。結果，堯、舜的牌子抵不過漢帝的實權，他以妖言惑衆之罪伏誅了。到宣帝神爵二

年（前六〇，）司隸校尉蓋寬饒又根據了韓氏易傳，請宣帝學五帝的「官天下，」不要像三王的「家天下。」無奈禪讓的事，言之雖美，眞要幹時卻無異「與虎謀皮，」所以他也得了大逆不道之罪，因不願下獄而自刎了。民衆對於漢室早已失掉了信仰，然而禪讓之說既行不通，革命之事又起不來，於是陷在無可奈何的殭局之中，天天聽經學家講災異，把漢帝攻擊得體無完膚。甘忠可想出一個調停的方法，說漢的氣運雖盡，但上帝還許其再受命。哀帝初時信了他，改元改制，似乎有些新氣象，不幸不到兩個月又取消了。這樣沈悶地度過了八十年，大家尋不到一條出路。

元帝的皇后，成帝的母親，是王政君。王氏一門，爲了她的關係，常執最高的政權。這位王太后有一個姪子，名喚王莽，是禮學的專家。他的弟兄們都因門庭貴顯，非常的驕奢浮華，他卻節儉恭敬，像一個窮讀書人一樣。永始元年

（前一六）封爲新都侯。他爵位愈尊，態度愈謙，名譽極好。哀帝去世，王太后任他爲大司馬，迎立九歲的中山王爲皇帝，就是平帝。元始元年（西元一）他示意益州塞外的蠻夷，自稱越裳氏，重譯到漢廷，獻白雉一，黑雉二。爲什麼要自稱越裳氏，獻白雉呢？因爲尚書大傳裏說：交趾的南面有一個越裳國，當周公攝政六年，制禮作樂，天下太平之後，他們騎了三匹象，帶了幾重的翻譯員，到中國來獻白雉。成王叫他們轉送給周公。周公問道，「你們爲什麼要送給我呢？」他們的使官說，「這幾年，我們國裏不曾有過烈風和淫雨，許多老年人都覺得奇怪，他們說，『恐怕中國出了聖人了，』所以派我們來進貢的。」據漢代的經學家講，武王死了之後，成王年紀幼小，周公保了這幼主攝政七年，成了太平之世。王莽此日的地位正與周公相像，所以他要根據經傳，重演這個歷史上的佳話。越裳氏這樣來了，他就是一個活現的周公了。周公

託號於「周，」他也當託號於「漢，」所以王太后就賜他「安漢公」的稱號。從此以後，各處不斷地發現祥瑞，五年之中出了七百餘件。武帝以後，漢家的國運被災異說打得奄奄欲絕，到此時竟有大批的祥瑞出現，這眞是民衆的視聽上的一個極大的轉變，足以喚起他們的光明的希望的。可是以前的災異說是漢受其殃，現在的祥瑞說卻非漢得其利，因爲鼓吹這一說的人本來只爲自己打算呵！

王莽是禮家出身，所以要把所有的禮制都用他自己的意思改變過，使它成爲極整齊的一大套。自從國家的宗廟、社稷、封國、車服、刑罰等制度，以及人民的養生、送死、嫁娶、奴婢、田宅、器械等品級，他沒有不改定的。這確是一代的大手筆，而他也更像那位「思兼三王以施四事」的周公了。

元始四年，王莽的女兒立爲皇后。太保王舜等向太后奏道，「至德大賢

的人，生當有大賞，死當爲宗臣（配享太廟，）例如殷的阿衡伊尹，周的太宰周公。安漢公和他們一般，應當進位纔是。」人民八千餘人上書也這樣說。於是王太后摘取了「阿衡」和「太宰」的兩字，賜王莽以「宰衡」的稱號，表明他是合伊尹和周公爲一人的；又加增了他多少新野的封地。他受了宰衡，辭了封地。因此一辭，又把古史上的佳話複演起來了。史記裏講：周文王爲人太好，所以諸侯之間有不能解決的事情就請他去判斷。有一次，虞國和芮國的人打官司，相持不下，同到文王那邊去。他們一進了他的國境，只見種田的人讓田界，走路的人讓年長，自己心裏慚愧起來，歎口氣道：「想不到我們所爭的就是周人所恥的。不要去罷，去眞是丟臉呢！」他們彼此一讓，這官司就完事了。因爲古代曾有這件故事，所以王莽一辭了加封的地，就有蜀郡男子路建等撤消訴訟，自稱慙怍而退。王舜等又趕緊上奏書，說安漢公至德感

人，雖文王的卻虞、芮也不過如此了。

就在這一年，王莽奏起明堂、辟雍、靈臺，爲讀書人築一萬間的宿舍，又作市常滿倉，制度甚盛。羣臣又上奏書請求道「從前周公是文王之子，在公侯中占第一位，尚且經過了七年的長時間方把制度規定。明堂和辟雍諸制已經廢了一千年，沒有人能毅興復的。現在安漢公起於民間，僅僅執政四年，功德已經這樣的燦爛。雖唐、虞和成周，也不能更好了。宰衡之位，應當列在諸侯王的上面纔對！」這時，人民因王莽不受新野田而上書的前後達四十八萬七千人，都請加重賞賜安漢公。王莽苦苦辭謝，請待制禮作樂之事完了再說。但太后不許，她令羣臣們議「九錫」的典禮。公卿、大夫、博士、議郎、列侯九百零二人根據周官和禮記等書議定了，王莽就領受祿軷、袞冕、鸞路、龍旂……許多尊貴的東西。

王莽這樣一幹，一時天下頓現升平的氣象。他看西方的羌人還沒有表示，便派中郎將平憲等帶了很多的金幣，騙他們獻地內屬？這事果然成功。平憲等奏道：「羌人領袖良願們一萬二千人願獻鮮水海、允谷、鹽池，把平地美草之區都讓給漢人居住，自己搬往險阻的地方做我們的屏藩。我們問良願們爲什麼要歸順，他們答道，『太皇太后聖明，安漢公又極仁愛，所以天下太平，五穀成熟，禾有不種自生的，繭有不蠶自成的，甘露從天降，醴泉從地出。四年以來，羌人太安樂了，知道這都由於朝廷德澤的涵育，所以很願意歸順。』……」王莽接受了他們的請願，就把羌地立了一個西海郡。接着，他又用了經義改定十二州的名稱。

王莽的勢力和聲望高到了這等地步，他不做皇帝再做什麼，所以漢的宗室泉陵侯劉慶上書，就直捷痛快地說，「尚書裏，周成王因幼小稱『孺

子，「那時周公代行天子的事。現在皇上的年齡也小，安漢公應當照周公的辦法，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劉慶既有這等提議，羣臣自然應聲說「對呀！」然而王莽行了天子事，將置平帝於何地呢？所以平帝就不得不於這年的十二月裏天亡了。在他病着未死時，王莽作了祝策，請命於泰時，願以身代。祝畢，把策藏在金縢的櫃子裏。他爲什麼要這樣做？原來這件故事出在尚書的金縢篇中，當武王生病時，周公是曾經這樣做過的。

平帝十四歲死。那時元帝的一系絕了；宣帝的曾孫有五十三人，玄孫有二十三人。經過王莽的卜相之後，只有玄孫中最幼的廣戚侯子嬰最吉利，所以他就嗣了位，稱爲「孺子嬰」。只有二歲。就在這一個月裏，前輝光謝囂奏武功長孟通開井，掘出一塊白石，上圓下方，有八個紅字寫在上面：「告安漢公莽爲皇帝。」這奏書一發表，王舜等就請太后下詔說「皇帝方在襁褓之

中，沒有一個大賢人，天下是不能安定的。安漢公的德行和功業，和周公異世同風。現在井中發現的白石之文，我想來，所謂『爲皇帝』者，乃是攝行皇帝之事也，就令安漢公踐天子之位，一依周公的故事！」從此王莽服了天子的韍冕，南面朝羣臣，出入警備清道，人民對他自稱「臣、妾」，一切和天子一樣；祭天地祖宗時他自稱「假皇帝」，人民稱他爲「攝皇帝」。

漢的宗室固有勸王莽行天子事的劉慶，但也有怕王莽移漢祚的劉崇。他在居攝元年（西元六）起兵討伐，不幸敗了。過了一年，東郡太守翟義立了嚴鄉侯劉信爲天子，發檄到各郡各國，說王莽毒殺平帝，志在篡位；響應的有十餘萬人。這次聲勢浩大，所以王莽很害怕，日夜抱了孺子嬰到郊廟裏祈禱，又模倣尚書裏的大誥而作了一篇新的大誥，布告天下。他爲什麼要模倣大誥呢？因爲照那時的經師說，這篇文字是周公攝政時，他的弟弟管叔、蔡叔，

不滿意他，聯合了紂子武庚打他，他作這篇以自明的。現在王莽碰到相同的困難了，所以完全脫調，作這最後一次的模倣。他的運氣眞好，翟義們又給打滅了。從此他的氣燄更高，自以爲得到天和人的幫助，眞有做皇帝的資格。

居攝三年（西元八），又出了幾件符瑞。其一，齊郡臨淄縣的一個亭長在一夜裏得了幾次夢，夢見一人向他說，「我是天公派下來的。天公叫我通知你，攝皇帝應做眞皇帝。你如不信，試看我在這亭中開一口新井。」明天，亭長起來，亭中果然發現了一口新井，幾乎有一百尺深。此外，還有邑郡的石牛，扶風的石文，都送到長安。王莽、王舜等去看，忽然狂風大起，對面不相見。等到風停，石前留着一幅銅符帛圖，上面寫着，「天告帝符，獻者封侯。承天命，用神令。」於是王莽把這符瑞奏上太后，說道：「天命不可不畏。我請求對上帝、祖宗及太皇太后、孝平皇后說話都稱『假皇帝；』至於號令天下，和天下上奏

書都直稱『皇帝』，不加『攝』字，藉以順應天命。居攝三年，請改為初始元年。我總盡心竭力教育孺子，使他將來可以和周成王一樣地好。等他長成時，我再讓位，如周公的故事。」

那時有一廣漢郡人哀章，在長安讀書，素來很沒有品行。他看見王莽居攝，猜到他的心事，就豫先作了兩個銅櫃，櫃子上面一個寫「天帝行璽金匱圖」，表示是上帝的命令；一個寫「赤帝行璽邦傳予黃帝金策書」，表示是五帝中的赤帝傳授給黃帝的，這赤帝便是漢高帝。書上說，王莽應當作眞天子，太皇太后應當順着天命。又把那時的大臣姓名寫上，自己也挨了一個。他聽得王莽把銅符帛圖奏上去了，當天晚上就自己穿了黃衣，把這兩個櫃子送到高帝的廟裏。王莽得信，正中下懷，翌日前往，拜受這高帝的禪讓。他下詔書道：「我很微倖，託於皇初祖考黃帝的後代，皇始祖考虞帝的苗裔，和太皇

太后的親屬。現在皇天上帝既經付給我天下兆民，赤帝、漢氏、高皇帝的神靈又承了天命而傳國給我，我敬畏天命，那敢不受！卽日登眞天子位，定國號爲新。正朔應改，服色應易，着以十二月朔癸酉爲始建國元年正月朔，服色配土德尚黃，犧牲應白統尚白。」他又封孺子嬰爲定安公，給以百里之地。封策讀完時，他親執了這孩子的手，流涙道，「從前周公攝政，終使成王復位。現在我竟迫於皇天的威命，不得如願了！」他照了這符命設立官職，哀章就任爲國將，封美新公，和國師嘉新公劉歆同列於上公之位。

從此以後，中國的歷史上，凡是換朝代而出於同民族的，便沒有不依照這個成例，行禪讓的典禮的。所謂征誅，只供異民族的使用罷了。王莽固然不久失敗，但這「心法」是永遠傳下去了，直到袁世凱的籌安會還是如此。

第十五章　漢的改德

我們讀上一章時，應該覺得奇怪。漢高帝自以爲是水德；其後經過了好多人的抗爭，纔改爲土德。武帝太初元年，宣布改制；他用了三統說定正朔，用了五德說定服色。因爲漢是黑統，黑統建寅，故以正月爲歲首；又因漢是土德，土德尙黃，故以黃爲服色。這件事再淸楚沒有。現在王莽受禪，他在三統說中自居於白統，所以定十二月爲歲首，犧牲的顏色用白；白統本是上承黑統的，一點沒有問題。但何以他在五德說中竟自居於土德，和漢的制度一樣呢？又何以哀章作的銅櫃上寫「赤帝邦，」王莽的詔書裏又稱「赤帝、漢氏、高皇帝，」竟把漢說成了火德呢？依照鄒衍的說法，後代是用了前代所不勝之德去尅伐前代的，所以夏用木德而尅黃帝的土德，秦用水德而尅周的火德。漢

就算是改爲火德，繼承它的也應是水德，何以王莽竟是土德呢？這事說來話長，請大家耐心聽着。

王莽不是在詔書裏說過嗎？他是黃帝的後代，虞帝的苗裔。黃帝爲土德，在這名號上就很清楚。虞帝爲土德，淮南子裏也曾提起。既有兩代土德的祖先，他不當爲土德嗎？這是理由之一。歷來的得天下有兩條路：一是唐、虞的禪讓，二是殷、周的征誅。鄒衍之說主「五德相勝，」要後代去尅伐前代，這對於以征誅得天下的殷、周固甚適用，可是對於以禪讓得天下的虞、夏有些不恰當。王莽是早豫備受漢的禪讓的，他肯用相勝式的五德說嗎？這是理由之二。只要記得這兩個理由，這個問題就迎刃而解了。

王莽著有一部家譜，稱爲自本。上面說：黃帝的八世孫是虞舜。虞舜的後代嬀滿，周武王封爲陳侯。嬀滿的十三世孫陳完，字敬仲，因國亂奔齊，齊桓公

命他爲卿。陳完的十一世孫田和，占有了齊國；過三世，稱齊王。到王建時，給秦滅了。項羽起兵，封王建的孫兒田安爲濟北王。後來田安失國，齊人稱爲王家，他們就姓了王。田安的曾孫王賀，在武帝時做繡衣御史，逐捕魏郡羣盜，全活甚多。他搬家到魏郡元城縣住，那邊的人很感激他，有一個老年人說「從前春秋時沙麓崩，晉國掌占卜的史官曾說，『陰爲陽雄，土火相乘。過六百四十五年，此地該有聖女興，大概是齊國的田氏吧？』現在王家正搬在沙麓，時候只差八十年了，想來將有聖女興起來了。」這句話果然應在王政君的身上。王莽靠了這位聖女的力量平步上靑雲，從新都侯直做到皇帝。晉史所說的陰爲陽之雄，土與火相乘，這豫言應當實現了。王莽是土德的皇帝的子孫，當然繼續其土德，而他所代的也自然是火德了。可是有一件難處，漢分明是土德，如何可以把這土德讓與代漢的新，而改居於火德呢？

我們所感到的困難，從漢人看來是不難的，因爲他們有造僞的本領。他們說，王莽是舜後，漢高帝應是堯後；王莽受漢高帝之禪，正像舜受堯禪一樣。這樣講來王莽做皇帝一事，就不是他的陰謀的成功，而是前定的事實了。但如何可以把漢高帝說成堯後呢？

漢高帝起於平民，大刀闊斧，打出了天下。他不像王莽的出於世家，他沒有什麼家譜，他也不想造一本假家譜。所以司馬遷生在武帝之世，替他作本紀，只能說「父曰太公，母曰劉媼」。他的祖父是誰，已經不知道了。其實，就是他的父母也何嘗眞知道！「太公」只是「老太爺」的意思；「劉媼」則是「劉老太太」，究竟高帝的父親叫什麼，他的母親姓什麼，連這一點最基本的史實也渺茫了。他起於平民，可羞嗎？不，不但不可羞，且很可誇。只要看司馬遷說的「秦始皇怕諸侯起兵，不給人尺土之封，然而王跡起於閭巷之間，討

伐之功超過了三代，這不是書中所說的大聖人嗎？這不是天意嗎？如果不是大聖人，怎能受了天命做皇帝呢！」就可知道高帝的起於平民正可表示其出於天意。他的身分越是微賤，所表示的天意越明白。

但到了王莽之世，平民的漢高帝也不得不裝做世家了。劉歆是改造國語為左傳的人，他就淡淡地在左傳裏插入三段關於劉家上代的文字。把這三段文字綜合起來，便是：陶唐氏之後有一個劉累，會得養龍，夏王孔甲用了他管養龍的事，賜他為御龍氏。有一天，那條雌龍死了，他私下把它烹給夏王吃，吃得很好。後來夏王要他找出這條龍來，他心中害怕，逃走了。他們這一家，傳到商代稱為豕韋氏，傳到周代稱為唐杜氏。周宣王殺了杜伯，他的兒子隰叔奔晉。四世到士會，受封於范，為范氏。士會因事逃奔秦國，很受秦康公的寵用；晉人設法把他騙了回來。秦公很好，把他的家眷送回晉國；但還有一部分

留在秦國，就改爲劉氏。劉氏既是陶唐氏的子孫，那麽，漢高帝爲堯的後代這件事可以確定了。他們又繼續編下去，說道：戰國時，劉氏從秦搬到魏；後來從魏往東，住在豐邑，稱爲豐公；豐公就是高帝的祖父。

高帝是堯後，王莽是舜後，這個方式他們已這樣地布置妥貼了。至於王莽是土德，高帝是火德，這一說乃從五行相生說來的。五行相生的次序，是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王莽的天下，是漢高帝傳與他的，只有禪和，毫無尅伐，所以該得用相生說而不用相勝說。王莽既爲土德，這方式當然是「火生土。」因此，他們又替漢高帝造出一件火德的符瑞。他們說：高帝做平民的時候，有一夜喝醉了酒回家，經過一帶窪子，叫一個從人在前邊走。這前行的人忽然轉身回來，報道，「有一條大蛇當着路，走不過去了。」高帝斥道，「壯士走路，怕什麽！」他一直向前，看見了這條大蛇，拔出劍來一砍，砍成

兩段，走過去了。再走了數里，困倦了，躺在地上。後邊來的人經過這死蛇的地方，見一個老婆子正在哭。問她哭的什麼，她道「我的兒子給人殺了！」又問，「你的兒子為什麼給人殺了呢？」她道，「我的兒子是白帝子，變了一條蛇當着路；剛纔給赤帝子砍死了！」這人以為她是亂說，要打她，忽然她不見了。他往前走，經過高帝睡的地方，高帝醒來，他一五一十地說給他聽。高帝知道自己有天子的身分，大喜；手下的人聽得了這件事，對他就愈加敬畏。——這件故事是由他們插入史記的。有了這一件故事，高帝之為火德也確定了。可是一手掩不盡天下目，到現在，我們要問：高帝既是火德，為什麼他即位之後，要自居於水德，襲用秦的正朔和服色呢？又為什麼漢的德運，從文帝鬧到武帝，經歷了五十餘年，而所爭的只有水德和土德，卻從沒有人想出高帝斬蛇的故事，說漢應是火德呢？這件故事是漢家的受命之符，立國的基礎，如何竟

「數典忘祖」了呢？

高帝以赤帝子斬白帝子，象徵漢的滅秦。但秦爲水德，這是千眞萬確的事情。水之色黑，爲什麼會變成白帝子？原來這是依照他們得天下的方式而定的。因爲王莽是土德，依相生說，禪讓與他的應是火德（赤帝）；漢是火德，依相勝說，被他所征誅的應是金德（白帝）。所以這秦爲金德之說，仍是以王莽的土德爲出發點的。（這是王莽等的初期之說，後來他們又不主張秦爲金德了，見下章。）

王莽所以改漢爲火德，其宗旨原在攘竊漢的天下。那知光武帝就利用了這一點，來做「光復舊物」的事業。光武帝名秀，是高帝的九世孫，在南陽做莊家人。王莽做了皇帝的第六年，他到長安讀書，讀的是尚書。地皇三年（西元二二）南陽鬧饑荒，盜賊蠭起。有一個李通把圖讖給他看，上面寫着

「劉氏復起，李氏爲輔，」勸他起兵。打了三年，勢力很大，他手下的將官勸他做皇帝。他正在遲疑之間，先前的長安同學彊華從關中帶了赤伏符來。符上寫，「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鬭野，四七之際火爲主。」符上既分明說了劉秀當以火德爲天子，於是羣臣又奏道，「現在上無天子，海內淆亂。受命之符，明白如此，亟須答謝上帝，以副人民的希望！」那時他們在鄗（今河北省柏鄉縣，）就在鄗南千秋亭設了壇場，燔燎告天，卽皇帝位。後來他到了洛陽，定都起廟，案圖讖，推五運，就正了火德，色尙赤。那時人還講起光武帝的兩件故事：一是他降生時，有赤光照耀室中；一是他初起兵時，遠望舍南火光冲天。他以火德王天下，無論在圖讖上看，在符瑞上看，都是確定不疑的了。

後世的人稱漢代爲「炎漢」或「炎劉，」就是這樣來的。

第十六章　古史系統的大整理

王莽把漢高帝說成了堯後和火德，就滿意了嗎？不，他還有未完的工作。一來呢，他的兩個頂有名的祖先，是黃帝和虞舜；虞舜受堯禪即爲新莽受漢禪的張本固然安排好了，黃帝和前一代又如何可以與他和漢發生關係呢？這一點卻還沒有說明白。二來呢，他是一個主張徹底的人，所以一不做，二不休，索性準備把全部古史在他手裏重新整理一過。我們講到這一個問題，首須明白，那時人的歷史觀念和我們不同。我們知道，社會是時時在變動的，歷史是決不會複現的。而他們則正和我們反對，以爲如果不會複現便不成其爲歷史。他們覺得歷史是走馬燈，來了又去，去了又來。五德說主張五個德循環，三統說主張三個統循環，就是這個觀念的具體表現。王莽處處模做周公，

宛然周公再生，也是這個觀念的具體表現。

鄒衍當初創五德終始說時，只從黃帝說起，黃帝之後就是夏，夏後是商，商後是周。雖說「周而復始」其實連第一次的循環也不曾周徧。所以然之故，大約黃帝是當時傳說中的第一個天子，至於堯、舜們則是屬於黃帝的一代的。其後古史系統愈說愈長，黃帝之前有神農，神農之前有伏羲，拿他們併在黃帝的一代裏似乎不妥當。因此，五德說就有伸展的需要。在董仲舒的書裏，有三王、有五帝、有九皇。什麼叫九皇？就是從當代往上數，數到的第九代。最近的三代叫做「王」，稍遠的五代叫做『帝』，最遠的一代叫做『皇』，時代愈遠，稱號愈尊。所以他以爲夏、商、周的君主稱王，乃是周人之說；從漢人說來，商和周還是王，夏便是帝了。他舉了一個周代的例，說舜本是王，但從周人看他，已經超過了三王，該稱帝了；軒轅是周的前八代，爲五帝之首，所以稱爲

黃帝；神農本來是五帝，現在列在第九代，該爲九皇了。周人既能上溯到九代，秦自能上溯到十代，漢也當然可以上溯到十一代。這比了鄒衍所說的就伸長了一倍。

既有比鄒衍之說伸長的代系，而且五行相勝說之外另有一種五行相生說，於是他們要創造一個新系統時，就可根據了這兩點，重排五德終始表了。他們說，易傳裏有一句「帝出乎震，」震是東方之卦，東方於五行屬木，可見帝王是應從木德開頭的。最古的帝王是伏羲，所以伏羲應是木德。從此以母傳子，以子承母，代代相生，五行之運周而復始。這便是第二種的五德終始說。它雖和鄒衍之說同名，這思想也由鄒衍來，但帝王的代系和繼承的方式都和前者不同，也可算得古史界的一度革命。

我們從周、秦諸子和史記裏看，知道黃帝之前爲神農氏。神農氏傳了十

七世，衰了。那時稱雄的有炎帝、有黃帝、有蚩尤。黃帝先起兵和炎帝戰於阪泉之野，後來又和蚩尤戰於涿鹿之野，都勝利了，於是諸侯尊黃帝爲天子。這種記載固然未必可靠，但炎帝和黃帝是神農氏末世的兩個對立的雄豪，這意義是很顯明的。封禪書中載的管仲論封禪的一段話，也說「神農封泰山，禪云云。炎帝封泰山，禪云云。黃帝封泰山，禪亭亭，」可見炎帝是在神農和黃帝之外的一個帝王。但是他們依據了「木生火，火生土」的原則，定伏羲爲木德，黃帝爲土德，則夾在中間的神農當爲火德；神農是種田的，田應屬土，生出來的禾稼應屬木，如何可以算作火德呢？他們說：不妨，只消把炎帝和神農拍合爲一人就得了！於是這位古帝稱爲「炎帝神農氏，」他的火德的意義在名號上已表現了出來。

他們定漢高帝的祖先爲堯，堯是火德。依據「木生火」的原則，堯的上

一代帝嚳自然是木德。又依據「水生木」的原則，帝嚳的上一代顓頊自然是水德。但是顓頊的上一代就是黃帝了，黃帝的土德是不能改變的，依據「土生金，金生水」的原則，黃帝既不能用了自己的土德下生顓頊的水德，顓頊也不能用了自己的水德上承黃帝的土德，這事怎麼辦呢？他們說：不妨補上一代金德的帝王就是了！他們看古時東方有兩個雄長，一個是太皞，一個是少皞（皞亦作昊），就請少皞填了這個空缺，更加以「金天氏」的副名，使得他的金德可以從名號上直接表現出來。從此古史系統換了一個樣子，黃帝之後是少皞，少皞之後是顓頊了。還有一個太皞，他們安置在伏羲氏的頭上，稱爲「太皞伏羲氏」和「炎帝神農氏」的拼湊而成的複名正相對。

有一篇書，稱爲五帝德，是司馬遷作五帝本紀的藍本。書裏說，「黃帝，少

典之子也，曰軒轅。……顓頊，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也，曰高陽。……帝嚳，玄囂之孫，蟜極之子也，曰高辛……。」他們就依據了這個記載，稱黃帝爲「黃帝軒轅氏，」顓頊爲「顓頊高陽氏，」帝嚳爲「帝嚳高辛氏，」使得「太皞伏羲氏，」「炎帝神農氏，」「少皞金天氏」等新造的稱號得到了固有名詞作陪客，可以減少生硬和雜湊的感覺。再有堯和舜，是向來稱爲陶唐氏和有虞氏的，也就稱爲「帝堯陶唐氏」和「帝舜有虞氏。」經過這樣的整理，在形式上是整齊極了。

秦爲水德，是始皇按照了鄒衍的五德終始說而明白宣布的。但到這時，漢的火德爲周的木德所生，緊緊的承接，秦已沒有地位了，如何可以解釋始皇的改制呢？他們說：不妨，秦以水德介於周、漢的木火之間，失了它的五行的次序，所以享國不永，只得列爲「閏統！」唉，假使這相生式的五德說早已有

了，秦始皇還那裏會自己甘心居於閏統呢！他們覺得木火之間但有一個秦，沒有復現的形式，便不成其爲走馬燈式的歷史，所以說：伏羲木和神農火之間有共工氏；帝嚳木和帝堯火之間有帝摯；周木和漢火之間有秦：見得五德之運運轉到了這個地方時便非有一個閏統不可。

他們各方面都布置好了，於是寫定「全史五德終始表」如下：

德			
木	1 太皞伏羲氏	6 帝嚳高辛氏	11 周
閏水	共工	帝摯	秦
火	2 炎帝神農氏	7 帝堯陶唐氏	12 漢
土	3 黃帝軒轅氏	8 帝舜有虞氏	13 新
金	4 少皞金天氏	9 伯禹夏后氏	
水	5 顓頊高陽氏	10 商	

鄒衍的五德說還沒有轉完一回，那裏知道過了二百數十年就會轉到第三回！鄒衍本說禹爲木德，其符瑞是「天先見草木秋冬不殺，」到這時禹就成了金德，是白帝之子了。鄒衍本說湯爲金德，其符瑞是「天先見金，刃生於水，」到這時他也變了水德而爲黑帝之子了。鄒衍又說文王時「赤烏銜丹書集於周社，」表明他是火德，但到這時他又成了木德，赤雀銜到的丹書上的文字是「姬昌，蒼帝子」了。爲什麼要這樣變？原來它的中心是建築於

火　炎帝——帝堯——漢高帝

土　黃帝——帝舜——王莽

上的。這個中心絕對不能變，所以中心以外的一切就不得不換去了各個的本來面目而遷就它了。

王莽既在學說裏先有此規定，因此，他做了黃帝之後，就下詔道，「帝王

之道是相通的，盛德之後是應當百世享祀的。黃帝、帝少皡、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帝夏禹等都有聖德，應當尋訪他們的後代，奉守其祀典。」他於是封姚恂為初睦侯，奉黃帝後；梁護為修遠伯，奉少皡後；皇孫功隆公王千，奉帝嚳後；劉歆（不是那個做國師的）為祁烈伯，奉顓頊後；劉疊為伊休侯，奉堯後；媯昌為始睦侯，奉舜後。又封夏後姒豐為章功侯，殷後孔弘為章昭侯，都位為「恪」；周後姬黨為章平公，和先封的漢後定安公劉嬰，都位為「賓」。這樣，新造的古史系統就和實際的政治發生了密切的關係，靠了這關係而後這杜撰的系統就獲得了保證人了。

到後來，王莽在政治上固然失敗，但這個杜撰的古史系統卻已立於不敗之地。我們試翻開近三百年來民眾的正統史書綱鑑易知錄，上面便寫着「太昊伏羲氏以木德王，」——「炎帝神農氏以火德王，」——「黃帝有熊氏以土

德王，」—「少昊金天氏以金德王，」—「帝嚳高辛氏以木德王，」—「帝堯陶唐氏以火德王，」—「帝舜有虞氏以土德王，」—「大禹以金德王。」這些話誰敢不奉爲典則？誰會想到這是王莽的騙局的遺留？

這古史系統的改造，把人們欺騙了近二千年。一班有學識的人固然也感覺其離奇，但至多只有不提而已，總想不出它是怎樣來的。自從清末提出了「今古文問題，」知道應把古文的著作和今文的著作分別着讀，比較之下，纔發見這是古文家擺佈的迷魂陣。康有爲作新學僞經考，指出了黃帝、顓頊之間本來沒有少皞這一代；崔適作史記探源，指出了王莽所以這樣排列的意思是要證明新之當受漢禪正如舜之當受堯禪：這一個大黑幕方得揭開。至於幫助王莽擺下這迷魂陣的，他們以爲是劉歆；我也以爲很對。一來呢，劉歆是編輯左傳的人，左傳既說劉爲堯後，又偷偷地把少皞插入黃帝和顓

頊之間，又露出金天氏一名，隱隱與少皞聯起，而這些說話顯然與他種古籍矛盾，足以證明其出於編輯人的竄亂。二來呢，班固作漢書律歷志，自己說明根據的是劉歆之言，而志中引的世經就是這個新造的古史系統的娘家。清代的今文家自己的建設固然不足取，但其對於古文家的騙局的破壞工作實是非常的精當，爲講漢代學術思想史的人所不該不取材的。

第十七章　經古文學的建立

劉歆在哀帝時要立四種古文經傳，碰了博士們一個大釘子，他忍氣吞聲，出來做了幾任外官。但他的幸運終於到了，他少年時任黃門郎，恰好那時王莽也是一個黃門郎，兩人都很博學，意氣十分相投。自從平帝元年，王莽當了權，他就回到朝內，任右曹太中大夫，又任義和，京兆尹。元始四年，王莽奏起明堂和辟雍等，規復古代的建築，就是由劉歆主辦的。因他有功，封為紅休侯。又使他典儒林史卜之官，考定律歷。這時候，劉歆已成為文化事業的中心人物，他可以用了自己的理想構成一個文化的系統了。於是左氏春秋、古文尚書、逸禮、毛詩都立於學官。向來反對他的博士們只得忍氣吞聲地領受他的報復。

他立了這四種古文經傳，還不以爲滿足，索性更掀起一個大規模的學術運動。六經裏面的樂，本來是有譜而無經的，他也找出了樂經而立於學官。又增加博士員每經五人，六經共三十人；每一博士領三百六十個弟子，總共有一萬八百個博士弟子。他還以爲不足，奏請徵求天下異能之士，凡是通一經，教授十一人以上，和懂得逸禮、古書、毛詩、周官、爾雅、天文、圖讖、歷算、鍾律、月令、兵法、小學、史篇、醫術、本草的，地方官就替他備了車馬，送到京城裏來。在元始四五年間（西元四——五）到的數千人，都令在未央宮的廷中討論記錄，要他們改正前人的乖謬，統一各種的異說。這件事情，手段非常毒辣，既把古文學的種子散播到民間，又令今文學增加許多敵人。凡是古文學家眼光中感到的「乖謬」和「異說」都被打倒了。這是用了利祿的引誘來統一學術思想的辦法，實在還是武帝立五經博士的老手段。

當時這一班人，現在已經不可考了，只知道那時通知鍾律的有一百多人，他們的議決案是羲和劉歆領銜奏上去的。又知道那時說文字的有一百多人，其中以沛人爰禮的學問爲最高，就任他爲小學元士。黃門侍郎楊雄採取他們的討論的結果，編成了一部訓纂篇。漢代通行的文字，據倉頡篇只有三千三百字；現在訓纂篇就有五千三百字了。到居攝時（西元六——八），大司空甄豐又奉命校文書，給他改定的古文字也不少。那時有六種書法：一是「古文，」說是孔家壁中書的遺文；二是「奇字，」是古文的變體；三是「篆書，」就是小篆；四是「左書，」是秦的徒隸們寫的簡筆字；五是「繆篆，」是用來刻印的；六是「鳥蟲書，」是用來寫旗幟的。有此分別，於是今文經歸入了「左書，」地位遠在古文經之下了。這是文字學的一回大整理，他們用了這手段奠定了經古文學的基礎。從此以後，文字愈多，東漢時班固作

的續訓纂篇就有六千一百多字，許慎的說文解字就有九千三百多字了。

我們知道這些古文奇字有的是他們雜湊起來的，有的是完全杜撰的，也有是從古器上鈔寫來的。但他們決不承認是零碎集成屢次聲明爲整個的材料。他們說：壁中書是魯恭王毀壞孔子宅時得到的，其中有禮記、尚書、春秋、論語、孝經（諸位應記得，哀帝時劉歆責備博士的信上說孔壁裏出來的東西只有禮和書，而今又添出了三種了！）還有漢初丞相張蒼也獻上古文的春秋左氏傳。他們說：這種文字或是孔子手寫，或是孔子同時人所寫，所以古文經是最可靠的，它確爲孔子的眞傳。我們翻開漢書藝文志來，那一種經書不是今古文並列，這可見他們建立古文學的工作是怎樣的急進呵。所以，今文學是由春秋、戰國以來五百年間漸漸構成的；古文學則是劉歆一手包辦，在十餘年間一齊出來的。我們說劉歆作僞，人家聽了往往以爲言之過甚，

說他一個人的精力如何造得了許多。須知他一個人的精力固然有限，但他借着帝王的權勢，收得三十個博士，一萬零八百個弟子員，數千個奇材異能之士，漫說十幾部書，就是幾百部書也未始做不出呢！劉歆何須親手做，只消他發凡起例，便自有人承應工作。這承應的工作雖成於他人之手，難道他就不可負造意的責任嗎？

錢玄同說，「古文經對於今文經的態度是這樣：『我的篇章比你的多；我的字句比你的準；我的解釋比你的古；我有你所沒有的書，而你所有的我卻一概都有。』因爲他是這樣的態度，所以就上了今文家一點小當。今文經中漢朝人僞造的文章，古文經也居然有了，如易之說卦以下三篇和書之太誓皆是。古文經據說非得自孔壁，即發自中秘，或獻自民間，總之皆所謂『先秦舊書』也。先秦人用『古文』寫的書中居然有漢朝人僞造的篇章，這不

是作僞的顯證嗎?」

他們不但要造僞經,而且要造僞經的傳授系統。例如毛詩,本來沒有什麼傳授可說的,但他們也想出一個很長的系統來。(他們自己的記載是失傳了;依據唐人書上寫的是孔子傳子夏,子夏傳曾申,曾申傳李克,李克傳孟仲子,孟仲子傳根牟子,根牟子傳荀卿,荀卿傳毛公,毛公做河間獻王的博士;從此傳下來,直到王莽時。)他們說詩經該有三百十一篇,但古文經只有三百零五篇是不全的,他們失去的六篇是小雅裏的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這句話就露出破綻來了。錢玄同說「漢初傳詩,卽分魯、齊、韓三家,這三家各自傳授,並非同出一源,何以申培、轅固、韓嬰三位老先生都把這六篇詩忘了,又都把其他的三百零五篇記住了?天下竟有這樣的巧事,豈非大奇!更奇的是古文之毛詩,這六篇的篇名雖然幸被保存了,偏偏它們的詞句也亡

缺了！今文詩據說是靠諷誦而傳下來的，三位老先生既同樣的背不出這六篇；而古文詩據說是從子夏一代一代傳到大毛公，作故訓傳，被河間獻王所賞識，立博士，則早已著於竹帛了，偏偏也是缺了這六篇，偏偏和今文三家同樣的缺了這六篇。這種奇蹟，居然能使自來的經學家深信不疑，劉歆的魔力眞是不小哇！」

王莽自從輔了平帝之後，處處模倣周公，所以那時就有周官一書現出，說是周公作的，供給王莽許多模倣的資料。當居攝三年，王莽的母親功顯君死了，太后詔議他的服制，羲和劉歆和博士等奏道「攝皇帝要使漢朝和唐、虞、三代同樣的興盛，所以開秘府，會羣儒，制禮作樂，以成天功。他聖心周至，有獨見之明，又發見周禮一書，可供損益古代禮制的參考。現在功顯君薨了，攝皇帝承皇天之命，奉漢大宗之後，不得顧私親。周禮裏說，『王爲諸侯緦縗。』

應請用這天子弔諸侯之服，以應合聖制。」在這段話裏，已親切地告知我們，周官（即周禮）這部書是王莽發見的。在這樣崇拜周公的高潮之下，在周公的偶像這樣支配現實政治的時候，恰巧發見了這一部書以供他制禮作樂時的參考，這部書的來歷不是很可疑嗎？因爲有了這個參考，所以周官裏「兆五帝於四郊」，他就建郊宮；周官裏「辨廟祧之昭穆」，他就定祧廟；周官裏有「九命作伯」，他就受九錫；周官裏有「嘉量」，他就製嘉量（故宮博物院藏一器，現在南遷了；）周官裏說「羞用百有二十品」，他就吃一百二十樣的飯菜；周官裏有「六宮」和「九嬪、世婦、女御」一班妃妾，他就於皇后之外列「和、嬪、美、御」之位：三個和人位視三公，九個嬪人位視九卿，二十七個美人位視大夫，八十一個御人位視元士：一共納了一百二十個女子，比較古代的天子超過了十倍。

在其餘的古文經傳裏也多尋得出幫助王莽做成皇帝的痕迹。例如春秋隱公元年只寫「元年春王正月，」不寫「公卽位，」春秋家推求孔子所以不寫的緣故，說隱公本有讓國於弟桓公之意，故孔子以不寫他卽位表顯他的志願。不過這僅是隱公的志願而已，至於魯公之位終究是他實任的。左傳卻說「不書『卽位』攝也，」這樣說來，隱公就不是實任的君而是用了臣的資格來攝行君事了。這對於王莽的做攝皇帝是怎樣的給予他一種有力的根據啊！又劉歆所表章的古文尚書裏有一篇嘉禾，其中的一段是「周公奉鬯立于阼階，延登，贊曰，『假王莅政，勤和天下，』」這是不是王莽做假皇帝的一個很好的先例？天下竟有這樣的巧事，後世的人要什麼就可以在古書裏找出什麼來！

古代的歷史，古代的書籍，都爲供給他們的需要而弄亂了。無數的知識

分子，也都受了他們的麻醉了。光武帝雖說「光復舊物，」但在文化上，他已經認不清誰是舊的，誰是新的。而且他以赤伏符受命，固已根本接收了王莽的學說。所以中元元年（西元五六，）他就依照王莽的制度，築起明堂、辟雍、靈臺來。明帝繼續了他的事業，坐明堂而朝列侯，升靈臺以望雲氣；又臨幸辟雍，親袒割肉，行養老之禮；饗射禮畢，他正坐講經，諸儒執經問難於前，數萬個冠帶齊整的紳士們環繞橋門，靜靜地聽着。（北平的國子監就是漢的辟雍遺制，可以到那邊去想像那時的情形。）因爲漢的火德只有用了王莽的歷史系統纔能說明，而這個系統除了圖讖之外，在古書中只有左傳是尋得到證據的，所以左傳被重視了。當光武帝時，就想立左傳的博士；有一個老博士范升竭力反對，說道，「左傳不祖孔子而出於左丘明，又沒有相傳的師徒，又不是先帝所立的，爲什麼要立博士呢！」他和幾個古文學者辨難了好久，又

提出左傳的不合處十四條奏上去。光武帝不聽他的話，立了後來又因許多人的反對廢了。到章帝初年，令賈逵自選二十個高才生，把左傳教他們。八年（西元八三），又詔諸儒各選高才生受左傳、毛詩、古文尙書等古文家的經典，又任賈逵的弟子爲郎官，學者都欣欣地嚮慕。既有許多的高才生替它宣傳，它在學術上就取得了新的生命，漸漸地成爲春秋之學的正統，把原來惟一的春秋傳（公羊）擠出去了。

東漢一代，博士共十四人，都是今文經之學。在表面上看，似乎是今文學的勝利；然而這勝利只有在表面上而已。所以然之故，古文視今文爲後出，經過一次整理，當然比今文進步；況且左傳的記事何等美麗，周官的典制何等緜密，今文經裏那裏找得出來。因此，東漢時幾個最有名的學者，如賈逵、服虔、馬融、鄭玄，都是古文家，或是兼通今古文的。到了魏、晉之後，五胡亂華，中原士

大夫忙着南渡，今古文的經典和漢人的經說散失很多，今古文的界限就記不起了。到唐初作五經正義易用晉王弼注，書用晉梅賾所獻的僞古文尚書（劉歆的古文尚書已是假，這乃是假中之假）和僞孔安國傳，詩用毛傳和鄭玄箋，禮記用鄭玄注，左傳用晉杜預注。後又加上周禮和儀禮的義疏，都用的鄭玄注。鄭玄所以在經學界中握有絕大權威，就爲這七部正統的經典的注釋，他一個人占據了四部之多。但他是兼修今古文的，常用古學說去改今學說，又用今學說去改古學說，所以後人罵他爲攪亂家法的罪魁。這幾種經典裏，純粹是古文學的，有周禮和左傳的本身和詩經的毛傳。雖然古文學還沒有把經學界統一，但比了湮沒了的今文學究竟佔了絕大的優勢，劉歆的勢力賴此維持到清末。自從清代中葉（嘉慶十，一八〇五）劉逢祿作了左氏春秋考證，他的地位纔開始搖動；到清代末葉（光緒十九，一八九一）康

有爲作了新學僞經考，他方受了致命傷而倒壞了。他爲什麼要造僞書僞史，這是漢代史中的問題。他要造僞書僞史在古書古史裏發生怎樣的影響，這是文籍考訂學中的問題，也可說是上古史中的問題。所以現在我們的使命，就是要向他清算這一千九百年來的攪亂古書和古史的總賬。

第十八章　祀典的改定和月令的實行

我們翻開古書來看，覺得秦以前的國家宗教是很簡單的。最大的祭禮是郊，一年一次，祭的是天，也把天子的最有功德的祖先去配享。例如周人，他們的始祖是后稷，后稷在農事上是有大功勞的，所以他們在郊祭時便以后稷配天，連帶祈求年穀的豐登。其次是社，這髣髴像現在的城隍廟和土地堂一樣，無論大都小邑，都有社廟；上自天子，下至庶民，都有他的社。他們不但在那邊祭后土之神，就是碰見大水、大火等災難，或是日食等災難的豫示，都要擊鼓殺牲而祭。逢到打仗，出兵和班師時都須祭社；獻俘也在那邊。因爲那邊成了軍事機關，所以即在太平的時候，也要借着社祭陳列軍器，好像開國防博覽會似的；齊國的社尤其有名。社既是代表國土，又作國防的中心，再加上

了民食的稷，國家的意義已完全，所以「社稷」二字就成了國家的代名詞。郊社之外，又有宗廟，是祭祖先的；又有旅和望，是祭國內的名山大川的。寥寥落落，只有這幾種。要拿陰陽五行之說來分配，至多把郊配陽，社配陰；五行便無從說起。好在那時還沒有系統的陰陽五行說，用不着人們發愁。

那時的祀典比較可和五行說接近的，是秦國的上帝。然而秦文公在鄜衍祭白帝，秦宣公在渭南祭青帝，秦靈公在吳陽祭黃帝和炎帝，都是隨時隨地建立，並沒有顧到五行的方位。到漢武帝時，他在長安西北的甘泉建了泰時壇去祭天，在長安東面的汾陰建了后土祠去祭地，也沒有按照着方位。這種不擇地的設置，足見其時尚沒有極嚴密的陰陽五行說，所以不曾處處受着這些規律的束縛。武帝又喜歡求神仙，任方士，以至許多的民間信仰都變成了國家宗教。

武帝以後，陰陽五行的學說經經師們的鼓吹，這空氣愈來愈濃重了，簡直籠罩着一切。他們以爲屬於木的一定居東，屬於火的一定居南，屬於土的一定居中，屬於金的一定居西，屬於水的一定居北；少陰爲西，太陰爲北，少陽爲東，太陽爲南，都是一定不移的方位。既有這些嚴格的學說，於是以前的種種宗教建設大家看得不順眼了。成帝初卽位（建始元，西元前三二）丞相匡衡奏言「帝王的事務，沒有比郊祀更重的，所以從前的聖王都盡心極慮地規定這制度。他們祭天於南郊，爲的是就陽；祭地於北郊，爲的是就陰。上天受天子的祭饗，是在天子的都城裏的。現在天子住在長安，祭天反到太陰方面的甘泉去，祭地反到少陽方面的汾陰去，和古禮太不合了。應當把這天地的祀典搬到都城來舉行，從此祭天於南郊，祭地於北郊，回復古帝王的規模。」會議的結果照辦了。匡衡又奏，「甘泉的泰畤太奢華，有采鏤黼黻的裝

飾，有騖路騂駒的祭物，又有玉几玉器的陳列，又有童男童女的歌樂，這也和古制不合。古代的祭天之禮質樸得很，祭具是陶製或瓠製的，牲只用犢，席只用稭。現在也應當復古。」他還說「秦國所立的上帝祠本不合禮，應當和其他不合禮的祠廟一齊罷廢。」成帝都接收了。那時國家奉祀的祠廟本有六百八十三所，審查的結果只有二百零八所是合禮的，其它都廢了。候神方士等七十餘人，也都免職歸家。這是把原有的祠宇作一次總整理，大淘汰，把漢武帝在封禪郊祀的狂熱中的建設完全破壞了。實在說來，這是儒生對於方士的威脅，他們用了純粹的陰陽五行說把隨時隨地發生的神仙廟祀打倒了。他們反對的是鬼神，保留的是術數。他們說是古代聖王如此，其實只是他們心目中的聖王是應該如此的。

成帝沒有兒子，王太后急於抱孫，疑心爲了遷廢諸廟，受鬼神的責罰，永

始元年（西元前一六），她下詔把泰畤遷回甘泉，后土祠遷回汾陰，又恢復了許多祠廟。可是到底沒有用，成帝也死了。王太后十分生氣，她說「皇帝違了經義定郊禮，原是不錯的。爲了求福，所以又遷回去。現在到底沒有得到一些福佑，還是順了皇帝的原意，回復了長安的南北郊罷！」

哀帝卽位之後，也常生病，爲要求福，又徵用方士，把以前所廢的祠廟完全恢復了。他在一年之中祭過三萬七千次。過了一年（建平三，西元前四），病還沒好，又把泰畤和后土祠遷回原處。到平帝元始五年（西元五，）王莽又請復長安南北郊，並請把高帝高后配享：冬至日，祠南郊，高帝配而望羣陽；夏至日，祠北郊，高后配而望羣陰。王太后都照准了。三十六年之間，天地之祠搬徙了五次。

因爲王莽是一個篤信陰陽五行說的人，所以他既繼承了匡衡的主張，

用陰陽說定了南北郊，還要更進一步，用五行說定羣神之祀。他和太師孔光，羲和劉歆等八十九人議，說道「天子以父禮事天，以母禮事地。現在應稱天神爲皇天上帝泰一，兆（兆是壇域）爲泰畤；稱地神爲皇地后祇，兆爲廣畤。此外，再把羣神以類相從，分爲五部。這五部是：

（一）中央黃帝，黃靈后土畤，及日廟、北辰、北斗、塡星、中宿、中宮，於長安城之未地兆。（照十二辰的方位，「未」在西南角上。）

（二）東方帝太皞，青靈句芒畤，及雷公風伯廟、歲星、東宿、東宮，於東郊兆。

（三）南方炎帝，赤靈祝融畤，及熒惑星、南宿、南宮，於南郊兆。

（四）西方帝少皞，白靈蓐收畤，及太白星、西宿、西宮，於西郊兆。

（五）北方帝顓頊，黑靈玄冥畤，及月廟、雨師廟、辰星、北宿、北宮，於北郊

兆。」

這就是周官裏所說的「兆五帝於四郊，」他把這制度實現了。這五帝的名目，諸君應當記得，便是第十六章裏五德終始表的第一層。那時已是居攝中，正在醞釀着受禪，所以這五方之帝便是五行相生說下的古史系統中的帝王。再替這五帝添上五個輔佐，太皞之佐是句芒，炎帝之佐是祝融，黃帝之佐是后土，少皞之佐是蓐收，顓頊之佐是玄冥，使得這個系統的地位可以更加鞏固。他們把這宗材料插入古文學的兩部經典：第一是劉歆重編的左傳，就附在「漢爲堯後」說的一章之下，說這是五行之官，生時封爲上公，死後祀爲貴神的。第二是王莽徵求通曉之士的月令，說太皞是春季的帝，句芒是春季的神；炎帝是夏季的帝，祝融是夏季的神；黃帝是中央的帝，后土是中央的神；少皞是秋季的帝，蓐收是秋季的神；顓頊是冬季的帝，玄冥是冬季的神。」

年本來是四時，到這時硬把它拉長，成爲五時了。

皇天上帝泰一，是最高的天帝。太皞、炎帝們爲五帝，是次一級的天帝。這個方式固然和漢武帝的泰一壇相像（見第五章），但武帝時的五帝只是五種顏色之帝，沒有同傳說中的古天子發生關係，而王莽定的制度則天帝的系統卽是古史的系統了。這一點的差異，不能不說是王莽設下的陰謀，也不能不說是經古文學的中心問題啊！

月令這一篇，講的是天子居明堂之禮。這篇的大意，是天子每一個月應當順着時令做天人相應的工作（見第一章）。自從王莽當權，建築了明堂，又徵求通月令的人，一時祭祖先，封諸侯，行大射，都在那邊，做得很有聲有色。王莽失敗之後，長安的明堂毀廢，光武帝繼續在洛陽興造。明帝永平二年（西元五九）下詔祀光武帝於明堂以配五帝，又頒發時令，迎氣於五郊。立

春之日，迎春於東郊，祭青帝和句芒，車騎服飾都青色，唱的是青陽之歌。立夏之日，迎夏於南郊，祭赤帝和祝融，車騎服飾都赤色，唱的是朱明之歌。前立秋十八天，迎黃靈於中兆，祭黃帝和后土，車騎服飾都黃色，唱的是帝臨之歌。立秋之日，迎秋於西郊，祭白帝和蓐收，車騎服飾都白色，唱的是西皓之歌。立冬之日，迎冬於北郊，祭黑帝和玄冥，車騎服飾都黑色，唱的是玄冥之歌。

從此以後，「順時令」一義遂爲帝王施政的總綱。章帝元和二年（西元八五）下詔道，「春天是生養萬物的時候，應當息事寧人以奉天氣。」這年的秋天，又下詔道，「月令冬至之後，但有順陽助生的明文，而不載鞫獄斷刑的政令。天子的生殺是應當順着時氣的。現在特定一種法律：凡在十一月和十二月裏，不許送上刑獄的報告。」那年十一月冬至，又依照月令，把關梁閉起。元和三年二月，又下詔道，「月令說孟春之月，應當好好地去視察丘陵

土地所宜以備種植。現在荒地尙多，着卽分給貧民，令他們各盡地力，勿得游手。」就在這一月裏，他因要到中山去，又令道「現在方春的時候，所過的地方不得有所砍伐。天子雖尊貴，但不在適當的時候砍去一株草木，就不算順天，也就是不孝。巡行之際，凡車馬可以避開的，便避開了。」章和元年（西元八七）七月，又詔道「依照秋令，這一月裏應當養衰老，着賜高年者每二人布帛各一疋，讓他們自己備些醴酒和酪粱龍。」章帝之後，歷朝帝王也多在春天養幼賑貧，在秋天養老恤刑。

一般的學者，把月令的著作時代說得早是周公作，說得遲是呂不韋作。但此書既在漢前，何以在西漢時不能發生什麼影響，而在東漢時便會發生大影響？何以漢武帝初年要立明堂，只爲朝諸侯，後來在汶上造明堂，只有取資於方士的圖畫，而古制的再現必有待於王莽制禮作樂的時候？何以西漢

時討論明堂有紛紛之說，而一到東漢卽翕然無異議，一切都有固定的方式可以遵循了？所以我覺得這篇書的出現是很有問題的。雖則這篇書還見於呂氏春秋等書中，難道他們就不能插進去嗎？

古時最大的祭禮是郊和社。到這時，郊是析爲南郊和北郊了。北郊由后土祠來，祭地神，性質和社實在沒有什麼分別。但漢代在后土祠外另有官社，所以王莽更立官稷，又把夏禹配食官社，后稷配食官稷，恢復古代的社稷之祀。這個制度傳下來，永遠沒有什麼大改變。我們看，北不前門外有個天壇，這就是南郊；安定門外有個地壇，這就是北郊；天安門西邊的社稷壇（今爲中山公園）就是官社和官稷。還有一個先農壇，在天壇的對面，是祭農神的，好像和社稷壇的「稷」重複了，這是漢代所沒有的。推原它的由來，當出於周人的「郊祀后稷以配天。」地壇祭地，先農壇祭后稷，社和稷都有了着落了，

爲什麼還要立社稷壇？原來社稷一名已習用爲國家的代名詞，其本義已經送給地壇和先農壇了。

第十九章　讖緯的造作

古代人最喜歡作豫言，也最肯信豫言。那時的史官就是製造豫言的專家。還有一種豫言，說是上帝傳給人們的，叫做讖。相傳秦穆公曾經睡了七天不醒，醒來的時候對人說，「我是到上帝那邊去的，上帝告我將來晉國怎樣，秦國怎樣。」他叫人把這些話寫出來，稱它爲「秦讖。」後來晉國的趙簡子也像他一樣，睡了七天，醒來的時候告他的大夫說，「我到了上帝那裏，和許多的神靈游於鈞天，聽廣樂，看萬舞，快樂極了。忽然有一頭熊要來抓我，上帝命我射它，一射就死了。又有一頭羆撲來，我照樣一射，羆又死了。我瞥見我的兒子也在上帝旁邊，上帝指着一條翟犬，對我說，『等你的兒子長大時再給他罷！』」這些話也都記出藏好，當然成爲趙讖。後來趙簡子滅了晉的世卿

范氏和中行氏，知道夢裏射死的一熊一羆就是他們的象徵。他的兒子襄子滅了代國，這翟犬的讖也應驗了。這都是上帝的命令，但上帝不肯明白說出，只管用了彷彿相類的東西來作暗示，逼得人們去猜謎，他爲什麼這樣喜歡要手段呢？

秦始皇時，這類的豫言也常有。三十二年（前二一五）他派燕人盧生入海求神仙。盧生到了海裏沒有見到神仙，卻得到一本圖書，上面寫着「亡秦者胡也。」於是始皇發兵三十萬人往北去打胡（匈奴），奪取河套地。不知道這個讖要是應在他的少子胡亥身上的！這個讖既有圖，又有書，其形式大概和現在流傳的推背圖相像。三十六年（前二一一）秋天，有一個使者從關東來，晚上經過華陰，忽被一人拉住，那人一手把一塊璧遞給他，說道，「請你替我送給滈池君（長安西南有滈池；）還告他，在這一年中祖龍要

死了。」使者正要問他，那人已不見。他把這事奏上；查考這塊璧，乃是始皇二十八年渡江時沉在江裏的。始皇很不高興，但自己寬慰道「山鬼懂得什麼；況且祖是人之先，也未必是我呵！」他爲要避開這個惡運，就往南方去游玩。三十三年七月，他果死在路上。大家說，祖是始的意思，龍是皇的意思，這又是一個應驗的讖言了。

但讖言眞是上帝降下的嗎？看下面一件事就很使我們疑惑。當始皇聽得「祖龍死」的前幾個月，有流星墜在東郡，化爲石，有人在石上刻了「始皇帝死而地分」七個字。這句話說得太明顯了，用不着猜謎，所以他知道這是自己的臣民的咒詛，便派御史去查問，雖然沒有得到主名，也把石旁的居民盡殺了，連這塊石頭也銷燬了。其實從楚、漢之際看來，這句人造的讖言也是十分應驗的。

西漢時，社會安定，這類刺戟人心的讖言當然減少。但到武帝之後，民窮財盡，國本動搖，讖言又得了發展的機會。例如上面提起的，昭帝時，泰山下一塊臥地的大石忽然站起，上林苑的枯柳樹忽然重生，眭弘就說將有新天子從匹夫中突起。又如成帝時，齊人甘忠可說上帝派赤精子下凡，傳給他一部包元太平經，供給漢室再受命的應用。（均見第七章。）王莽時，這種風氣更盛了。武功長孟通掘井時發現一塊白石，上面有「告安漢公莽爲皇帝」八個紅字，王莽就做了攝皇帝。臨淄亭長發現了一口新井，巴郡得到石牛，扶風得到石文，攝皇帝就去掉了「攝」字。哀章把「天帝行璽金匱圖」和「赤帝行璽邦傳予黃帝金策書」送到高廟之後，漢高帝就讓國與王莽了。（均見第十四章。）在這些記載裏最可注意的，是哀章的「金匱圖」和「金策書」，足見這是既有圖又有書的，和盧生在海裏得到的東西相彷。

哀章的圖書裏寫着王莽的大臣八人，又取了兩個吉祥的名字，喚做王興、王盛，連他自己一共十一個人，都署定了官爵。王莽既登極，就照了這個上帝的單子去任命。於是王舜爲太師，封安新公；平晏爲太傅，封就新公；劉歆爲國師，封嘉新公；哀章爲國將，封美新公；以上四人稱爲四輔，居上公之位。又甄邯爲大司馬，封承新公；王尋爲大司徒，封章新公；王邑爲大司空，封隆新公；這三人居三公之位。又甄豐爲更始將軍，封廣新公；王興爲衛將軍，封奉新公；孫建爲立國將軍，封成新公；王盛爲前將軍，封崇新公：這四人稱爲四將。王興、王盛，朝中並沒有這兩人，但姓這個姓又叫這個名的卻很多；王莽訪得同名姓的十餘人，其中以退職的城門令史王興，賣餅人王盛的容貌爲最合於卜相的標準，就登用了他們，從此這二人躋於闊人之列，這種好運眞是他們夢裏也沒有想到的。大家看見做官有這一條捷徑，於是爭作了符命獻上去；雖已

得不到公爵也可以望封侯。至於不屑幹這種事的，見面時常常戲問道，「你還沒有得到天帝的委任狀嗎？」有人勸王莽道，「這實在開了姦人作福的門路，又是亂了天命，應當除去其根原纔是。」王莽也覺得這種事情幹得膩了，於是獻符命的往往下了監獄。起初，甄豐和王舜、劉歆們都是王莽的心腹人，王莽從大司馬做到皇帝，甄豐也曾出過不少的氣力，定過不少的計謀。到這時，他雖由了金匱圖而得着公爵，但和賣餅的王盛同居於四將之列，反不及一個無賴的哀章，終覺得不高興。他的兒子甄尋知道他的意思，就作了一通符命，說新室當依照周、召的故事，分陝立二伯：更始將軍甄豐為右伯，太傅平晏為左伯。王莽因他們都是舊人，也聽從了。當甄豐任了右伯，尚未動身的時候，甄尋貪得無厭，又作了一通符命，說以前的漢平帝的皇后，漢亡後稱為黃皇室主的，應當改嫁甄尋。平帝的后是王莽的女兒，他這一回可不答應了，

怒道，「黃皇室主是天下之母，這是什麼話！」他發吏收捕甄尋那追隨多年的右伯甄豐就只得自殺了。

王莽自從作了眞皇帝，爲要替自己宣傳，派五威將王奇等十二人頒發符命四十二篇於天下，都是說些漢的火德是怎樣的銷亡，他的土德是怎樣的興起，皇天的符命是怎樣地一次一次給予他的種種故事。文帝時黃龍出現於成紀（見第四章）不是公孫臣主張漢爲土德的證據嗎？但在這四十二篇裏，居然列爲王莽的土德的符瑞了。經他這樣一宣傳，把這些觀念深深印入國民的腦裏，於是光武帝做皇帝時便非自承爲火德不可，所以赤伏符就是跟着這四十二篇來的。

且說王莽時有個公孫述任導江卒正（那時改蜀郡爲導江，太守爲卒正，）到王莽滅亡，四方兵起，他就自己立爲蜀王；後來又自立爲天子（光武

帝建武元，西元二五）國號成。他根據王莽的五德系統，以爲土生金，他在王莽之後應爲金德，所以色尙白（成都稱爲白帝城，即由此來）；又建元爲龍興。他也和王莽同樣，好作符命。他以爲讖書裏說的「孔子作春秋，爲赤制作，斷十二公」，赤是漢，高帝到平帝是十二代（連呂后數在內），可見漢的歷數已經完了；一姓不得再受命，所以劉秀雖有赤伏符還是無效的。他又引錄運法說「廢昌帝，立公孫」，括地象說「帝軒轅受命，公孫氏握」，援神契說，「西太守，乙卯金」，以爲他姓公孫，應當受命；又他以西方的太守起家，應當去乙（軋）絕卯金（劉）。他又說五德之運，黃承赤而白繼黃，所以他據西方爲白德，確是得到了帝王的正統。他屢次發出檄文，把這些意思宣傳到中原來，要使大衆相信他是一個眞命天子。光武帝不怕打仗，卻怕在讖書裏眞有別人做天子的證據，就給他一封信，說道，「西狩獲麟讖上說的「乙子卯

金，一是漢高帝以乙未年受命。「光廢昌帝，立子公孫，」是霍光廢掉昌邑王而立皇孫病已（宣帝）。「帝軒轅受命公孫氏握，」乃是姓公孫的黃帝作土德之君，也與你無關。而且讖書上又說，「漢家九百二十歲，以蒙孫亡；受以丞相，其名當塗高。」你是不是丞相當塗高呢？你年紀大了，應當替妻子們想一想，不要爭奪這天下的神器罷！」公孫述看了這信，不答覆，仍做他的皇帝。但到龍興十二年上，究竟他的「西太守」靠不住，給「赤伏符」滅掉了。

在公孫述和光武帝二人的文告裏，可以注意的事情有幾項：第一，他們作天子的根據都出在讖書上。第二，他們對於讖書，各有各的解法，好像後人詳籤詳夢一般。第三，他們不諱言自己的滅亡。光武帝是一個中興之主，正在開國的時候，而已公開表示他的亡國的日期和亡他的國的人名，這是何等的度量！所以然之故，就爲讖書裏是這樣說的，他不敢不信。讖書裏何以這樣

說，則因他們相信做天子的也像做官一樣，多少年後須換一個新任的，他們已在讖書裏把五個德的帝王年代都規定了。第四、公孫述引的錄運法、括地象、援神契，光武帝引的西狩獲麟讖，都是讖書的名目，以前的人所沒有見過的。春秋經的最後一條，是「（哀公）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可知這西狩獲麟讖定是屬於春秋的讖書。此外，援神契是屬於孝經的，錄運法和括地象是屬於河圖的。

讖緯的著作，他們說是孔子編成了六經之後，深恐經文深奧，將來的人不能洞悉他的意思，所以別立緯和讖，講說得通俗一點；又說有許多是黃帝、文王等九個聖人傳下來的。讖，是豫言。緯，是對經而立的：經是直的絲，緯是橫的絲，所以緯是解經的書，是演經義的書，自六經以及孝經都有緯。這兩種在名稱上好像不同，其實內容並沒有什麼大分別。實在說來，不過讖是先起之

名，緯是後起的罷了。除了這兩名之外，還有「圖」和「書。」我們在上邊，知道符命都是有圖有書的。最早的圖書是什麼呢？他們說：是黃河裏出來的圖，叫河圖；洛水裏出來的書，叫洛書。劉歆的意思，以爲伏羲氏王天下，受了河圖，照樣畫出來，就是八卦；禹治洪水，天賜洛書，照樣排列出來，就是洪範。緯書裏更描寫得好玩些，說：河圖是龍馬馱出來的，洛書是神龜獻上來的。不管它究竟怎樣，河圖和洛書一定是最古的讖緯。因此，讖緯裏以屬於河圖和洛書的爲最多，就現在看得見的材料說，已占有了全部的四分之一。大概凡是歸不進六經的，都歸到這方面去了。就是光武帝受命的赤伏符，也是河圖中的一種。這些書的名目，多半是不可解的；隨便舉出幾個，讓大家猜一猜：稽耀鉤、帝覽嬉、皇參持、闓苞受、帝視萌、運期授、甄曜度、靈準聽、寶號命、洛罪級、考河命、準讖哲——你們看，這些名詞是多麼神祕呀！因爲有圖、有書、有讖、有緯，所以這

些書的總稱，或是「圖書」或是「圖讖」或是「讖緯」或是「讖記」或是「緯書」又因尙書緯中有十數種爲中候，亦總稱爲「緯候。」

這些讖緯眞是從黃帝到孔子許多聖人們所作的嗎？恐怕除了喪失理性的人誰也不敢答應一聲是的。但尙有許多人說這些書在西漢時早就有了。我們可以舉出一個反證。劉向歆父子的七略，房中術和劾鬼術諸書尙連篇地登載，那時如有讖緯，則即使因它怪誕而不收於六藝略，那數術略中總應有分；爲什麼也不見影兒呢？讖緯的中心思想，是陰陽五行，是災異禎祥，這正是極合漢代經學家的脾胃的，爲什麼他們都不引，必待至公孫述和光武帝們而始大引呢？所以我們可以說：七略不錄讖緯，沒有別的原因，只因那時尙沒有這種東西，這種東西是在向、歆父子校書之後纔出現的，這種東西是王莽時的種種圖書符命激起來的。零碎的讖固然早已有了，但其具有緯的

形式，以書籍的體制發表之的，決不能早於王莽柄政的時代。

第二十章　讖緯的內容

讖緯書的出現，負有三種使命。其一、是把西漢二百年中的術數思想作一次總整理，使得它系統化。其二、是發揮王莽、劉歆們所倡導的新古史和新祀典的學說，使得它益發有證有據。其三、是把所有的學問，所有的神話都歸納到六經的旗幟之下，使得孔子眞成個教主，六經眞成個天書，借此維持皇帝的位子。在兩漢之際「民神雜糅」的社會中，自然該有這種東西大批的出現。

讖緯的內容，非常複雜：有釋經的，有講天文的，有講歷法的，有講神靈的，有講地理的，有講史事的，有講文字的，有講典章制度的。可是方面雖廣，性質卻簡單，作者死心眼兒捉住了陰陽五行的系統來說話，所以說的話儘多，方

式只有這一個。我們只要記得了漢初的五色天帝轉了幾轉的王莽的五德說中的人帝，又記得了陰陽五行的方位和生尅，就好像拿了一串鑰匙在手裏，許多的門可以打開了。

他們說：天上太微宮裏有五帝座星。管春天的是蒼帝，他的名字叫靈威仰；他的性情是仁良溫讓的；他身長九尺一寸；他使喚的是歲星。管夏天的是赤帝，他的名字叫赤熛怒；他的性情是寬明多智的；他頭形尖銳，身長八尺七寸；他使喚的是熒惑星。管季夏的是黃帝，他的名字叫含樞紐；他的性情是重厚聖賢的；他使喚的是塡星。管秋天的是白帝，他的名字叫白招拒；他的性情是勇武誠信的；他使喚的是太白星。管冬天的是黑帝，他的名字叫汁光紀；他的頭是大的；他使喚的是辰星。

在商、周時，固然天子也說自己的祖先是上帝所生，但他們意想中的上

帝只有一個。到漢代纔依了五行說而分上帝爲五個。到西漢之末，纔因王莽的宣傳而確認這天上的五帝的兒子輪流了做人間的帝王。例如漢高帝，如果說他以水德王的，他是黑帝的兒子；倘改說爲火德，他就變成了赤帝的兒子了。天上赤帝的兒子在人間做帝王，也可以稱赤帝，所以王莽得到的金策書上寫的是「赤帝行璽邦，」而土德的王莽也就成了「黃帝。」他們說：這人間的五帝是有一定的任期的。蒼帝應當傳二十八世；白帝應當傳六十四世黑帝可以治八百年。光武帝所以自承「漢家九百二十歲，以蒙孫亡，」就因爲赤帝是應當治九百二十年的緣故。他們又說：蒼帝亡的時候要有大彗星出現，麒麟被捉；黃帝亡的時候要有黃星墜下，黃龍墜下；黑帝亡的時候要有狠星張在天空，靈龜被執；白帝亡的時候要有五殘星出，又蛇生了足，像一個伏着的人。

自從漢高帝以平民得天下，加以文、景以來的五德說的爭辯，武帝的封禪和改曆，大家注目的是皇帝的受天命，覺得這是世界上惟一的大事。爲什麼受天命？受天命的手續怎樣？受了天命之後應當做些什麼？在當時人看來都是最重要的問題。到王莽當權，又把自己渲染爲新受命的天子，上帝保佑他坐龍廷的奇蹟顯示了不知多少，這種熱空氣散布到民間，更使羣衆增進了對於帝王受命的信仰和想像。於是我們的上古史就變了樣子！

他們提起伏羲的故事，說雷澤裏有大人的脚印，華胥去踏了，就生下了伏羲。他的樣子是龍身、牛耳、虎鼻、山準、大眼睛，長九尺一寸（照王莽的系統，他是木德，所以和天上的蒼帝一樣長。）因爲他的道德融洽於上下，所以天把鳥獸文章送給他，地把河圖洛書送給他。神農呢？少典的妃子安登到華陽去遊玩，有一條神龍和他交感了，就生下了他；他生得牛頭、龍顏、大脣，長八尺七

寸（也就是天上赤帝的長度。）因爲他喜歡耕田，創造了耒耜，所以地出醴泉，天降嘉禾。黃帝更了不得，大電光繞着北斗，照到郊野，觸着了附寶的身子，生下了他。他身逾九尺、日角、龍顏、河目、隆顙；胸前有文是「黃帝子」三字。他將要做天子的時候，有黃雲在堂前升起，鳳凰銜了圖放在他的面前，他再拜而受。少皞是劉歆臨時插入古史系統裏的，他的歷史太短，人民知道的不多，這個位子還沒有坐穩。但在黃帝的土德和顓頊的水德之間應當有一個金德的天子這是很顯然的，所以讖緯的作家就另插了一位朱宣進去，說黃帝時有虹一般的大星下流華渚，女節夢中和它交接了，生下了白帝朱宣。顓頊的出生也和他相像，說是有蜺一般的搖光貫過月亮，感着女樞而生的。

王莽最注重的是堯、舜，要從堯禪舜上見出漢禪新的必然性，所以在讖緯裏關於堯、舜和他們禪讓的故事講得最有聲有色。他們說古時有一個從

石頭裏出生的女子，名喚慶都，是火帝的女兒。她到二十歲還沒有嫁，出游時彷彿常有神靈隨着。有一天，一條赤龍背着圖從河裏跳出來，慶都替它解下，看見上面寫着「赤受天運」四字；下面有圖畫一個穿赤色衣的偉男子，眉有八彩，鬚髮長七尺二寸，題的字是「赤帝起誠天下寶。」那時忽然陰風四合，那條赤龍和她合婚了，一接就有了身孕。後來生下了堯，面貌和圖上一樣。他坐船游河，有一鳳凰負圖來。這個圖是用赤玉做的匣子，長三尺八寸，厚三寸，白玉的繩，黃金的檢（繩上的封泥叫做檢），蓋的章是「天赤帝符璽」。他就以火德王天下了。舜的母親名握登，感着大虹而生舜。他身長九尺，兩目重瞳子。有一天，堯率領舜等一千人游首山，並觀河洲，見有五個老人在那邊。他們聽得一個老人唱道，「河圖將來告帝期」；接着第二個老人唱「河圖將來告帝謀」；第三個接着「河圖將來告帝書」；又聽得第四個「河圖將

來告帝圖」最後一個是「河圖將來告帝符。」不到一刻，有一條赤龍銜了圖從河中出來五個老人就化爲流星，衝入昴宿。舜低頭一看，龍也沒了，留下了這圖。堯把它打開，上面寫着「帝樞當百，則禪于虞。」他歎了一口氣，對舜道，「舜呀，天運到了你的身上了，你好好兒幹下去罷！」舜就受了堯的天下。

從舜以下也都這樣。修紀在山上見流星，感而生禹。扶都見白氣貫月，感而生湯。太任夢見長人，感而生文王。劉媼夢見赤鳥如龍，和她游戲，生了執嘉。執嘉的妻含始在雒池上拾得一粒赤珠，刻有「玉英吞此者爲王客」幾字，她吞了，就在這年生下了劉邦。（到這時，纔知漢高帝的父親名叫執嘉，母親名叫含始！）他們的狀貌也很奇，得到的符命也很多，好在大家已知道了這個格式，恕我不絮了。

緯是明說解經的，經是孔子定的，所以在讖緯裏，孔子是一個中心人物，

受渲染的程度比幾位聖帝明王尤爲高强。他們說那時有一位少女徵在到大澤邊游玩，玩得疲倦，就睡在那裏。她夢見黑帝請她去，去了，就和他配合了。黑帝對她說，「你將來產生小孩一定要在空桑裏面。」她一覺醒來，果眞懷了孕，後來果眞生產在空桑裏。這個小孩的相貌特別極了：海口、牛脣、虎掌、龜脊；頭像尼丘山，四周高，中央低；胸前有文，是「制作定，世符運」六字。後來大了，就更好看了：身長十尺，大九圍，坐着像蹲龍，立着像牽牛；他的儀表非常堂皇，發射出一種光彩，近看好像昴星，遠看好像斗星。他不知道應叫什麼，吹律（竹製的樂器）定姓，知道自己是殷的後裔孔氏，就姓了孔；頭像尼丘山，就名了丘。照他們說，湯是水德，爲黑帝之子，而孔子是湯的後裔，所以仍爲黑帝之子。但是有一件不幸的事來了。天上的五帝爲了要使自己的兒子做皇帝，所以纔傳種到人間；孔子既是黑帝之子，也須做皇帝才對。況且那時周已衰

了，本該有新受命的天子起來了。孔子爲什麼還不做皇帝呢？他們揭開這個謎，說因周是木德，木只能生火，不能生水；孔子雖有水德，無奈不當令，他只得爲火德代勞，替未來的漢朝制定許多法典——六經。所以春秋緯裏說，「黑龍生爲赤，」又說，「玄丘制命帝卯行也。」

他有帝王之德而無其位，栖栖皇皇，一生不得志。有一夜，他夢見豐、沛一帶有赤色的煙氣升騰起來。他醒時，就駕起車子去看。到了那邊，只見一個撿柴的小孩打壞了一頭麒麟（不要忘記上邊說的：蒼帝亡的時候要有麒麟被捉，更不要忘掉周爲木德，即是蒼帝。）孔子走上前去，那麟垂着耳朵，吐出三卷書來。書上寫着：「周亡，赤氣起，火曜興；玄丘制命帝卯金。」他知道上帝派他爲卯金氏制法了。不久，天上又掉下一方血書，落到魯國的端門上。書上寫的是：「趨作法！孔聖沒，周姬亡，彗東出，秦政起，胡破術，書紀散；孔不絕。」第

二天，子夏去看，血書變爲赤鳥飛去了，留下一個圖，畫的是孔子制法的形狀，上面題着「演孔圖」三字。這件故事就叫做「端門受命。」當孔子把春秋和孝經——兩部最重要的法典——作成時，吩咐七十二弟子向北辰彎了腰站着，又命曾子抱了河圖、洛書，他自己齋戒沐浴，穿着絳色的單衣，朝着北辰拜下去。那時天上就有雲氣起來，白色的烟霧一直降到地，一條赤色的彩虹從天而下，變作黃色的玉，長三尺，上有刻文。孔子忙跪下接起，讀道，「寶文出，劉季握。卯金刀，在軫北，字禾子，天下服。」（這是說劉季——高帝的字——要在軫宿分野的北面起事，後來統一天下。）

我們讀了上文的武功白石，銅符帛圖，金匱圖和金匱書（均見第十四章）之後，再來看這類玩意兒，它的意義當然可以不煩言而解。原來漢高帝得天下時簡陋得很，他沒有想到自己是赤帝子，該有種種受天命的花樣。可

是這種花樣都給王莽想到了，他的得天下的場面就比漢高帝好看得多了。他雖失敗，然而這種開國規模何等堂皇，劉家中興人物劉玄、劉盆子、劉秀們那有不想學樣的，所以他們就鈔了王莽的文章，替自己的祖先補造這一大套，見得高帝的受命已早於孔子時注定了，並且學術界中最大的權威者孔子即是爲了這一件大事而出世的。裝點孔子即是裝點高帝，也即是裝點自己；要把孔子捧作教主，也即是把漢家皇帝捧作教主：這對於他們保持這一份大家產（所謂「鞏固皇圖」）是怎樣的有利呀！

有人讀了上面一大篇，或者要發一聲冷笑，說道，「這種鬼話已絕不能存在於今日了，還理它作甚！難道當笑話講嗎？」如果有這種見解，我敢說他把事情看得太簡單了。我們講的是漢代史，凡曾在漢代發生過重大影響的東西就不該不講，正如講到初民社會時不該隱卻他們的野蠻行爲一樣。況

且這種東西，表面上是死了，實際何嘗死掉。試問現在一班愚民天天望一眞命天子」出現，是不是間接受讖緯的影響？讀書人感到的神祕性的孔子，是不是從讖緯來的？提倡孔教的人，誰不把端門受命等故事作他宣傳的中堅？就算腦筋清楚些的人，肯不信這種東西，然而玄聖的玄，炎、劉的炎，誰想得到有問題？華胥履跡，慶都感龍一類事，誰敢不看作眞實的上古史？從東漢直到近世，上古史的作家不把這些材料收進去的有幾個？就說腦筋更清楚，連這種神話都不信了，然而有了社會學的觀念，看着一大串不夫而孕的故事，又要把它牽合到「男女雜交」「血族羣婚」「母系社會」上面去了。他們不知道，這是從整個的王莽式的五德系統（見十六章）和他的天帝人帝打通說（見十八章）上來的。如果沒有王莽們把全部古文化重新整理，在整理時作了種種有意的改變，那裏會有這種古史出來！所以這種上古史問

題其實只是中古史問題，而兩漢之間的社會情狀就是解決這類烏煙瘴氣的假上古史的最好法門。

第二十一章　讖緯在東漢時的勢力

光武帝以赤伏符受命，又用了西狩獲麟讖來折服公孫述，統一天下；所以他對於讖緯有極强的信仰。不，不說他信仰不如說他依賴了吧！他在讖文裏讀到一句「孫咸征狄，」恰好他手下有個孫咸，就命他爲平狄將軍，行大司馬事。不過大司馬的職位太高，權勢太重，不是資格和才力足以相稱的人就辦不下去的，他終於撤職了。赤伏符裏有一句「王梁主衛作玄武，」他想戰國末年的衛國是被徙到野王的，玄武是水神之名而司空是水土之官，恰好那時的野王令是王梁，他便任他爲大司空了。這一種任官的方法，和王莽有什麼兩樣？

他很用心讀讖緯。有一次，因爲日食，他避開了正殿，坐在廊下讀；讀得太

多了，又感受了風寒，竟至發病暈了過去。那時讖緯共有八十一篇：其中河圖九篇，洛書六篇（這說是黃帝至周文王的本文）又別有河圖和洛書三十六篇（這說是孔子增演出來的，）又七經緯三十六篇。那時稱七經緯爲「內學」稱原有的經書爲「外學」。雖說是緯，它的地位反占了經的上風了。

桓譚是西漢末的舊臣，王莽時也曾做過掌樂大夫，這些讖緯造作的歷史滿落在他的眼裏。光武帝時，又任議郎。他看見皇帝常常在讖緯裏尋找證據，決定大事，覺得不是好辦法，上疏道「一般人的性情，都是忽略了眞事實而重視怪異的傳聞。但古先聖王只有仁義的正道，孔子也是不講天命的。現在許多巧慧小才的人，紛紛增加圖書，妄稱讖記，來欺惑世人，必須斥絕纔是。這種事也許有時對，但正像用單數雙數到神前占卜，總有碰巧適合的機會；然而那裏可以相信呢！」光武帝看了，很不高興，只是沒有責罰他。後來他下

詔會議建築靈臺的地方，問桓譚，「我想用了讖書去決定它，你看怎樣？」桓譚一聲不響，隔了好久，纔道，「我向來不讀讖。」問他爲什麼不讀，他又把讖不合經的地方說了一大篇。光武帝大怒道，「桓譚非聖無法，拉下去斬了罷！」他固然不肯放棄他的主義，但也不願犧牲自己的生命，只向皇帝叩頭，叩得出血了，皇帝纔赦了他。不久，把他放了外任，就死在路上，那時他年已七十多了。他著有新論二十九篇，雖已亡佚，但就殘存的一點看來，其中也攻擊王莽信鬼神的迷惑，又說河圖、洛書出於後人的加增依託，決不是孔子作的，足以證明他在當時確是一個頭腦清醒的人。不過他終究是一個不識時務的人，他不懂得光武帝爲什麼要提倡讖緯的心理。

還有一位尹敏，讀得好些經書，又通洪範消災之術。光武帝命他校定圖讖，删去崔發（王莽時的圖讖專家，封說符侯的）替王莽加進去的許多說

話。不料他也瞧不起讖書，說道「這種東西決不是聖人所作，而且其中很多俗字俗說，會得疑誤後人的！」光武帝不聽，還是叫他做這工作。他要些手段，就缺文上寫了一句「君無口，爲漢輔」（請讀者莫忘記了第十五章裏李通的圖讖上寫的「劉氏復起，李氏爲輔」）希望皇帝重用他。光武帝見了，識得他的筆迹，問他爲什麼要這樣，他說「我目覩前人增損圖書是這樣的，所以我也不自量，希冀萬一的徼倖！」帝雖不以爲然，也不治他的罪。同時受詔校定圖讖的，還有一位薛漢，他本以說災異讖緯爲專業，教授的弟子常有數百人。我們現在看見的讖緯，其中所以沒有王莽受命的宣傳文字，就因爲早給他們刪去了。

光武帝卽位三十年，羣臣請封禪泰山，報答天祐。他下詔，爲自己無德不許。至建武三十二年（西元五六）正月，他行過泰山，夜讀河圖會昌符，讀到

「赤劉之九，會命岱宗。……誠善用之，姦僞不萌，」一想起封禪之事也可行得，便命人把河、洛讖文凡有說到封禪的都搜集起來，得到三十六條。他便依照漢武帝元封時的故事舉行。在未祭時，先派人上山刻石，文中舉了河圖會昌符的「赤帝九世，巡省得中。……帝劉之九，會命岱宗。……赤漢復興九世會昌。……天地扶九，崇經之常。漢大興之道，在九世之王。」又舉河圖合古篇的「帝劉之秀，九名之世，」河圖提劉子的「九世之帝，方明聖持，」洛書甄曜度的「赤三德，昌九世，」孝經鉤命決的「帝三建，考九會」等等，證明他這次行事的有據。爲什麼老是說「九」呢？只爲從漢高帝到光武帝是足足的九代。河圖、洛書如果眞是孔子作的，則他在端門受命時已不但知道了開國的劉季，而且知道了這中興的劉秀了！他以二月二十二日辛卯晨燎祭天於泰山下，如南郊禮；二十五日甲午，禪祭地於梁陰，以高后配，如北郊禮。這不消

說，他沿襲了王莽的制度。秦皇、漢武的封禪本沒有天地陰陽的區別，但從此以後，封泰山是祭天，禪泰山下的小山是祭地，等於國都中的南北郊，大家用了王莽的方式作定制了。四月，他大赦天下，把建武三十二年改爲中元元年。就在這年的十一月裏，他宣布圖讖於天下。圖讖本已迎合民衆迷信的心理，現在又定爲功令的必讀書，當然鑽入民間更深更普遍了。東漢的國祚約二百年，禁不起這長期的宣傳，所以讖緯八十一篇便成了王莽符命四十二篇的「跨竈」之子！

明帝是一個很精明的人，他能繼續父業，所以河圖括地象裏就有了「十代，禮樂文雅並出」的豫言。他在永平三年（六〇）下詔道，「尚書璇璣鈐裏說，『有帝漢出，德洽作樂，名予。』着把郊廟之樂改名爲大予樂，樂官也稱爲大予樂官，以應合圖讖。」

左傳這部書，十之八九是眞材料，其十之一二是劉歆改作的或是增加的。劉歆幫王莽篡位，把新式的五德終始說插在書裏，證明漢是堯後屬火德（當時也必有證明王莽爲舜後屬土德的，現在不見，想來是新室滅亡後給人删掉了，）作禪讓的張本。後來光武中興，他自承爲火德，雖和王莽、劉歆不同志，但用的依然是他們定的歷史系統。爲要在經書裏證明漢的國運，左傳當然是一部很重要的書。光武帝所以有心把它立博士，即以此故。劉歆有兩個門弟子：一個是鄭興，劉歆因他天資很好，叫他作左傳的條例、章句、訓詁；一個是賈徽，他自己作了左氏條例二十一篇。他們都算得劉歆的高足弟子。鄭興在光武帝時任太中大夫，也很喜歡講洪範災異；但不知爲什麽，他不願隨俗弄些讖緯之學。有一次，光武帝問他郊祀的事情，向他說「我想把讖書來決斷這事，你看怎樣？」鄭興老實得很，答道，「我是不讀讖的！」帝大怒道，

「你不讀讖，是不是表示反對？」他惶恐了，兢兢地答道，『我於書有所未學，那裏敢反對！』帝方纔赦了他。終究因他不懂讖，不給他做大官。賈徽自身雖沒有得意，但他的兒子賈逵是非常聰穎的，他學通五經，尤明左傳和國語，作兩書的解詁五十一篇，永平中獻了上去。他不像鄭興的不達時務，便在奏疏中說，「五經裏都找不到可以證明圖讖所言劉爲堯後的材料，只有左傳是有明文的。又五經裏總說顓頊是承繼黃帝的；如果這樣，堯就不得爲火德，聯帶漢也不得爲火德了。現在左傳裏黃帝和顓頊之間有少皞一代，就是圖讖裏所說的帝宣。這樣一排，堯就確然爲火德了。」明帝很以他的話爲然，把他所作的解詁藏在祕府。到章帝時，他又把這番話重說了一通。章帝也是喜歡左傳的，幾次選了許多高才生從他讀左傳，這部書的地位就確立了。我們今日能彀知道些春秋時的事情，當然是左傳的功勞；可是飲水思源，還是由於

讖緯的介紹呵

我們試翻開後漢書的列傳來，或是看些東漢人的墓碑，大抵是有一博貫五經，兼明圖讖」這一類話的。不想衆醉之中也有獨醒之士，東漢中葉有個任太史令的張衡，他對於讖緯表示鮮明的反對。他上疏順帝道，「讖書是從什麼時候出來的，這個問題很少人知道。當漢取秦時，盡力打仗，竟得成功，這眞可說是一件大事，但在那時是沒有人引讖的。就是最喜歡講術數像眭弘這輩人，也沒有提起過讖書。劉向父子校書祕府，還沒有把讖書編入他們的目錄。直到成帝、哀帝之後，剛剛聽得有這種東西，它們的著作時代也就可知了！我們試用讖來比經，甚至用讖來比讖，其中矛盾衝突的地方不知有多少。況且其中說到戰國時的墨翟，漢的益州，圖裏畫到成帝，那裏會是孔子做的！這一定是虛僞之徒想升官發財，纔造出這種謠言。從前賈逵摘取了讖書

中自相矛盾的三十餘條去問善於讖講的人，他們也都說不出一個所以然來。王莽篡位是漢代的大禍，要是這八十一篇早已有了，為什麼不豫先警戒呢？現在河、洛和六藝諸讖緯都已校定，成為經典，然而有人拿來推說水災，有人棄家入山林求道，都得不到一點效果，這還有什麼可信的！畫工何以怕畫狗馬而樂於畫鬼魅，就為實物難寫而虛偽是可以隨心的。我請求，把圖讖一起禁絕了！」順帝雖因圖讖是國典，不便背棄祖宗的成法，沒有聽他的話，但也覺得這種議論很不錯，常常引他到帷幄中詢問一切。不過一個人總是受時代的蒙蔽的，王莽留下的讖緯，張衡雖能打破，王莽留下的歷史系統，張衡依然上了他的當了。司馬遷作五帝本紀，黃帝之後就是顓頊，這原是戰國以來通用的方式。張衡卻因其中缺掉少皡，奏請改定，這請求也沒有照准，想來為「五帝」這個名詞所限，不便改成六帝的緣故。

圖讖這類東西，會隨時增加改變，爲皇帝慾發達的人造作自拉自唱的證據，使得統治階級極感不便，所以張衡的禁絕的主張在當時雖未成事實，而在南北朝時就實行過好幾次。到隋煬帝即位，索性作徹底的摧殘，他派使者四面去搜求讖緯以及其它和讖緯有關係的書籍，一齊燒了；私人有敢隱匿的，查出處死刑：這纔禁成功了。現在除了易緯八種還完全之外，其餘的種種只留一鱗半爪在別的書裏；經明、淸人的苦心輯錄，纔看得一個粗略的輪廓。

第二十二章　曹丕的受禪

上面講了許多五行的故事，讖緯的故事，和現代意識太隔絕，諸君諒來聽得厭了。現在再講一個讖緯的喜劇算作「大團圓」罷！

東漢中葉之後，宦官弄權，害死了不少好人。董卓殺了宦官，立獻帝，遷都長安。曹操起兵，抓住獻帝，又把都城遷到許，他自爲大將軍，玩弄皇帝於掌握之中。他執政二十四年，初自立爲魏公，加九錫；又自進爲魏王，設天子旌旗，出入傳呼警蹕。這樣一步步的走上去，宛然王莽再生。但他到死沒有篡位，這不知道是他不願意做皇帝呢，還是他的壽命已不容他實現最後的計畫呢？總之，禪讓的格局是布置好了。

相傳當他封魏公的時候，遠道的人沒有聽準，傳說他封的是魏王。有一

個讖緯專家李合說,「這一定是『魏公,』因爲孔子傳下的春秋玉版讖上早已寫着『代赤者魏公子』了!」還有一個李雲也上封事說道,「讖書裏說的『許昌氣見於當塗高,』這話怎講?當着道路而高大的,莫過於宮門外的兩個觀闕(臺上有樓觀,故曰觀;其間無門,故曰闕。北平的天安門,本來就是這東西,不過裝上門了,)觀闕之名爲「象魏」這不就是魏嗎?所以『代漢者當塗高』就是魏當代漢的豫示。魏的基業昌於許,所以說是『許昌。』」這句話說得活靈活現。但是光武帝引的「漢家九百二十歲,以蒙孫亡;受以丞相,其名當塗高,」下半節是猜準了,還有上半節呢?可憐光武帝到那時還不到二百年咧;就是從高帝受命算起也不過剛透四百年咧!

曹丕是魏王的太子,他於建安二十五年(西元二二〇)二月嗣位。他一卽位,就把獻帝的年號建安改爲延康。三月,黃龍現。四月,白雉現。八月,鳳凰

集。我們看了王莽時的種種花樣，以及觀緯書中的種種帝王受命的記載，就知道這好戲已在打鑼。果然十月裏，獻帝下詔道，「我不幸，遭着國家的蕩覆；雖是危而復存，但擡頭看天文，低頭看民心，就知道炎帝的歷數業已告終，五德之運到了曹家了。從前的魏王（曹操）既立了許多神武的功績，現在的魏王（曹丕）又是明德光耀，應着這個期會天之歷數所在再明白沒有了。古人說得好，『大道之行，天下爲公，選賢與能。』唐堯不私於他的兒子，留下了萬世的美名。我對他是非常羨慕的，現在就禪位於魏王罷！」

那時魏國的許多官員也都上表稱引圖緯，說明魏王做皇帝的無異義。其中尤以太史令許芝說得最詳細，最眞切。他說，「易傳（就是易緯）裏講，『聖人受命而王，黃龍以戊己日見。』現在黃龍正以戊寅日現，這是最顯著的受命之符。況且春秋漢含孳說『漢以魏，魏以徵，』春秋佐助期說『漢以

許昌失天下，』說魏說許，還有什麼可疑惑的。又孝經中黃讖說：『日載東（曹），絕火光；不橫一（不）聖聽明。四百之外，易姓而王天下，』把您的名和姓以及受禪的年代都寫出來了。易運期讖說，『言居東，西有午，兩日並光日居下。其爲主，反爲輔。五八四十，黃氣受，眞人出。』言午是『許』字，兩日是『昌』字，這是說漢當以許亡，魏當以許昌。運期武又說，『鬼在山，禾女連（魏）王天下，』也是魏應得天下的證據。按帝王是五行之情，應當七百二十年一交替，但有德者可以超過這個數目，無德者就到不了這個數目。從漢高帝到現在固然不過四百二十六年，但漢的受命，圖讖上早已說明，乃在春秋末的『西狩獲麟』（！），從獲麟到現在就過了七百年了；到了應當交替的時候了！我們看天上太微宮裏，黃帝坐常明亮，赤帝坐常不見；可見赤家當衰而黃家當興，在天象裏也有證據。又熒惑星是赤帝之佐，失色不明也有

十餘年了。建安十年，彗星先除紫微；二十三年，又掃太微。新天子氣見於東南。您初即位，就有黃龍、鳳凰、麒麟、白虎等許多祥瑞。從前黃帝受命風后，受河圖。舜、禹得天下時，鳳凰翔，洛出書。湯爲王，有白烏之符。周文王爲西伯，赤烏銜丹書來。漢高帝剛起，就有白蛇的徵應。這些異物都是爲了聖人而出現的。我們看漢家前後的大災，魏國現在的符瑞，再察圖讖中的期運，可說從古以來得天下者沒有像魏這樣又完美又正當的。從前周公歸政成王，孔子很反對他，以爲他不是聖人，所以不替億兆的人民設想。伏願您體會堯、舜的聰明，承受這七百年的禪代罷！」

獻帝再三下詔禪位，羣臣又數十次上表勸進，曹丕一味的謙讓。在這一個月中，從初一直鬧得月底，往還的文書着實可觀。僅看那些文書，差不多比了唐、虞之世還要美麗了。其中以博士蘇林、董巴所上的表有些新意思。他們

說「周天分爲十二次，叫作分野王公之國在分野中各有所屬。周的分野是鶉火之次，魏的分野是大梁之次。歲星每年歷一次，十二年而一周天；天子的受命，諸侯的封國，都按照着這個次序。所以周文王始受命，歲星在鶉火；到武王伐紂，是文王受命後的十三年，歲星又到了鶉火了。靈帝中平元年（西元一八四），武王（曹操）討黃巾，是爲始受命，那年歲星在大梁。建安元年（一九六）又在大梁，始拜大將軍。十三年（二〇八），又在大梁，始拜丞相。今年（二二〇）歲星又到了大梁了，您應該受命王天下了！況且今年是庚子，詩緯推度災說，『庚者，更也。子者，滋也。聖命天下治。』又說，『王者布德於子，治成於丑。』這是明說今年應當換個新聖人治天下了。又魏的氏族出於顓頊，和舜同祖。舜用土德繼承堯的火德，現在魏也是用了土德繼承漢的火德，極合於帝王授受的次序。天命這樣的丁寧周至，就是人們說白話也不能

比它再淸楚。倘使您一味的固執謙讓，那眞是上逆天命，下違民望了！」

獻帝在第三次禪位詔裏，對於曹丕作苦苦的祈求，他道「漢家世踰二十，年過四百，運已周偏了，數已終訖了，天心移了，民望絕了。現在天命有所歸，神人又同應。違天不順，逆衆不祥，魏王呵，你還是模倣了有虞氏的盛德，接受了這歷數的期會罷！從前堯禪舜時不聽得舜逆堯命，舜禪禹時又不聽得禹辭舜位。你還是敬奉天心，不要再違背我的命令，登了皇帝之位罷！」但曹丕又說，「聽得了這個詔命，直使我嚇得發抖。」

最後，魏的相國華歆等上一個最懇切的奏書，說道，「我們聽得您屢次的讓，眞是悲傷極了。易云『聖人奉天時。』論語云，『君子畏天命。』堯知道天命去已，所以不得不禪舜。舜知道歷數在身，所以不得不受禪。堯的不得不禪，這是他『奉天時。』舜的不得不受，這是他『畏天命。』漢家雖已這樣衰

敗，還知道學堯的辦法；但是您卻只管拘牽小節，不知道去學舜。倘使死者有靈，那麼，虞舜一定在蒼梧的墓墳裏頓足大駡了！不但是他，就是夏禹和周武王也必在他們的塚中鬱鬱不樂了！現在我們決定，不管您的意思怎樣，立刻經營壇場，擬具禮儀，選擇吉日，請您去昭告昊天上帝，承受這個必應受的天命！」於是曹丕說「從前大舜在田野中吃粗糙的糧食，彷彿有終其身的樣子：這是我的宿志。他受了堯禪，穿上了貴重的衣裘，像是向來過慣的：這是他的順天命。既經天命不可拒，民望不可違，我也沒法辭謝了，就學了他罷！」明天，他升壇受皇帝的璽綬；公卿、列侯、諸將，匈奴單于，四方夷人們陪位的有數萬人。事畢，燎祭天地、五嶽、四瀆；改元黃初，表示是土德行運之初。他回去時，輕輕地說道「舜和禹的事情，我現在是知道了！」

秦始皇和漢高帝的受命是武的；光武帝的受命是文武兼資的；王莽和

曹丕的受命是純粹文的。不過把曹丕比了王莽，猶有些不同。王莽時的花樣件件是「當場出彩」，幾百種的祥瑞和圖書都在他的世裏陸續出現，證明了他的天命。偶然也有幾件舊的點綴一下，像春秋時的「沙麓崩」說是聖女興的符瑞，文帝時的黃龍出現說是土德代漢的豫兆，但這不過給與一種新解釋而已。曹丕就不是這樣了。他的天命固然一方面也有活貨，像黃龍和鳳凰之類；但大部分是出在數千年來文王、孔子傳下的圖讖上，而且說得這樣明白，把他的名呵、姓呵、地呵、年呵、一切都豫先記好了。然則孔子何嘗是爲赤漢制法，他把「黃魏」也一起包羅了。假使張衡還活着，他一定要說：曹丕結果漢家天下在八十一篇讖緯裏明白如此，爲什麼不豫先警戒呢！又王莽的天下是漢高帝在冥冥之中傳與他的，曹丕的天下是獻帝明白禪讓的。王莽爲他自己是土德，所以把漢改排了火德；曹丕因爲漢是火德，所以他就自

居於土德。他們的德運雖同，而一個主動，一個被動，也有些兒差異。

魏文帝（曹丕）短壽，沒有等到改正朔，易服色，就死去了。到他的兒子魏明帝景初元年（西元二三七），山茌縣黃龍見，官員們奏魏得白統，應以建丑之月爲正，纔依照了三統說改定歷法；又服色尙黃，犧牲用白，都和王莽的制度一樣。

我們讀了以上許多受命（皇帝的宗教）的故事，該得明白，所謂五德和三統，所有圖讖和緯候，莫不是應時出現的東西；它們自己雖處處說是老古董，其實盡是些時髦的貨色，好比一籠饅頭，現蒸熱賣的。現在我把它們的眞相揭開，諸君或者要以爲這種東西無聊得很，不值得大談特談。須知許多眞的老古董（歷史）都給這種各時代的時髦貨色淆亂了，我們無論看到那部古書，或者提到那件古史，幾乎沒有不蒙上這一層色彩，甚至在內部起

了化合作用的。我們要捉得這漢代的學術的中心，明白看出他們的思想和理論的背景，然後對於這些修飾過和假造過的材料可以做剝洗和分析的工作，做了這部工作然後可以眞實的認識古代社會。倘使你不屑瞧瞧這種無聊東西，我敢決然說，你永遠跳不出他們設下的天羅地網！